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系 李维新 著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主 编

杨焕章 秦锡瑜 梅岱

参加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伟 汤群英 陆贵山 李德顺
杨焕章 郭湛 秦锡瑜 梅岱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书中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做的哲学概括，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本书的体系结构和论述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帮助读者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主要内容。

本书适合广大干部和青年阅读，也可供高等学校师生教学和研究参考。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杨焕章 秦锡瑜 梅岱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69,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2071·17 定价：1.55元

目 录

概 论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 2
-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0
-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32
- 四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方法……………40

第一章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47
-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58
- 三 把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66

第二章 论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75
- 二 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83
- 三 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97

第三章 论实事求是

-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102

二 从实际出发·····	105
三 有的放矢·····	118
四 调查研究·····	127

第四章 论自觉的能动性

一 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	134
二 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	140
三 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145
四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56

第五章 论实践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	161
二 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活动·····	167
三 认识的基础·····	172
四 尊重实践 深入实践·····	180

第六章 论人民群众

一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88
二 相信群众 尊重群众·····	194
三 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205
四 群众路线·····	212

第七章 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一 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	220
二 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	229
三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234

第八章 论真理

- 一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 243
- 二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 检验真理, 发展真理…………… 251
- 三 真理是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无限过程…………… 257
- 四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263

第九章 论矛盾

-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271
- 二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278
- 三 矛盾学说的精髓…………… 282
- 四 内因论…………… 287
- 五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 297
- 六 矛盾的转化…………… 309

第十章 论矛盾(续)

- 一 社会的基本矛盾…………… 316
- 二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324
-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334
- 四 两类社会矛盾…………… 341
- 五 阶级分析法…………… 350

第十一章 论军事哲学

- 一 战争和政治…………… 360
- 二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366
- 三 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376

四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393
--------------------	-----

第十二章 论道德哲学

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09
二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416
三 尊重社会公德·····	423
四 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431
五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440

第十三章 论艺术哲学

一 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446
二 人民大众的文艺·····	451
三 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458
四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 形式的统一·····	462
五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467
六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472

第十四章 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 思想方法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481
二 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	489
三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495
四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501

后 记

概论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废除了几千年来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中国人民又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集中了中国二十世纪大变动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集中了中国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马克思还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①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0页。

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而它一经产生就对这个时代起着伟大的作用。认真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当今这个伟大时代提出的一项伟大任务；而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又必将变成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做的哲学概括，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为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弄清：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活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既是马

^①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一再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产物。它不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哲学”，而完完全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又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揭示中国革命的逻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革命逻辑的分析和综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由中国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且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而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

^① 《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洲形式和欧洲语言为中国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明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还使它具有了中国民族的气派和风格。

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生活时，伴随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它也会有所发展。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来看，或从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来看，它的一些基本观点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中有过论述，但也确实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大的发展。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了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艺、道德、革命、建设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为活生生的发展的哲学，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榜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原理以理论上的系统性。《实践论》对于实践观点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论述，《矛盾论》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等等，就其集中、完整、系统而言，确实是超出前人的。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革命经验时，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做出了新的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实事求是，关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关于矛盾学说的精髓，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等等，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做出的新概括。这些新概括都更加科学、鲜明、准确、生动地表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在概括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提出但未及阐述的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关于精神对物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等问题的明确论述，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决新问题、概括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新概念，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诸如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以及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的新理论。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同时又是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战斗历程。无论革命或建设，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在这个期间，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也经受过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革命胜利后，我们取得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有过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甚至象“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错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长期影响全局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做出科学的分析，又取得了完成指导思想上

的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鲜经验。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党、我国各族人民极为宝贵的财富。

对于成功的经验，我党和毛泽东同志都及时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于失败的教训这种反面的经验，我党和毛泽东同志也是十分重视的。正由于我党善于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才使得它虽经曲折但最终必将达到真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总结我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产生、成熟和发展起来的。

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里明确指出。一个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所指的仅限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原则，而不包括那些错误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错误的东西尽管在形成正确认识中有借鉴作用，但它本身并不是正确认识的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发生的错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不应包括在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之内。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也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本人所犯的错误同我党其他同志所犯的错误一样，不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践，从而也就不可能是二者的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不要把毛泽东思想跟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起来。同理，毛泽东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早期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也不应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作为中国革命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并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串于上述六个方面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是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所做出的新概括。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理论基础,是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同一个过程。它们都是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中,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为毛泽东思想其他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活的灵魂贯串于其他各个部分之中;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其他方面的丰富内容反过来又为进行哲学概括提供了可能。

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凝结着毛泽东同志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领悟,对中国实际的深刻理解,以及伟大的理论创造的勇气。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 《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但是，更应当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集体劳动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人民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集体奋斗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都是中国革命人民集体经验的总结。无论是《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专门的哲学论著，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军事、政治、文艺著作，所反映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它们都是集体经验的总结，凝结着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的血汗。

其次，毛泽东哲学著作中那些由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所起草的决议、指示，大多是经过党内集体讨论，毛泽东同志加以归纳综合而成的。这些著作产生的过程和达到的高度，都反映着集体的智慧，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共同认识。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曾经说过：我是党的文书。这话固然含有谦虚之意，但也确实生动地表达了他跟党的集体的关系。我们知道，《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本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结论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与会同志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判的成果。《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向党的“七大”所做的书面报告。它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经党中央反复讨论研究，并印发给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之后定稿的。

最后，毛泽东哲学著作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领袖们的集体智慧。

我们知道,《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然而,它的先声却可以追溯到《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甚至追溯到《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九二九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听取了陈毅同志关于红四军两年来斗争情况的汇报之后,作了许多口头指示,并委托他代中央起草(经周恩来同志审定)了一个长篇书面指示,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九月来信”)。这封信明确指出必须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特别强调:“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①。红四军前委根据这封信统一了认识,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帮助下,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具体情况,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写了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它集中分析了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及纠正的方法,明确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代替主观主义的方法,注意调查和研究,贯彻并丰富、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可以看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关于调查研究的大声疾呼,关于坚持唯物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的号召,又是对于这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的坚持和发展,当然也是对于“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发展。由此可见,《反对本本主义》及其阐述的党的思想路线都是党的领袖们集体思考的结果,是他们思想纵横交织的产物。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集体奋斗中,集中集体智慧而创造的科学的思想成果。之所以把这一科学的思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想成果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的杰出代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中，他的贡献最大；这一集体智慧的成果，集中地、深刻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科学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如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抓住这里的“普遍”和“具体”这对矛盾及其展开，就可以理解在这个“结合”中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复杂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自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我们同敌人作战的武器找到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地广人众、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是一个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又是从国外传来的好武器，如何把它的普遍原

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这一结合的过程也就开始了。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得很清楚、结合得很恰当的。挫折和失败迫使人们考虑：武器是好的，在俄国是灵的，为什么我们拿来使用却有时失败呢？原因在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直接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告诫我们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不懂得或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用自己的脑子考虑，用自己的腿走路”，按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它勇敢地承担了并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对二者结合的经验作出了哲学概括，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但是，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发展历史，就是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及其推移，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是它广阔而深厚的土壤；而党的思想路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的过程，则是它发展的基本脉络。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成

熟起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于党的成立和北伐战争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经过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解放战争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这大约六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处于萌芽的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党所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前期和中期，轰轰烈烈，打倒一批北洋军阀；在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我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弱点：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它的精神实质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对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贫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性不够，缺乏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经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多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不善于识别和抵制。总之，这时我党还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具体地完整地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场大革命的实践中，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中，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主

要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和我党的其他领袖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建设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正在萌芽。它具体表现在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两个方面。

革命的实践活动方面。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初步运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的结果。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前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开始进行了调查研究，“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问题。这是我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的一大进步。在此期间，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彭湃等人都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北伐战争开始后，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也加强了。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等人都发表文章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这表明了我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我党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的问题也开始注意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彭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同年七月初，毛泽东同志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指出不保存革命武装就无法应付将来的突然事变。这个时期，我党已经直接掌握了一小部分军队，组织了一部分工农武装，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和北伐战争。

革命理论的创造方面。党在这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表现就是萌芽形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首次发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理论标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这就深刻地驳斥了陈独秀主张的“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思想,以及否认农民革命性的“左”倾思想;同时对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这篇著作中所阐明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的说服力,痛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当时正在开展的农民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其基本思想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同样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两篇著作表明我党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着重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这都萌发着生动而具体的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发生了新变动；固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展开；我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也经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党内还经历了从革命道路问题到思想路线问题广泛、深刻、激烈的斗争。正是在这形势困难、矛盾激烈、情况复杂的八年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在中国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军事专制的统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和乡村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更加厉害地剥削和压迫工农阶级。这表明中国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激化了。

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首先是：中国革命应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同志等党的领导人，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组织和领导了许多武装起义，创造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中取得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指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革命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在帮助东方各国的革命方面，曾经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在我们党内也有严重的反映。王

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把持了党的领导权，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摘引只言片语，照搬外国经验，俘虏了经验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将它中国化；主张搞城市暴动，强迫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反对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等等。这种错误，使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我党在同这种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也自觉地提出并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以一九三〇年五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为理论标志，以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为历史标志。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及其统一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关于革命道路和革命政权的论述，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社会矛盾、特别是政治经济方面矛盾发展不平衡状况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主观主义，用调查研究来纠正主观主义，这已是自觉提出并正确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先声。随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又进一步

分析了现象和本质、可能和必然、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从方法论上批驳了悲观主义和盲动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的《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原则，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首先，《反对本本主义》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坚持“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当时对教条主义的一种通俗形象的称呼）的思想路线。

其次，《反对本本主义》包含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的纲要。该文论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对于中国革命带有根本性的论断已经蕴涵了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方面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其后的有关论述都可以看成是对于这一纲领式的论断的展开和发挥。

再次，《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该文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该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提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战斗任务，为正确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指明了方向。

最后，《反对本本主义》抓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提出了建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科学方法。该文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4页。

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① 该文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对于我党思想路线的解决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自觉地提出了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对与此相反的教条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建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根本方法。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具体实际的运用，是党的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它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大体的思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也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因此取得了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十分可惜的是，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虽然深入人心，但并未被党中央领导机构和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着中央领导，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的经验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排挤他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然而，教条主义在实际斗争中的不断碰壁，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人们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才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9页。

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也就意味着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遵义会议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了。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十年期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从而达到成熟的阶段。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发展而达到成熟呢？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造成的。

首先，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展开，客观辩证法空前明朗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变对中国的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使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也使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吓倒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动摇；在斗争的某些阶段，其左翼则会参加抗日，其右翼则会由动摇而取中立。地主阶级的左翼，即开明绅士的政治态度与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就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造成了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英、美等国的走狗也会遵照其主子的叱声，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甚至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也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国

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还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各种矛盾却表现得十分活跃，变化极其复杂，关系极其微妙，呈现出错综多变的局面。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我党充分认识、掌握这种矛盾状况，并制定正确的政策，促使其向着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是十分必要的；而伴随着这个促进矛盾转化的过程，必然会在理论上出现一个新的升华。

其次，这个时候，我们党已经走向成熟阶段，有能力驾驭客观进程，在处理错综多变的矛盾中做出新的哲学概括。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以后，取得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也经受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严峻考验；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的经验，也有同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经验。在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以后，党的指导思想真正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胜利地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在这个时期，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具体的运用和系统的展开。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等等方面，都形成了更加完备的理论和政策。经过十年的努力，毛泽东哲学思想最终为全党所掌握，成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统一的思路。

最后，这个时候，党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有条件消化

经验，进行哲学上的总结。我们知道，早在井冈山时期，党内就已经痛感需要更多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真系统地总结经验；但是频繁的战事，恶劣的环境，使之难以实现。到了延安，条件相对地好多了。为适应革命的需要，全党都抓住这个时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理论研究机构纷纷建立。研究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毛泽东同志此时也抓紧读书。他更潜心研究哲学，还组织了哲学小组，读了所有当时已经翻译过来的马列哲学著作。他不仅读马列的原著，而且还读了许多苏联和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写出了许多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第二、三卷的全部著作都是这时写的；周恩来同志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人为什么犯错误》，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个时期的客观环境使我们有可能开展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思想路线上统一全党。

延安时期，我党在独立地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实践论》和八月的《矛盾论》为理论标志，以一九四二年党的整风运动 and 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为历史标志。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深刻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全党能够从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胜利地开展新的斗争而写的哲学专著。这两篇著作植根于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交织着胜利和失败，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之中。它们对党的历史经验所做的哲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它们所放射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瑰丽光彩，是我党思想路线成熟的表现。

《实践论》抓住了实践观点和辩证方法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结合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际，以广大党员和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系统全面而又通俗生动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基础和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理论。其中许多解释和发挥很有独创性，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实践论》从认识论上对党内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剖析，深刻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实践论》通过总结我党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 and 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建设，对于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克服，都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矛盾论》抓住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系统地论述了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著作中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矛盾运动，结合我党领导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结合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倾向，指出不仅需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需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指出关于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这就从世界观的高度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著作中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无论就其集中系统或具体深入，都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不曾有过的；对于整个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也最集中、最系统、最完整。这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于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的清算，在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之前，曾经分别从军事路线和斗争策略方面进行过分析。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等著作就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许多思想，早在这些论著中就已闪出了光辉。从斗争策略和军事路线上对错误倾向的分析，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总结的基础；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总结，又是这一分析的发展和升华。因此，可以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看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

此后，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又把《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实际斗争之中，从而既指导了革命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思想。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后来的许多论著之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

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论著，都包含着丰富而精粹的哲学思想，都从多方面展开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深刻论述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并使之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化为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而运用自如的成熟程度。

一九四二年，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使广大党员对于党内的路线斗争从思想上、理论上加深了理解，从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坚持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的召开。“七大”所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又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认识，标志着党的成熟，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经过系统的论述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

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对人民的和平欺骗失败后，悍然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但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反而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七年，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便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在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从此，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来的剥削制度也就基本上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此期间，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成就是主要的；但是在工作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后来，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使党和国家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

前的“左”倾错误以来,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以“团结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总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几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折,社会的主要矛盾几经变化。波澜壮阔、丰富深刻、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要求人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去认识、去解决。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这个期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胜利,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在此期间,我们党继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发展的光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发展以一九五七年二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理论标志,以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为历史标志。

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同志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推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的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清醒地对蒋介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及时戳穿他的政治欺骗,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运用革命的两手战胜了他的反

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党的“八大”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都是十分及时而准确的。

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哲学。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军事辩证法思想，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世界战争史上独创的战略进攻。他根据这一军事实践总结出的“十大军事原则”，补充、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使毛泽东军事哲学进一步完善了。

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政治和经济、军事和文化、战争和建设、国内和国际等各个领域里的各种矛盾的过程中，运用和发展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原理，巧妙地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诸如，战争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政治斗争中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土地改革中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以及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区别大、中、小地主和地主富农中的恶霸、非恶霸的策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赎买政策等等，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进一步提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过深入而紧张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调查研究，集中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同志的智慧，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的建设经验，论

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十个至关重要的矛盾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报告，生动、具体地发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这个时期里，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了“八大”，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正确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且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强调以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为内容的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是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光辉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这个时期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下，我党认真执行“八大”的正确方针，细心地研究中国的实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结了所积累的重要经验，从而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向前发展。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一九五七年二月，在他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结合我党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又重提思想路线问题。他特别提醒全党：“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

它”^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学说贯彻到底，创造性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突出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现实状况提出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科学文化工作以及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都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期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我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但是，众所周知，我党这段时期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一系列“左”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同志通过纠正党的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失误，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转变了党的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曲折中发展。这个时期里错误的发生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从领导思想上看，偏离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轨道，偏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则是更为深刻的主观原因。在纠正这段时期内出现的错误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同志都作出了贡献。回顾这个阶段我党工作的转变，关键还在于首先抓住了思想路线的转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优良传统。一九六〇年底、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要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7、38页。

进行调查研究，号召一九六一年搞个“实事求是年”；重新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并就调查研究问题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跟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工作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论著，都从哲学上总结了经验教训，结合新的实践，深刻地论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些著作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的哲学著作。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扬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它对当时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即使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曾批判过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天才问题上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在实践上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运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形势，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在这个时期内，周恩来同志尽管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曾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这十年里，以高昂的代价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须臾不可背离；也说明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脱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谁就会演出悲剧来，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内。这使我们对坚持、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有正面的经验，又取得了反面的教训。这个经验和教训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从此，特别是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伟大的新时期。在这段期间里，党的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号召下，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景象。从此，党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主动地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开展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工作。一九八一年六月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地完成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号召。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与它相应的理论著作，《邓小平文选》就是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光辉论著。《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出版，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一个新阶段还刚刚开始，但是可以预料，在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学生、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首先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的大道；但又完全是中国化了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我们知道，一事物的特点，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相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它的特点必然是，也只

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表现。那种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基本的特点去寻找独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的想法，即离开普遍性去寻找纯粹的特殊性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或者一般地讲，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现这种结合，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任务和中心课题，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的根源和根本的途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特点上，有其独特的方面。

生动的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给自己创立的哲学正式命名，但对它的重要特点却作过明确概括，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①。毛泽东同志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时，也把实践性说成是它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之一。实践的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在理论上全面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一定要付诸实践，要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但又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称之为实践的哲学，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

^①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哲学，是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过若干重要环节，创造性地全面而深入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引入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活动，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化为一系列完整而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之与无产阶级政党、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变为现实，科学地、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成为卓有成效的实践哲学。这是十分突出的杰出之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个特点是由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特点的必然展开决定的。

一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一方面要从概念、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和严密的论证，完成一整套的理论创造工作，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必要的“书斋世界”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更为主要的精力放在理论斗争上，以分析批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当时他们的论敌多以理论家、学者的身份登场，斗争也带有学术理论的色彩。这在客观上就迫使他们不能不花很大的精力去从事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被追流亡国外达十年之久，这在客观上也给他们提供了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和著述的条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及此后的一个时期

里，也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俄国，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结合都不可能全面和深入。

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付诸实践，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运用中加以发展。近代的中国，地主阶级没落腐朽，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社会理论；资产阶级软弱，也无力创造什么新理论，从外国贩来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唯心主义、庸俗进化论之类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错误哲学倾向，主要不是，或者说几乎没有出现过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主观主义。它表现为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从抽象的定义、公式、“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或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反对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特别重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特别重视矛盾特殊性及其和矛盾普遍性的关系，注重解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登上政治舞台，便面临着紧迫的革命形势，全力以赴地投入一个接一个的实际革命活动，而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又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形势不允许事先从事许多哲学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着重研究和突出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只能是根据革命的需要选择理论，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就理论本身的需要去进行研究。刘少奇同志在谈到这一历史环境时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

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①。就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来说，他参加革命后几乎一直处于革命湍流的旋涡之中，戎马倥偬。尽管他对理论，特别是对哲学有特殊的兴趣，但却没有可能进入“书斋”去从事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撰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而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去研究解决某些哲学理论问题，把革命斗争经验加以哲学概括。毛泽东同志首先是革命家、战略家，然后才是理论家、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同革命、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寓于、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作方法之中，在结合和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是他的哲学专著也强烈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性这一特点。这种情况，表现出党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它也正孕育了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之伟大、效果之突出，是空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实践的哲学。

广泛的群众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马克思曾指出，他的哲学理论是要“说服人”，“掌握群众”的^②。列宁也强调：“马克思的哲学”“给了人类，特别

① 《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1页。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给了工人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只有在它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的时候才能完成，而它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过程中也必然会被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从广度、深度及产生的效果看，都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毛泽东哲学思想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成为群众的哲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广泛的群众性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首先表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当然也就是来自群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又有其显著的特色。它直接表现为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仅是指我党的领袖们、老一辈革命家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指它凝聚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活动中，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系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作为这些经验的哲学概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当然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血。不仅如此，人民群众对于这些经验也作出过自己的概括。这些概括有些作为原材料或半成品提供给毛泽东同志，有些则直接被毛泽东同志所吸收，写进他的著作或报告。毛泽东同志本人在许多论著中都明确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有些论断是群众的思想，有些连语言也是群众的语言。与广大群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众的集体智慧如此紧密地直接联系在一起，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广泛的群众性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还表现在毛泽东哲学是解放的哲学，是回到群众中去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变成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还把它和中国历史、中国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既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具有中国气派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便于掌握的哲学。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交给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发挥其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自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那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劝同志们学哲学，提倡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按辩证法办事，响亮地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毛泽东同志还曾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建议，在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在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要谈辩证法问题，要广泛宣传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的每一次努力，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使它更加群众化，更加成为群众的哲学。

完整彻底的党性

哲学的党性就是哲学中的党派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总结了哲学发展的规律，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对于思维

^① 引自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坚持并发展了恩格斯的基本原则,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党性问题,认为哲学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哲学中相互对立着的两个党派,哲学中的党派对立和斗争是现实生活中社会政治斗争的表现。列宁把坚持党性原则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伟大最宝贵的传统。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最伟大最宝贵的传统,而且在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方面更表现出其完整性和彻底性的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开展了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两条战线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在它那里,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因此,坚持唯物主义同坚持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同反对形而上学,是实现于统一的斗争过程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时,在坚持列宁所特别强调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也提到了应有的宇宙观的高度,把对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也提到应有的地位,从而把坚持哲学中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规定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要求无论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中,还是在他有关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论著中,抑或在党的全部活动中,都表现得特别显著。

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全面而彻

底地贯彻哲学党性原则的创造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能分家的。用世界观去观察、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为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指出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所经过的中间环节，而且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也作了十分生动丰富的论述，使哲学带上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实践哲学的必然产物。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哲学党性原则的贯彻，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表现在实践中；不仅对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而且对于实际工作中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倾向也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进行揭露、分析和批判。实践表明，对于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识别、揭露和批判，由于种种原因，比起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要困难一些、复杂一些。然而，毛泽东同志却善于发现，并给以恰当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对“本本主义”的批判，一九三八年的《论持久战》对抗战问题上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的批判，都是在问题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及时提出加以分析批判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党还找到了整风的方式，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路线，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为在实践中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开辟了新径，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四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方法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

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它还会在今后的结合过程中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概括，并且它还会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更加新鲜的经验。现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将进一步指导人们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而创造出新的经验，再做出新的哲学概括。因此，加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从根本上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高贯彻执行它们的自觉性，从而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引下，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革命就发展，斗争就胜利；当背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革命就要遭受挫折，斗争就要失败。这一点已经在革命和建设中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化为我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各个领域都生气勃勃。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显著。为了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上康庄大道，必须坚定地而又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就必须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陈云同志讲过，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主席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讲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①这里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就告诉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打下根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就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思维能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在我国，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最好手段。

^①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37页。

^② 《〈反杜林论〉旧序。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而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建设，都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它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指导人们在进行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地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地总结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走历史必由之路，而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它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批判地继承我国和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遵循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具体地说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认真地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党的有关文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进行学习和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理所当然地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然而，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列主义是一棵大树，而我们只是一些枝叶。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这样做既可以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源头，又可以更好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具体化、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是怎样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繁枝茂叶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中，同时也更具体、生动地体现在他的全部科学著作中，特别是有关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科学著作中。

这些都是很好的哲学教材。它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客观实际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生动范例，还告诉了我们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秘诀。所以，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不仅应当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应当努力学习和研究他的其他科学著作。

要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有关文件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关著作。一般说来，这些著作或文件，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发的，有的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某一指示而写的，有的是为了结合具体情况具体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的，它们往往更具体、更生动地表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人们所熟知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于哲学方面，以及关于经济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思想修养等方面的著作，都渗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其中，《邓小平文选》不但忠实地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它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学习这部文选，不但对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指导意义。列宁在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曾经说过：“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须要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①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72页。

学思想，也应当按照列宁的这一教导办事。

其次，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紧密联系我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我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实际，结合我党、我国的历史全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直接在我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这方面经验的总结。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条基本的线索。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只有通过党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的，才能具体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意义。如果对党的整个历史活动不熟悉，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内容、作用、特点及其意义，就会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还必须熟悉我党的历史，我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

最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完整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党的宝贵财富，现在和今后对我们的行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任意拔高或贬低的倾向都应当反对；因为这样必然导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党我国人民六十多年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那种以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为理由，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甚至把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错误倾向归罪于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想法和做法，也都是错误的。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采取坚持和发展的态度。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也必须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思想路线的解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会积累一些新经验。我们应当努力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进而从哲学上做出新概括，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发展。

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如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主要的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任何一个观点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体系中加以全面的理解，而不能任意地摘取，片面地发挥。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教条主义式地从本本出发，更不能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照抄照搬。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一定会把这一学习和研究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章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我们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为了做到这一点，一要开展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一要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着手研究并陆续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列主义，同时还开始学着用马列主义观察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党一成立就投入了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来不及从事大量的、必要的理论方面的准备。因此，许多参加革命的人并不甚了解革命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很少知道。在这种条件下，就比较容易出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着揭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帮助全党提高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在党内倡导学哲学，用哲学，把哲学逐步地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一 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澄清

党内一部分同志在知识问题上的糊涂观念，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不仅从根本原则上说明了一般知识的本质和来源问题，而且深刻地说明了哲学同实践以及哲学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揭示了哲学的源泉、对象、任务、地位和作用。这一论述不仅有力地廓清了历史上教条主义者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哲学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正确地说明了哲学的源泉问题。它告诉我们，哲学以实践为来源，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对于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知道，认识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②。人们的一切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离开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哲学知识或其他科学知识。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作为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有其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的特点。人们在实践中接触的客观对象，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人类社会。人们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获得的关于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经过加工制作，成为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分别归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又为哲学提供加工整理的材料。哲学正是在各门具体科学所提供的经验和知识的基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观点。由此可见，哲学和其他科学虽然都是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但这两种概括和总结又有区别。从层次上看，哲学作为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它是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而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过是社会实践同哲学理论之间的过渡环节；从范围上看，它是各个领域里实践经验的最普遍的概括，而其他各门科学不过是各个具体领域里实践经验的概括；由以上两点又决定了，哲学对实践经验的概括，比起各门具体科学来又是更为抽象更为间接的概括。尽管如此，哲学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实践经验的概括。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切断了哲学通过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同各种社会实践的联系，那么，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哲学就会变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变成不可捉摸的抽象的公式，变成枯槁的无生命的东西。

其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说明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问题。它告诉我们，哲学是研究普遍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的。

我们知道，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己任的。不以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是算不得真正的科学的。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无限多样性统一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由内部矛盾推动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都是如此，作为这两个过程的反映的思维过程也是如此。科学认识的任务就在于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它的本质，从事物的外部联系深入到它的内部联系，从大量的偶然性中发现它的必然性。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结晶，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的结晶，它们都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哲学和各门具体

科学一样也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在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又有其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的特点。我们知道，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规律都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矛盾、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包含着普遍性，而且这种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各门具体科学揭示各自领域里的事物的特殊规律，而哲学的任务则在于揭示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等一切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因此，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虽然都以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但是它们的对象和内容又是不同的。各门具体科学是概括和总结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的，哲学则是概括和总结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过程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类全部知识的结晶。

最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说明了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告诉我们，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并为具体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

我们知道，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认识总是从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关于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又能够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共同本质的认识。由特殊到普遍，又由普遍到特殊，循环往复，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扩大，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特殊本质的认识是关于普遍本质的认识的基础；关于普遍本质的认识是关于

特殊本质的认识的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关于特殊本质的认识和关于普遍本质的认识的关系。各门具体科学是哲学进行概括和总结的基础；而哲学一旦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概括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就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各门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以新经验、新材料、新成果丰富和发展哲学，如此循环往复，使哲学和具体科学都得到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虽然说的是一般哲学，但它的基本精神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这些特点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特征的分析也都是立足于这一基本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也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毛泽东同志在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时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社会化大生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科学的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到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自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然和社会的认识所达到的全部积极成果，诸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关于社会的理论，诸如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等关于自然的理论，批判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概括和总结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以具体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科学地概括和总结。建立在具体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给予各门具体科学以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保证它们的健康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又可以排除它们对于具体科学的干扰。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这种关系时，曾经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①这里虽然直接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毛泽东同志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具体科学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包含着各门具体科学成果中共同的东西；其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普遍地适用于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一切领域，适用于一切科学部门。可见这个“包括”不是整体包括部分的包括，而是一般包含着个别的包括。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主要地是强调两个意思：其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所要研究的特殊规律；其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具体方法，更不能代替在各门具体科学领域经过艰苦工作、深入研究而得出的具体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论述，是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观点，它自身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全面性。认真地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对于克服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两种错误倾向是很有意义的。有一种错误倾向叫做“代替论”，它片面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企图用它的一般原理去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这样做的结果，既扼杀了各门科学，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非常重视哲学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则是以取消被指导者的方法取消了指导者。十年动乱期间，这种“代替论”的影响极为恶劣，使我国的哲学和科学都深受其害。还有一种错误倾向叫做“取消论”，它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普遍性及其指导意义。实际上，哲学是取消不了的，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哲学的理论思维。恩格斯说得好：“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由此可见，鼓吹“取消哲学”，实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际上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代之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公开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还是不多见的，但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的确是存在着的。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必须使之摆脱“坏的风气”哲学的支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不仅说明了哲学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在劝同志们培养学哲学的兴趣，养成学哲学的习惯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和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方面，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观察和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创立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的唯物辩证法，并对这种科学方法作了极其深刻的说明。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唯物辩证法，意味着不是从事物的静止状态，而是从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去研究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历史上的一切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都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它们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和发展，又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必然衰落和灭亡。同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那些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如价值规律、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等等，同样也不是永恒的东西，而是历史上暂时存在的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从所谓永恒不变的抽象人性中寻找解释社会经济生活的钥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指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什么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的“自然秩序”和“一般社会”，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资本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时候，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当它逐步地转化为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一定要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而代之以新的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研究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①。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极其深刻的经济分析，揭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不可避免性，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 and 新社会创造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②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9页。

② 同上书，第599页。

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①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体现在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然后又分析了这些矛盾在货币、资本等现象中的发展，终于发现了资产阶级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他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 毛泽东同志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伟大发现时指出：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③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实现政治经济学中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② 《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的革命变革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正是凭借唯物辩证法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才能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①

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创立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为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希望改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又寄希望于天才人物出现，劝说资本家放弃剥削。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②所以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现象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随着生产的高度的充分的发展，这种现象必将失去存在的根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不仅促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且准备了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行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此，社会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②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主义就不再是伟大人物头脑中的天才发现，而是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实现了伟大的革命，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过，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应用于分析社会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极其伟大的成功，其中就包括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伟大的成功。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几门学问，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因此，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①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作这样明确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概括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斗争实践服务的阶级本质和社会作用，从而跟一切剥削阶级的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全部意义，都可以从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中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得到科学的说明。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哲学的阶级性，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加以强调并做过深刻的分析，而且坚持用这种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哲学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所有的哲学学说都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哲学的命运要看它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哲学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除了有其认识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都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在阶级利害上的冲突。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家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总是被他们所属的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地跟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利害联系着的。哲学上一定倾向的贯彻，实质上就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的特殊形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哲学虽然早在原始社会就已萌芽，但作为自觉的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则是在阶级出现以后形成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为着维持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歪曲现实，阻碍历史发展，因而支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革命的进步的阶级为了争取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则需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促进社会变革，因而支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各种不同的哲学学说，都是适应一定阶级的需要，由一定阶级的人们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这种情况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①可见，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哲学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没有阶级性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的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不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阶级性，单此一点并不足以把它同其它哲学区别开来，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申明自己的这种阶级性。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它的根本利益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同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承担着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敢于揭示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它要彻底消灭阶级以及产生阶级的一切可能，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事业服务的。它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上论证无产阶级的理想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为无产阶级制订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真理性，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阶级性和真理性，革命性和科学性，都是统一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坚持阶级性和坚持真理性是一回事，所以它也就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阶级性，而是敢于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为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而斗争。这是那些明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偏要打着全人类哲学的旗号的资产阶级哲学所不可能做到的。

毛泽东同志把实践性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显著特

点，确实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早就把他们的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论述一切哲学问题时，都是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把实践作为论证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们的哲学观点中鲜明地表现出实践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把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都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又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要付诸实践的，是要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无比巨大的力量，之所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如果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践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保证它的正确，推动它的发展，也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个统一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特别要为无产阶级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哲学要为政治服务，政治革命要以哲学革命为先导，这是恩格斯早已指出过并已为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为无产阶级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最显著特点的内在本质和根本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以及本阶级的利益和使命。无产阶级根据这种认识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从根本上说明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说明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科学的说明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①这个“大喊大叫”是指舆论准备；而这个舆论准备之中哲学上的论证是基础的东西。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地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揭示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而确定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推移，指出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后，主要矛盾变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①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6页。

盾，从而及时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基本消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新变动，及时指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经济建设，向地球开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出了工作着重点应当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并反过来从根本的世界观上论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保证它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②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为我党制定了各个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以及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保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化为人民群众的实际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向群众解释这一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基础和根据，使群众了解它的正确性，从而提高执行它的自觉性。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9页。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路线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时，不仅要为无产阶级的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为无产阶级制定战略策略提供理论基础，而且还要排除各种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特别是要批判作为各种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理论基础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同各种错误哲学的斗争中，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并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内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时深刻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反对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时候，基本的任务是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论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乃至论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的一切科学著作，以及我党其他领导人的重要理论著作，始终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反复论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危害无产阶级事业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有效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实践服务，也正是在这个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斗争实践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学习和掌握它的时候，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就会是格格不入的；最多也只能记住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某些词句，而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实践反复证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一切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人，经过长期的学习、锻炼和改造，都能够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那么，我们要学习和掌握它，就必须把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认真读书，掌握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因此，要学习它、掌握它，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同现实的生活、群众的斗争、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学习哲学只停留在书本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死板的教条，这种学习方法本身就是违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的。

三 把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扎根于工人阶级并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掌握的时候说过：“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工人阶级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工人群众手中的武器，工人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自觉战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是剥削阶级的哲学。它们的任务归根到底都是为某种剥削制度提供论据。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哲学学说，也不过是为了论证一种新的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旧哲学的这一共同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只能是一种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哲学，只能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个变革也在哲学与群众的关系上深刻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则以广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泛的群众性为其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们不止一次地强调哲学解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毛泽东同志则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基础上继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的事业。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①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②他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形式。为了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动手编写教材，讲课做报告。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就是这种教材中的一部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反复强调和大力倡导，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不断提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得也越来越好，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们更加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为哲学解放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与旧社会广大劳动群众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被盲目的必然性所支配的情况相比，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是比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一步调动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这又给哲学解放事业提出了更

①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高的要求。正是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同志先后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哲学解放的号召和指示。他一再强调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进一步说明了哲学解放的伟大意义，指出了哲学解放的根本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哲学解放的理论和实践，使之更加深刻，也更加具体化了。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说明哲学解放的意义的呢？

首先，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共同的思想方法，就能够极大地增强革命团结。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很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我们知道，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即使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事实，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就会有扯不完的皮。其结果是革命队伍涣散，革命和建设事业受害。反之，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分歧不难解决，有错误也容易纠正。其结果是革命团结增强，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

其次，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能够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强调指

^① 引自 1966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出，不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我们还缺乏经验。要取得这个经验，一方面要靠自己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另一方面还要向外国学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不正确，就要犯错误，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为此，毛泽东同志经常说：“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①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最根本的就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端正思想路线，真正按照唯物辩证法看问题，办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来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反面和正面深刻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了解剖自己的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7页。

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①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仅要求充分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求高度成熟的精神条件。愈来愈多的干部和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条件。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一分为二地看自己，多想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才能真正懂得有改造自己的必要。毛泽东同志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②因此，哲学的解放，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既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是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重要的精神条件。

哲学该不该解放和哲学如何解放，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进一步解决了哲学应该解放的问题，深刻地论证了哲学解放的必要性，而且还以他自己的光辉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把哲学群众化的典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哲学如何解放的问题，明确指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容，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表达出来。

以通俗的语言，讲干部和群众亲身的经验，深入浅出地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同志一直是这样做的。为了解释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唯物主义道理，他把调查比作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0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他把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方法，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口诀；把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毛泽东同志还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用箭和靶的关系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这些道理早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熟悉，并在日常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关于对立统一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用“一分为二”、“两点论”、“对子”、“不是冤家不聚头”等等来表述。他把形而上学叫做“一点论”、“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顾一头”、“单打一”、“单干户”、“不搞对子”、“唱不得对台戏”、“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等等。所有这些提法都既准确深刻，又生动形象明白易懂。讲哲学应当处处考虑到怎样才能便于群众掌握，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原则。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以通俗的语言，讲群众切身的经验，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广大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毛泽东同志以自己的实践，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其次，要让广大干部和群众经风雨、见世面，在与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解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从理论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二是使广大群众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不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就不能抬头，就谈不上哲学的解放。毛

泽东同志多次讲到，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他主张应当在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学习辩证唯物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十分严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它要求人们完整准确地掌握这个科学体系。所谓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就是在谈唯物论时不忘辩证法，在讲辩证法时不忘唯物论，把二者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基本原理尽管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本身总是既有唯物的方面，又有辩证的方面。“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但其中也包含有辩证的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一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是讲唯物论；“求”就是要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研究，其中就有辩证法的道理。同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命题中，“处理”矛盾是问题的辩证方面，“正确处理”，即主观符合客观，则是问题的唯物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总是完整准确地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以此教育干部和群众；同时又总是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唯物论，并发动群众参加。这样一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能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分清什么是唯物论、辩证法，什么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提高识别力和战斗力。

再次，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行各种工作方法的实际过程中学到活生生的唯物论辩证法。

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是在它的指导下结合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它本身就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我们党的总路线都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的，其中体现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体现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为党制定的对敌斗争的策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贯穿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贯穿着辩证法、认识论的原理，而且还贯穿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如此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的长期培育下，我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不仅告诉群众必须要这样做，而且还告诉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也就成了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的过程；而广大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也就成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样就能使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在执行中又进一步学到活生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

最后，要把骨干的提高和群众的普及结合起来，使哲学解放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哲学解放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它同任何群众事业一样，需要把专业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既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又要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人民都要努力

学哲学，养成学哲学的习惯。哲学的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骨干的提高能带动群众的普及；群众的普及又促进骨干的进一步提高，并逐步扩大骨干队伍。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哲学解放的事业广泛深入持久地发展。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多次说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五五年三月，他提出，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要做出计划，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并且发出了“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号召。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思想，是他关于哲学解放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战略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为我们开辟了如何从思想上、组织上建设、扩大、提高这支队伍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同志以自己的光辉实践为我们具体地指明了哲学解放的根本方向和正确道路。哲学解放的思想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论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对这一胜利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提出了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这是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

我党六十多年的光辉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归结为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问题，并把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作为贯穿一切的根本指导原则，看作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春的一次谈话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意味深长地讲：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

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他还反复地说：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①

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就是主观要符合客观。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这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从他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就在实践上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努力。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明确地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无论总结军事路线、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都总是要归结到解决主观和客观一致的问题，郑重地把它提到全党面前。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分析如何学习战争规律时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同时，他还由战争问题推及一般问题，说人办一切事情都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③。在专门对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总结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从一般意义上做出了普遍性的结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

① 参看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杂志1981年第13期。

② 《反对本本主义》，第4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中失败。”^①实际上，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代表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要旨，就是反对看问题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也是主观性），要求人们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问题，从而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

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或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总是提醒全党注意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使二者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他及时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②。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他多次提醒并引导人们解决主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全面展开时，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十种矛盾，要求全党同志正确处理。随后，在一九五七年，他又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矛盾，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③在以后许多年里，毛泽东同志一有机会就要谈到如何正确地反映和解决这个矛盾，以达到主客观一致。

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如此强调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并把它当作一条根本的原则呢？

首先，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能否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8页。

我们的党是革命的党。革命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具体对象是中国。要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命，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要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而奋斗。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方面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必须了解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等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哲学上讲，这个问题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它的解决取决于正确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二者的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为，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无的放矢。这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态度，完全忽视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则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态度。按照正确的态度，坚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就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就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按照主观主义的态度，实行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就不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就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此，要想实现这种结合以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首先就必须全力捕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在正确认识它的基础上去正确地解决它，以达到主客观的一致。

其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坚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路。

我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斗历程表明，在找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并在实际活动中遵循这个根本的指导原则之后，革命事业才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时，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主观和客观相脱离时，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失败。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总结我党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出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一条根本的原则，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路，并用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民主革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初期，我党的同志们在主观上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理解不深，对中国的国情也了解甚少。党的历史上之所以出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究其思想的原因，就在于主观和客观不一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陷入了盲目性。这一用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的。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以此谆谆教导全党。

最后，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问题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也是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最重大的问题。坚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做好一切

实际工作的基本前提。

我们知道，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发展的历史，概括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认为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对于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概括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丰富内容，根据当时认识论在整个哲学理论中显得特别突出的新情况，把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以及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概括为两条认识路线，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依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从事的一切实际活动，概括起来不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这两项活动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所谓认识世界就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所谓改造世界就是主观改造客观的革命实践活动，按照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客观世界。无论哪一个过程，都是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矛盾的过程，都一点也离不开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对客观世界正确的认识和改造，就是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①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错误的思想和行动则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表现，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作祟。

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加以哲学概括时，明晰而集中地提出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是一条根本的指导思想，这同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同列宁关于两条认识路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列有关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化。这不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而且对各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普遍的哲学指导意义。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所形成的关于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也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说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呢？

首先，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过程中始终全力抓住的一个大课题。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即使有了正确的认识也不能完全保证实际的革命行动的胜利；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更是不可设想的了。因此，要想胜利地改造中国，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担负着正确地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一直紧紧抓住这个问题，提醒全党一起注意解决。作为这方面实践经验总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必然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中心。

其次，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本质的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结果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就其产生来说，它是在实现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现这种结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本质的任务。很显然，在具体实现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取得正确的认识，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去发展这种认识，并且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正确的实践，以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关键的关键就在于从世界观的高度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不完成这个任务，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也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

最后，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是贯穿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方面的根本思想，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实际上都是它的展开和具体化。我们知道，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而其基础则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所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也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建立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群众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主客观统一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矛盾的分析，无论从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还是从思维领域，都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达到主观和客观统一这一主题展开的。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本身就是正确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和结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论述，是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中最为灿烂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还把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根本思想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为基本指导思想而展开的；反过来，又使这一根本思想具有活生生的具体内容，并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二 主观和客观统一的 具体性和历史性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①，唯物地辩证地论证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进一步把主客观的统一明确地规定为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用简明的语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一切正确的思想和行动都必须为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动，都离开了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具有抽象和僵化的特点。从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可以引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背离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可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因此，要反对各种错误思想，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坚持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正是从哲学上概括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前夕，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曾经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既取得了革命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当主观和客观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时，革命就会胜利；否则革命就要失败。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切实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的时候才找到的。在马列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都是这样阐述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群众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占领农村。这一科学的认识，符合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客观实际情况。列宁、斯大林遵循这条道路，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党成立之初，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中心城市，搞工人运动。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党逐渐觉悟到，武装夺取政权虽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但是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在中国却是走不通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又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为了找出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革命者必须把自己的认识同中国当时的具体的客观实际相符合，达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其次，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产物，是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

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及随后出现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其思想认识根源而论，都属于主观主义，有的表现为教条主义，有的表现为经验主义。其中给革命带来损失最严重的是王明的教条主义。他们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然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也就不可能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使人们懂得：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不达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最后，坚持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中国具体地表现为：怎样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怎样对待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还是看作活生生的发展的理论？是寻章摘句，把它当作不变的公式任意套用，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去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是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还是熟视无睹，漆黑一团？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只凭热情愿望办事，还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客观情况办事？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这些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毛泽东哲学思想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不仅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把它们提到主观和客观关系的高度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把达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做为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总结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思想，在《实践论》中第一次作出明确的概括。然而，这一原则的内容早在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就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来了。一九三〇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对“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靠“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和“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安于现状，不求甚解”，“饱食终日”，“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讲话一向是“老生常谈”等等的批评，就是在揭露那种违反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思想 and 做法；而所提出的“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则是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怎样理解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呢？

我们知道，客观就是我们头脑以外的一切事物，主观就是我们的思想；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就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主观和客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能够统一的，主观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的。这一点是绝对的，确凿无疑的。否认了这一点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每一主观对于客观的符合，又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否认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形而上学。

主观和客观具体的统一说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符合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主观对于客观的符合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任意的；另一方面，主观对于客观的符合，要受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的制约，而不是超越具体条件的抽象的符合。关于第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主观是否符合了客观不以主观上的夸张和自己感觉如何而定，多次强调不要以自己的想象去代替客观现实。这些都已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了。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突出地论述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主观和客观及其统一都是处于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具有一定特点的。因此，主观对于客观的符合，也必定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对于处于一定具体条件中的客观实际的符合；只有这样的符合，才是真正的统一，才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离开具体条件不可能有主观和客观的符合，也无从谈论主客观是否符合。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抽象的、一般的统一。一般的东西决不能脱离具体的东西而单独存在，同客观相符合的认识，必须从对于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研究中得出。我们承认普遍的真理，但也强调这种普遍性仅仅在于它概括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本质和规律，而从不认为它是包罗无遗的，在一切条件下对于一切事物的一切方面都是完全符合的。列宁早就指出过：“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①所谓“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理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就是要使主观和客观达到具体的统一。不要把一般原则看成是可以离开具体的客观实际而可以到处套用的纯粹的一般。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②“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

①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①

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历史的统一。历史性是专从时间的角度讲的，也是具体性的一种表现。由于它有特别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常常单独提出加以强调。历史的统一说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符合是变动的、发展的；它随着客观事物和人们认识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而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列宁说得好：“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②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是一个过程的道理，把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看成是一次完成、永远如此的，不愿意对发展变化了的客观事物重新进行深入的认识，不愿意根据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检验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达到新的一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党历史上这种观点所造成的危害，每当形势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时，总是提醒全党：“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事物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上都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综上所述，坚持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认识论上的唯物论；坚持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是认识论上的辩证法。

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是整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的。我们知道，主观

① 《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4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页。

和客观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二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正确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正确的实践是根据正确认识的做或行动。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实践，都只能在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实现。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问题时对于这一道理做了深刻而具体的说明，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所谓“着眼其特点”，就是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一。所谓“着眼其发展”，就是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历史的统一。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而且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认识和实践的领域。

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一条正确的原则。它的正确性是由客观世界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原则全面地概括了客观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绝对性及其具体过程的相对性。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我们知道，主观所反映的对象是客观世界，所要改造的对象也是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本身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这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必定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① 主观只有随着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才能保持它和客观的符合，达到主客观的统一。然而客观世界无限的发展是通过具体的运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对于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对处于某一发展阶段中的事物的认识来实现的。离开这种认识去谈论对于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认识不仅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要同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阶段相适应。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既是无限发展变化中的统一，又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历史的统一。

我们知道，主观所反映的客观世界表现为采取某种具体运动形式处于某种具体运动过程中的具体事物。任何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它还包含有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无特殊性即无普遍性。由此决定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①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又都带有特殊性。人们的认识不应当停留在关于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上。“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燥的和僵死的东西。”^②可见，必须对于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研究，从中取得对于同类事物带有普遍性的一般认识，把它作为对于具体事物进一步进行具体研究的指导原则。事物中这种具体和一般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也就决定了我们认识中的具体和一般的统一，特殊和普遍的统一。认识是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但是如果不对具体的事物进行具体的研究从而达到具体的统一，那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一番道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客观实际情况所取得的正确认识。在这个一般原则的指导下，列宁又对俄国革命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符合俄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从而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时，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必须在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使之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符合，达到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主客观具体的统一。只有这样，才不致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才能发挥它在改造中国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革命作为一个过程，它也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矛盾的推移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人们的认识，党的战略、策略也必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达到主客观的历史的统一。只有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而永远不会过时，才能发挥它在改造中国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相反地，如果离开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的特点，用过去的、外国的东西来剪裁中国的实际，背离了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原则，势必把革命引向失败。

其次，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原则全面地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以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人类认识的本性、使命而言，认识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认识的主体总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人，认识的对象又总是处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具体事物，因此，具体的人对于具体的事物所形成的具体的认识又是有限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由此，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必然表现出具体性和历史性。列宁所讲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②，“真理是过程”^③，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②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也就是这个意思。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而且从发展上看，这种反映总是日趋正确的，因此，真理具有绝对性。但是，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常常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因此，人们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和包罗无遗的，真理又具有相对性。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必须跟着推移和发展，使主观认识和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相符合，达到主观和客观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具体的统一。如果主观认识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思想僵化起来，即使过去取得的真理性的认识，也只能被当作历史的陈列品放在真理的博物馆，而不能正确地指导当前的实践。不了解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也就不容易理解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道理。

纵观我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哲学思想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实际活动中的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其思想根源都在于不懂得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不懂得或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在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时必须同中国实际取得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①在我国革命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分割开来，具体的表现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表现是把相对真理夸大为绝对的绝对真理，从而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关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论述，都是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的正确认识。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它们同一切真理一样，也具有相对性，不能无条件地到处乱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如果不具体地分析当时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而机械地照搬，就会背离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要求，造成错误的认识及其指导下的错误的实践。前面曾经讲过的王明教条主义者在对待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做法，就是突出的一例。

把自己过去取得的仅仅具有局部意义的经验夸大为普遍的东西，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任意搬用，也会造成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分析过这种情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者刻板地抄用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北伐战争发生在国内军阀混战、全国革命处于高潮之中，国共两党合作、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处于低潮，红色政权为白色恐怖所包围，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全国政权，能够调动全国的反动力“围剿”红军。不承认这种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呆板地移用哪怕是过去自己正确的成功的经验，也是要犯错误的。这种把自己过去取得的经验绝对化，从而脱离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造成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错误，在实际生活中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一方面因为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另方面人们往往对自己亲身取得的真理容易由于感情至深而夸大它的作用。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

或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尖锐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方式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这时，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熟悉而此时已不能再用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从而导致了多年来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城乡阶级斗争政策和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这种由于违背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而造成的深刻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另一种表现是把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当作真理，从而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认识落后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另一种情况是认识超越了客观实际发展的历史阶段。

我们知道，由于人们的认识总要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因而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事是常有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情况长期存在，而应该尽快跟上客观形势，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在行动中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北伐战争后期，陈独秀看不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基本思想仍然停留在旧民主主义上面，认为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

阶级的胜利。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是幼稚，在国民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只能处于帮助的地位，在野党的地位；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思想认识远远落后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造成了主观和客观的分离，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造成主观和客观的分裂，往往是犯右的错误；但有时候，也表现为“左”的错误。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采取的关门主义策略，就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没有看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思想落后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结果。

我们知道，由于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有时也会跑到客观实际的前面，超越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跟那种预见事变发展的科学预见不同，这种人看问题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理论原则出发，或者把幻想当作真理，或者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这种思想在行动上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左”倾错误，都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顾中国革命还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在当时去完成。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九五八年在指导方针上出现的“左”倾错误，也是由于当时的认识超越了当时的情况造成的。

总之，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使我们的主观同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实践，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三 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唯物辩证地回答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论证了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且还对于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关键，作了深刻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指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以及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然而，如果摆正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也就能够提高正确反映和处理这一关系的认识能力，从而也就保证主观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并进而改造客观。因此，也可以说改造主观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调整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责任；而承担这一责任首先必须抓住并正确解决它的中心问题，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为此，必须不断地改造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克服二者的分裂，达到二者的统一。可见，正确地改造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解决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统一的关键。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主观和客观关系的论述，总是归结到这一关键问题上来；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时，又总是从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入手。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心意思就是努力避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达到二者的统一。

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客观是独立于主观之外的，是第一性的；主观是依附于客观的，是第二性的。它们之间是对立的，是有严格界限的。然而，客观可以被主观反映，主观还可以反作用于客观。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可以过渡的，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改造主观同客观的关系，就是要反对脱离实践，把主观和客观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或抹杀主观和客观原则区别的唯心主义观点。

在改造主观同客观的关系中，改造主观这一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的状况直接决定着能否实现主客观的统一。我们知道，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但是，对于同一对象，不同的人，或者主观状态处于不同情况的同一个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反映。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是一样。由于改造者的主观状态不同，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和结果也会显出差别。毛泽东同志多次阐述过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在谈到战争问题时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可见，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避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从而正确地反映客观，有效地改造客观，关键是改造主观世界。

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很多方面，如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平，搞通思想方法，端正思想作风，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等等，但从根本上讲主要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要树立唯物辩证观点，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大敌。不打倒主观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抬头。因此，克服主观主义是改造主观世界活动中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过极为严重的损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出现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郑重指出：“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

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们在认识上和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都是那个思想不对头，主观与客观实际不符合，不统一。其思想根源在于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没有摆正。有了这种主观主义的毛病，就不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不能客观地、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反映世界，就不可能取得正确的反映；从而也就不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去有效地改造世界。当然剩下的就只能是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或空想当作客观的实际，或者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外国革命经验，或者把自己局部的经验夸大为普遍的经验。可见，主观主义是人们犯错误的根本的思想根源，不反掉主观主义，就难以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历史责任。在革命和建设中，新

鲜事物层出不穷，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所有这些，都是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使之统一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关系的改造必须在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中进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才能得到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才能发展和提高。这是一个基本的途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改造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乃是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提出的一个任务；如果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产生改造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这后一改造也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

其次，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关系的改造，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进行。改造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把主观改造得符合客观，改造得具有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从而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同一切能力一样，属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0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7页。

于认识的范畴，是从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离开实践，这种能力就无从获得和提高。

最后，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才能充分暴露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提供解决这一矛盾的条件，并检验这一矛盾解决得是否正确。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产生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地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人们在客观事物上留下了自己主观方面的印记，从而发现并验证自己的认识能力，了解自己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矛盾的情况，以便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性，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行改造；也只有以这种斗争实践为动力，才可能推动主观认识的产生，以及认识能力的发展和提高。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指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①

无产阶级改造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任务，并不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发地完成的，而是在这个斗争实践中自觉地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而逐渐完成的。因此，要改造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除了积极投身实践斗争之外，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常地开展思想斗争。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页。

第三章 论实事求是

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条根本原则；而实现这个统一的途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以及我党其他领导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

我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可以简明地归结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生命线。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要把它当作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

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①

“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该书作者班固赞扬汉景帝的儿子刘德治学态度时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把它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是。”可见，“实事求是”原是讲人们治学的正确态度，说做学问应该是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事实中求索其真相，引出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的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实事求是”一语经过一番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讲到实事求是的含义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使之具有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

实事求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长期以来武装了全党，并为全党所公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以“实事求是”给中央党校题词，还以“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周恩来同志也曾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③。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都进一步明确肯定了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这不单是由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2—793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③ 《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册，第342页。

于实事求是这一表述简明通俗,主要的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为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并未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真正结合。党的创立时期,象陈独秀这样的人,虽然对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缺乏真正的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没有理解。他把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硬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头上,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主观主义的、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导致了我党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曾经连续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象王明这样的人,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却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他们只会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们犯的也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曾经严厉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在毛泽东同志看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来，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能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能够胜利发展；什么时候不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到挫折失败。

“实事求是”这简明朴实的四个字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容。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根本思想，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哲学命题；它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来看，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两个方面。对后者毛泽东同志又通俗而形象地使用“有的放矢”来表述。实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全部内容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尊重客观实际、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唯物主义原则；体现了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研究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辩证法精神；体现了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辩证历史观的根本原理。实事求是就这样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把世界观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成为全党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 从实际出发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主张的“原则在前”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深刻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他精辟地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

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从原则出发，还是从客观事物出发，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或者一般地说，在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以什么为出发点的问题。诚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原则、普遍的真理，中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研究面临的实际情况；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它当作宗教的教条，也不能把其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作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我们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所采取的正是这种不应当采取的态度。他们无视客观事实，无视客观规律，用一些抽象的概念代替具体的事物，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列宁曾经指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②从实际出发才是马克思主义“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早在学生时代，他就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 《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267页。

十分重视学习社会、了解实际，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他常邀集同学徒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至八月十六日他与肖子升一起到长沙、宁乡、安乡、益阳、沅江等五县做过调查。投身五四运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思想更加自觉、明确。他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曾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此期间，他曾利用机会进行过农村、工厂和社会其他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可见，在他实现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期间，强烈地表现了面向实际的求实精神。

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逐渐明确地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就为解决“分辨真正的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过实际的分析；为答复当时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实地到湖南省湘潭、湘乡等五县作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为了纠正党内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他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主张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必须反对本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本主义，根据“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和审察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①；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②，“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党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王明的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时，多次反复地强调，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关于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④；“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⑤。这里所讲的“研究情况”、“看问题”、“讨论问题”，就是讲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讲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客观的真实的的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

① 参看《反对本本主义》，第3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④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5、757、759页。

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实出发”都是“从实际出发”的不同说法。可见，从实际出发乃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什么是实际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从分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根本矛盾的角度，对“实际”作了科学的规定。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属于主观世界，而“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都是研究的客体。“实际”指的就是那些被认识被改造的“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客观的情况。我们就是以这个实际为出发点，从中“求”出“是”，发现它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比如研究中国革命，就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包括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等等。我们应当从敌我友各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探求其内在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就从事战争来说，我们“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②。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分析，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光辉范例。他从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4—165页。

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样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出发，分别分析了中日双方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特点：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又先天不足，退步，寡助；中国是弱国，但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具有进步性，得道多助。这些特点都是事实上存在的贯穿双方一切方面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全部基本要素。通过对它的分析，找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科学的结论。

就从事具体工作来说，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毫无根据地乱说一气，同样是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的。无论做任何工作，无论是制定方针、政策，还是执行方针、政策，都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才能找到行动的向导；离开了“实事”，不从实际出发，是得不到事物的规律性的。毛泽东同志曾严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的，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①

总之，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而要得到这一规律性，就必须到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为此，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要义。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不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且也是一个彻底的辩证法原则。它既反对主观地看问题的唯心论，也反对片面地看问题的机械论，坚持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来解决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

实际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实际出发所讲的实际，不是片面的、个别的事实，更不是随意抽取的一种事实。列宁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可见，单单知道要从实际出发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知道要从什么样的实际出发；否则，是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的。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种事物都处于普遍的相互联系之中，任何事物都由许多方面构成，并且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而存在。正因为一切事物本来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结上，即从矛盾的总体上去把握事物。列宁曾经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错误和防止僵化。”^①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看问题要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他说：“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②他还形象地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③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只有在客观对象的总和及其联系中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真理是全面的”，“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象独立的和单个的(独自存在着的)。”^④因此，随意抽取的那些片断的、个别的事实，或者罗列的那些一般的事例，尽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决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是从典型的实际出发。

我们知道，要做到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必须详尽地占有材料，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当然，这并不是说材料越多就越全面。真正的全面应当是从材料的总和中、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这就需要抓住特点或要点。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抓住最能表现特点或要

①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③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5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209页。

点的实际事物或事实。

所谓特点或要点，指的就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知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因此，从实际出发，就要从无数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抓住能够决定事物本质的事实、事物、现象，从大量的繁纷复杂的材料中，找出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最富典型意义的材料。捉住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才能认识客观实际所固有的内在联系，认清其本质，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既抓住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又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全面，才是从客观实际的总和及其联系中掌握实际。如果抓不住最能体现决定事物本质的事实、事物、现象，那么，即使对客观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多，也不能全面把握事物。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他在回答“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这个问题时说：“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①在战争中，“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②。假如舍弃了主要的实际，而去抓一些细枝末节，那么不管它们是多么真实的存在，从中也是不能“求”出“是”的，因为它们

^① 《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不是典型的、最能表现特点的“实事”。在今天，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安排工作就必须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为出发点，我们的经济建设又必须从我国人多、底子薄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要不得；不懂得从最能代表本质特点的、典型的实际出发的经验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是从具体的实际出发。

我们知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客观事物或现象都是具体的，有个性的。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认识客观实际，首先是从具体的事物入手。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恩格斯也指出：“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②中国文字中的“实际”一词，本身就有实在、具体的含义。从实际出发，言下之意就是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从处于一定时间、空间内的具体的事物或现象出发。为此，“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③。只有通过分析具体的事物，研究了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了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之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和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真理是从对于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中得出的。从实际出发就要对具体事物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发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现特殊的事物和普遍的事物这两个方面及其联结，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联结，以及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只有这样，才能暴露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做到实事求是。通常说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办事，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①等，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去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相反地，如果不从具体的实际出发，而从一般的实际出发，那么实质上仍是不从实际出发。一般的实际是表面的、笼统的、空洞的、抽象的。从它出发就不能深入到实际的内部，找出客观实际的内在规律，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如果说从一般的实际出发也可以得出一般的认识的话，那也只能是一些老生常谈、党八股。教条主义者和不愿对具体事物进行艰苦分析的懒汉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说的话，做的决定，似乎没有什么大错，然而却是同实际问题不沾边，是任何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②教条主义者们的做法是同马克思的做法直接违背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是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不仅是有联系地具体地存在着的，而且还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

①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4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2—13页。

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是无穷的。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到客观实际的这种运动变化发展；看不到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把以往的实际当作当前的实际，从这种实际出发，以不变应万变，同样会陷入抽象的、空洞的研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同样不能称作是从实际出发。在军事条令上或工作指示中，常常规定有“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其中就包含有当客观情况发生了出乎预料的和不可抗拒的变化时，人们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去处置，意思就是要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从实际出发，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出发。

我们知道，“实际”这一概念，按照我们汉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一种是指人们的实践。在毛泽东哲学著作中，“实际”的含义往往是双关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实际。我们说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求根据客观情况办事，而且还要求根据社会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的情况办事。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一回事，从实际出发本身就包含着要尊重群众。群众的利益、群众的觉悟、群众的情绪等等，都是我们制定方针、政策时所依据的重大实际。我们应当办也只能办那些群众想办的事，而不应当办那些群众不愿意办的事。

总之，要真正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全面的、典型的、具体的、发展着的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离开这种实际，就不是真正的实际；不从这种实际出发，就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

应当从实际出发，不应当从主观愿望出发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常常出现不能够或不敢从实际出发的情況。这里边有一个迷信的问题，主要是迷信“本本”和上级的指

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从实际出发时总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必须解放思想，必须从“唯书”（迷信“本本”）、“唯上”（迷信指示）和“唯我”（迷信自己）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和从出发是同一事物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从实际出发就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做不到从实际出发；而解放思想不是离开实际，恰恰是要把思想解放到实际上来，离开实际的解放思想则是胡思乱想。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实事求是，“唯实”而不“唯书”、“唯上”和“唯我”，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思想是否真正解放了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实际出发，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不是只指某些事情或某些人而言，而是体现在一切工作之中；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定工作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无疑地应当从实际出发；就是执行任务，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地也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把党的指示和自己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能形式主义地机械地照办、照抄、照转。“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当然，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能借口“从实际出发”而各行其是，不去认真贯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正确指示。需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4页。

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①党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上级在下达正确的指示时，已经考虑到各方面千差万别的情况，同时又鼓励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既要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上级的指示，又必须认真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这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应当正确地加以处理。

三 有的放矢

从实际出发，是为了从客观事物或现象中引出其内在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还必须对于来自客观实际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即使占有的材料是真实的、丰富的，如果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那么也只能是徒有好的开端，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从实际出发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为此，我们就要象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教导的那样，从实际出发，占有大量的可靠的材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指导我们对材料的研究工作，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为例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说明。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3页。

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②“有的放矢”这个又形象又恰当的比喻，不仅说清了理论和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实事求是的途径。

从实际出发和有的放矢是实事求是的两个侧面。它们同时贯穿于实事求是的整个过程，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一方面，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我们知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想象、热情和愿望出发。但是，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还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指导，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看待实际，确定可靠的出发点。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根好“箭”，选“靶子”的事就无从谈起；即使去选也是选不准的，想做到前边所讲的那种真正的从实际出发是不可想象的。教条主义者把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看待。他们单凭摘引一些只言片语去套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当然就不会想到如何选靶子的问题，如何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问题；而是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主观地乱放一顿了事。经验主义者确实接触了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好象也在从实际出发；然而他们不过是在辛苦地然而盲目地乱碰乱撞，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看不见实际的全局，得不出对客观实际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见，从实际出发，以及对实际的科学的研究，都一步也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从实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778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际出发本身就体现着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没有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为了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提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我们是为了射“的”而去掌握“矢”的。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更要对准中国革命这个靶子；也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才能检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见，离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会失去客观的真的基础，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教条主义者研究“理论”时那种抽象空洞、哗众取宠的作风，不正是由于他们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造成的吗？从实际出发，作为实事求是的基础，也同样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基础，并且渗透于理论联系实际之中。

总之，只有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从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其本身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理论联系实际培育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并成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时首先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要为着解决我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我们知道，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实践中来，而它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它是对于客观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还必须解决如何掌握它的问题，即解决学习的目的和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号召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从它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不能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能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能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不能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有的放矢和无的放矢的区别。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目的地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从客观实际生活中经过科学的方法抽象出来并为尔后的革命实践证明其正确的理论。它的伟大生命力，也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实践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因此，为着解决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去有目的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了的。抱有这种目的，才能学到它的真髓，才能发挥它指导革命实践的伟力。那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为了好看，为了哗众取宠，为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态度，同革命的要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本性是水火不相容的。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着重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提供了应用这一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际问题所做出的结论。我们的学习决不能是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决不能是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字面上，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决不能是把学来的东西作为八股教条，用以俘虏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对现实的革命斗争是毫无帮助的，是十分有害的。应当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就在于它是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然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是它的个别结论；而是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共同坚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时还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要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499页。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责任。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真正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能够应用于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的“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①他还建议，把这一条定成衡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绩优劣的标准。

精通和应用，是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两项要求，也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阶段。精通是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要能够把握体系、领会实质、理解精神，能够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片面的、零碎的、表面的。精通不是目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用于指导行动，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使精神的东西变为物质的力量。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个阶段，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阶段。精通是应用的基础，只有精通才能谈得上正确应用；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应用起来就不能不感到茫然。应用是精通的目的，也是精通的途径。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固然需要认真看书学习，但是离开革命斗争的实践，离开广大工农群众，是不可能达到精通的目的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①应用还是检验是否确已精通的手段。把所学的理论应用于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不仅可以促进学习向精通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可以衡量学习的水平，检验精通的程度。如果离开应用，精通是无法加以检验的。

我们知道，认识来自实践，从实践中得到正确的认识，又能积极地指导实践，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之所以提出精通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要求，正是为了使它与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发挥它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那么，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呢？

一方面，要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正确地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做出符合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上的说明，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②这是革命实践所提出的一个必须完成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对于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稀里糊涂，对客观实际漆黑一团，或若明若暗，那么，从实际出发就成了一句空话，实事求是自然也就谈不到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进而以这种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动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人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使革命实践沿着正确的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9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2页。

方向，按照客观实际所固有的规律发展。否则，革命的运动将成为盲目的实践，是决无胜利可言的。

怎样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主要应抓住三个环节。

第一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于现实的客观事物，对于自己工作的环境和对象，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从而掌握合于实际（不是错觉）和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的具体的实际材料。这时的认识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这样的材料是进一步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据和基础。

第二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实际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规律，引出科学的结论。这时形成的是理性认识。认识的正确与否，既取决于材料是否来自客观实际以及材料是否真实和丰富，也取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精通和能否应用。即使从实际中获得了足够丰富的材料，假如不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也是不可能从客观事物中找出它的规律性的。

第三步，把对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拿来指导行动，应用于改造世界的斗争，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把关于规律的一般认识应用于被改造的具体事物时，要处理好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为此，就必须继续从实际出发，以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统一。

做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不单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如果明白了怎么样理论联系实际，怎么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并不实行，那仍不过是一句空话。关键是要认真地去。在实行理论联

系实际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是要注意反对的。一种是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没有真正领会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去联系实际，结果不仅在实际面前寸步难行，而且甚至还会动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描述过这种倾向：“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①

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矢”射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之“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说，不仅是精通、应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不懂得这一点，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还是不完全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随着世界的运动变化，随着各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实际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日益紧密，它也将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才能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违背了这条原则，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出发，走着主观主义的道路，实行着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原则，危害人民，危害革命。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这种情况。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同它进行斗争，坚持理论联系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778页。

实际的原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四 调查研究

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地从实际出发，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方法是必须采取的，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说它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把倡导调查研究同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紧密结合，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紧密结合，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①

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这两个环节。人们通常也简便地称之为调查。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引出必要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为什么说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呢？

首先，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要从实际出发，当然首先必须了解实际。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但却不能说我们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历史和现状自然地

^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组信件和批语》，《红旗》杂志1982年第24期。

就会有正确的了解；至于对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就更不能这样说了。不了解实际，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等主观主义的坏作风。这种作风对革命和建设所造成的危害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情况，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①。经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周围的实际情况，认识了实际，才能谈得上从实际出发。

其次，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 进行调查研究，先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的实际材料，随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它加以研究，从中引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际（材料）通过调查研究活动联系起来了。经过这一联系，就从客观实际中引出了内在的规律性，对感性材料做出理论的概括。毛泽东同志说的“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指的就是：没有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没有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引出规律，做出正确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在谈到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时，毛泽东同志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② 同上书，第749页。

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①他又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体现着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而调查和研究则贯穿于始终；离开了调查和研究，问题是不可能提出或解决的。

最后，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锐利武器，是防止主观主义的根本措施。实事求是的大敌是主观主义。不打倒主观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就不能抬头。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看作反对和防止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他曾说：“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③

回顾我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搞不搞调查研究，乃是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历史经验证明，调查研究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党的事业的成败同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衰息息相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第3页。

③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革命的道路以及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是因为它不是照搬书本或别国经验的产物，而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产物。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了中国的实际，掌握了中国的特点之后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容易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讲到调查研究和革命斗争策略的关系：“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①建国以后，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教训。五十年代前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党的方针政策比较地符合实际，工作顺利，成绩显著，其原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2—1073页。

因就在于重视了调查研究。而在一些时候，党的方针政策之所以发生偏差，造成重大损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或者没有进行调查研究，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强调调查研究，才又使各项方针政策符合我国的实际，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一年曾经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①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牢记的。

当然，我们讲调查研究，指的是正确的调查研究，而不是指任何一种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就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调查研究是为了使主观符合客观，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正确的调查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但首要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客观地进行调查研究，忌带主观性。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违反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仅不能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会更加有害，因为它贴上了“调查研究”的标签，极易自欺欺人。比如，先入为主，抱有成见，带着框框下去找“证据”；或者不讲真话，怕听不同的意见，怕见不爱见的事物，不敢正视那些能够推翻自己意见的材料，等等，都是错误的。其次，要眼睛向下，向群

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组信件和批语》，《红旗》杂志1982年第24期。

②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众、向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大多发生在基层，暴露在基层。在基层工作、生活的干部和群众，每天都在同各种具体的矛盾打交道，都在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因而他们最了解情况，最有智慧。正确的调查研究，应当眼睛向下，深入实际，接触群众，接触基层干部，从他们那里发现矛盾，并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常说，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和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轻松了^①。最后，调查研究要系统、周密，坚持全面性，忌带片面性和表面性。不论在任何场合，对调查和调查材料分析和综合的研究要全面，不可浅尝辄止，不可为各种假象所蒙蔽，也不可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尽管大量但不典型的材料。

调查研究对共产党人来说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只对某件事，或在某一个时候才需要的。它同解决主客观的关系一样，是一件带有根本性的大事。对一件事情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不能代替对其他事情的调查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实际取得了规律性的认识，也不敢保证永远能够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不敢保证自己的认识永远能够同实际相符合。“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②客观实际在发展变化着，群众的实践在发展变化着，新问题、新事物、新经验日益涌现，要使自己的认识同这些情况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须经常进行

① 参见张闻天：《出发归来记》（1943年3月27日），《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6日。

②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6日。

调查研究工作。还是毛泽东同志讲得好：“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

总之，调查研究工作是贯穿在我党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同一个过程。是否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是有无党性的表现，是有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标志。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不是正确的调查研究，也绝不会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

^① 《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第四章 论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不了解自觉能动性，就不可能彻底地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社会同自然界的联系。因此，自觉能动性的问题是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直接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理论表现，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理的进一步发挥。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这一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是十分重要的。

一 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

“自觉的能动性”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他对这个概念做了明确的说明：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

点。”^①

怎样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一概念呢？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自觉的能动性”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能动性，二是自觉性。所谓能动性是指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不仅能够对于他物的作用做出直接的相应的反应，而且还能够主动地作用于他物，改变这一作用，独立地做出间接的复杂的反应。这种能动性是人和一般动物都具有的。但是，人的能动性是自觉的，其他动物则没有自觉性。所谓“自觉性”，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有意识、有目的。人在做事情之前总要先形成一定的思想、目的，在意识中对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预见，并根据这种预见来计划行动。马克思曾经指出过这一点：“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②。二是能够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加以省察，即“自我意识”。人总是通过对自己思想、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的自我意识，不断地调整 and 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这是人以外任何别的动物所不可能做到的。

有自觉的能动性，人才能够区别于世界万物，才能够以特有的方式自立于自然界。人凭借自觉能动性，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创造自己的世界。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所固有的。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一直在发挥着自觉的能动性。然而，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自觉能动性及其发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里有着水平高低、作用大小、程度深浅的区别。总的来说，随着人类的进步，自觉能动性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

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作用也是不断发展的，其水平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程度也不断向横广和纵深扩展。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的自觉能动性空前活跃的阶段，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无法比拟的。处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者只有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实现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业绩。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就明确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仅靠其优越的历史地位和强烈的主观愿望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时代以及时代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重任，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发挥他们革命的自觉能动性；这个能动性发挥的情况如何，是能否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关键。

一般来说，充分重视和强调发挥革命的自觉能动性，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特征越来越鲜明，作用越来越显著。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它的发挥是非常有限的。人们在客观世界及其规律面前还显得很渺小、软弱。随着社会的长期发展，人类逐渐积累起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从而使自觉能动性也逐渐地强化起来。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能力，经过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在文化、技术的巨大发展中表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越来越显示出自己改造世界的巨大能力，人的自觉能动性空前地活跃起来。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突飞猛进地发展着。盲目性大大地减少，科学和技术日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运用它们，已经不能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了。资本主义把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各种矛盾及其表现都集中起来，使之空前明朗化、尖锐化。社会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各种形式和手段也相应地更丰富、更有力。任何阶级或集团要争得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存，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觉的能动性，力图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社会。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阻碍和束缚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为了冲破这种束缚，就必须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自觉能动性。总之，无论从人的思想和行动两方面的条件来说，还是从人与自然界和社会的两种关系来说，或者从需要与可能二者的统一来说，都到了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社会力量，它应该并且能够比其他任何阶级和政党更充分地发挥其自觉的能动性。实际上，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能够真正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前进。

具体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重视和强调发扬革命的自觉能动性，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特定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个社会异常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殊问题，只有通过革命人民发挥更大的自觉能动性，付出更多的艰苦努力，才能够解决。

要改造中国社会，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的

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②从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开始的认识社会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③这里所说的“热忱”、“决心”和“精神”等等，都是高度自觉能动性的具体表现，都是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所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毛泽东同志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从而为党制定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是同他们高度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分不开的。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也常常是同他们只知抱住现成的教条或狭隘的经验不放，不肯迈开双脚去调查研究，不肯开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这种懒汉作风相联系的。

认识中国社会不容易，改造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容易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之下，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停滞，国家主权支离破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敌强我弱，力量极端悬殊的特点使得革命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斗争艰苦而复杂。面对这样的客观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③ 同上书，第748页。

形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使有了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手中已经掌握了真理，若不以超乎寻常的自觉能动性去做艰苦卓绝的工作，也还是不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大家，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在革命的征途上不能企图侥幸，不能贪图便宜，不要希望敌人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不要等待外来的援助，而要靠我们自己奋斗。每当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他总是及时地强调这个思想：“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①，“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②组织人民，打倒敌人，把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一寸一寸地全部打扫干净，这些都需要共产党人根据科学的理论制定出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正确的方法，用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去实行。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每一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我们发挥高度的革命的自觉能动性。

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都再明确不过地说明，现在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历史关头。他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把人类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开创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局面。毛泽东同志把握住时代精神，把唯物辩证法的基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7页。

② 同上书，第1078页。

本原则运用于分析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突出地提出并全面地阐明了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使之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很有特色的篇章。

二 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

要具体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就必须考察它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的表现，看它是怎样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①这种活动和努力贯穿于认识和实践的全过程，表现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人类自觉能动性最典型、最有力的表现。

物质变精神，就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客观物质世界，形成感性认识，然后再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产生思想、理论、意见、计划、办法等等。这是正常的人类认识所必须经过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认识先后有两种不同形式，即：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各个片面以及事物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而是一个质的飞跃，离开了自觉的能动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人的感觉也不同于动物的感觉，其中总是包含着理性的。从客观物质到感性认识，也要经过人脑的改造，也离不开自觉的能动性。具体地说，在物质变精神的过程中，自觉能动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首先，自觉的能动性能够选择认识和实践的具体对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改造什么，认识什么。无限宇宙中的各种事物，正是由于人们需要的不断发展，才一个又一个地先后进入人们实践和认识的范围。从无限的事物中挑出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具体对象，正是自觉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选择作用，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茫茫无垠的宇宙，就会无从下手，认识和实践都无法进行。

其次，自觉的能动性能够保持认识和实践持续的、反复的进行。对象选定之后，人们为了有效地认识它和改造它，必须持续地、反复地实践和认识，以便形成和发展认识，深化和扩大实践的效果。这就要求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保持目的一贯，排除各种干扰。没有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人们的活动随时都可能因为目标不明确而中断，或者因为受到干扰而转移，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最后，自觉的能动性能够把感性认识深化、提高为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感性认识，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发生飞跃，形成理性认识。在这个飞跃中，自觉能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促使人们经过思考，“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物质变精神过程的高峰。

精神变物质，就是人们把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再运用于实践，通过实践改变客观世界，从而创造出同一定精神成果相应的物质成果。毛泽东同志说：“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①可见，精神变物质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人们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并见到物质成效的过程，另一面它又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要深刻地理解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就必须真正了解自觉能动性在这个飞跃中的作用和表现。我们知道，理论应用于实际是必须经过主观努力的。实践是精神变物质的桥梁和枢纽。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过程始终体现着自觉的能动性。精神变物质，是自觉能动性更突出、更集中、更强烈的表现。具体地说，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自觉能动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觉的能动性在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时有一种“创造作用”。一般来说，精神变物质并不只是重复制造物质世界本来已有的东西；而往往是改变客观对象，使它们成为未曾有过的或原来并不具备的形态。这个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世界上本来没有房屋、机器和车辆，正是人们根据对自然界的认识，发挥自觉能动性，先在头脑中把它们创造出来，形成关于它们的观念，然后按照这个观念的“蓝图”使它们成为物质的存在。如果没有自觉能动性的这种创造作用，人类就只能消极地反映和机械地重复现成的客观过程，就永远不会有文明和进步。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其次，自觉的能动性有保持实践和认识相互一致的“调节作用”。人们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按照一定的计划改造客观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矛盾，使计划、目的、理论同实践的条件、方式和结果互相冲突。这或者是由于认识本身不正确或不完善，或者是由于实践脱离了预定的轨道，或者二者兼有。人发挥自觉能动性就可以纠正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这种偏差，或是修正认识，或是改变实践方式，使二者重新一致起来，以达到按照一定的思想改造客观事物的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的调节，精神就难以按照预期的结果变成物质。

最后，自觉的能动性有加速精神向物质转化的“催化作用”。在把一定的思想变成事实、使理想变成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往往表现为一种热情、干劲或积极性，即执着于一定理想、目标的主观努力。这种主观努力对于精神变物质的速度和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主观努力越充分，变的速度就越快，效果也越明显。任何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无不带有这种或那种主观努力的色彩。没有自觉能动性的这种催化作用，精神变物质是难以设想的。

精神变物质，即运用理论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充分地说明了自觉能动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不承认精神能够变成物质，不承认自觉能动性在人们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观点，在实际生活中会变成无所作为的庸人。但是，精神变物质既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又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精神变物质的效果，要看精神同物质运动规律符合的程度如何而定。因此，精神只能在物质运动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变成物质。如果以为精神变物质，就是精神可以不受物质的约束，可以由人随意地变来变去，象有人曾经宣扬过的“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观点。它只能驱使人们瞎闯蛮干，而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物质变精神，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形成思想的过程；精神变物质，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付诸实践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人们的活动中是一个相互渗透、彼此衔接而又密切结合着的有机整体，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和扩大自己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丰富和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然后又不断地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去创造出新的更丰富的物质成果，改变客观世界的面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前进一步，比以前更深刻、更丰富、更高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没有止境，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也没有终结。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的这一辩证运动过程，始终是以人的自觉能动性为条件的。没有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自觉能动性的存在、发挥和发展，是同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发展结合在一起并表现于其中的。自觉能动性也是发展着的。没有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也就没有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和发展。我们知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在走着的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却并不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因而往往也不是自觉地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揭示了它的真实面目和内在规律，才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客观必然的过程变成自觉的活动，能够按照它的规律有意识地、系统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三 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自觉能动性是人特有的属性。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切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意味着，自觉能动性仅仅同主观意识相联系，发挥自觉能动性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不受客观因素和其他条件的影响。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各个时代的人们，包括一切个人、阶级和社会集团在内，无不这样或那样地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然而，他们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方向、性质、途径和结果却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好，有的坏；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收效显著，有的收效甚微；有些彼此协调，有些则相互冲突；如此等等。这些足以说明，人们的自觉能动性不仅有着作用大小这种量的差别，而且还有着正确与错误的质的不同。我们共产党人承认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并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懂得区分不同质的自觉能动性，必须对决定自觉能动性的性质并影响其作用的各种因素，加以科学的分析。

什么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对此做过十分明确的回答：“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在这里，他首先指明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内容既包括正确的思想，也包括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的行动；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正确的自觉能动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性来源于“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首先必须是建立在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一致基础上的自觉能动性。人的思想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才是正确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走上正轨并取得成功。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早已阐明了的一条真理。人类历史上一切进步成果的取得，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无一不是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结果。凡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违背客观规律的自觉能动性，都是错误的。错误的自觉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失败得就越惨重。古往今来，那些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派，自命不凡、异想天开的狂妄分子，他们对于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未尝不竭尽全力，但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革命队伍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未尝不以为自己正确而一味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但都由于思想和行动不合乎实际而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些都说明，决定自觉能动性命运的，不在于人的主观意愿，而在于是否做到了主客观的统一。这是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基础。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还必须是思想和行动一致、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能动性，即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把正确的思想化为正确的行动。为了把正确的理论变成正确的行动，就要把理论具体化为路线、方针、政策，化为工作方法，用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变为群众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充实、完善正确的理论，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注意纠正违背正确理论的行动。只有在实际过程中真正地把理论与行动统一起来了，才算是发挥了正确的自觉能动性。那种只把正确理论当作口号去空喊，不懂得也不注意研究正确理论如何才能变成实际行动的口头革命家，即使工作再努力、热情再高，也不可能发挥出正确的自觉能

动性来。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论述，对于划清自觉能动性问题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以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界限，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的，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①我们的一切革命工作都同抗日战争一样，是要人去做。做就必须根据和符合于实际形成正确的思想，按照这些正确的思想去行动。一切违背唯物辩证法精神的主观主义倾向和消极被动的态度，都是同我们的革命事业格格不入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呢？毛泽东同志深入研究了发挥自觉能动性过程中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法。他把客观条件比做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舞台”，把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称做“威武雄壮的戏剧”，用舞台与戏剧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这个辩证法。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②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② 同上书，第446页。

取得这样的效果，依赖于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条件，依赖于恰当、充分地发挥主观努力。

客观条件，是指同人们活动相联系的一切物质的、客观的因素。它是人们活动的“舞台”。任何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之下进行的。任何活动也不能没有这个“舞台”。整个宇宙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无限广大的舞台。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国的全部现实因素，包括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等等，都是我们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舞台。我们所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地区、部门、单位，又由它所包括的全部客观因素构成了一个一个小舞台。这些大大小小的舞台，是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我们活动的环境和基础。我们活动的全部内容、方式和手段，都同它联系着，都是从它而来又作用于它的。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要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就必须重视条件，分析条件，利用条件。

重视条件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它对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从实际出发，其中就包括从客观条件出发。真正的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思想上认真地重视条件，在行动上处处依据条件。没有客观条件这个“舞台”，不仅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斗争不能进行，甚至连我们本身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客观条件的“舞台”给一切“演员”和“戏剧”提供了活动的可能，同时也规定了活动的范围。例如，军阀的割据与混战，给局部地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也规定了小块红色政权只能建立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而不能过早地去夺取大城市。我党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不懂得这个道理，硬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去攻打大城市，企图首先在中心城市建立革命政权，

结果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条件的作用，要求凡事必须重视条件，依据条件；然而决不能用凝固不变的观点来看待条件，更不能做现有条件的奴隶。实际上，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一样，一切条件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承认条件、依据条件的同时，还要分析条件，掌握它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利用条件，创造条件，加速事物的发展，达到我们的目的。

由于事物或现象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发展过程中的条件是复杂多样的。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对它们加以分析，不仅要看到一个方面的条件，而且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的条件；不仅要看到各种条件的存在，而且还要区别它们的不同类型和不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条件，正确地估计形势，才不致于在错综复杂的条件面前迷失方向。不仅如此，条件又总是变化、发展着的。随着事物的发展，一种条件可以消失或产生，这一条件可以同另一条件彼此代替或抵消，一个条件在同变化了的其他条件相联系时，其作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对条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加以分析，就会从中找出它变化的规律，并且可以根据这些规律，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限制或排除不利条件的影响，甚至利用某些现成的条件去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条件。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条件，就能够在条件面前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于抗日战争的条件作了详细而透彻的分析。他不仅考察了敌、我、友各方的军事条件和经济条件，而且还考察了各方的政治条件、人心条件和国际条件，不仅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现状，而且还

分析了它们未来的发展。正是在科学的条件论的基础上，他得出了抗日战争经过艰苦的历程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并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在亡国与胜利这两种可能性中，后一种可能性占优势。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关键在于争取到必要的条件。“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①战争的实际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的论断。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不要勉强”和“积极创造”，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条件论的一个原则的概括。“不勉强”与“积极创造”之间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勉强”如果不同积极地争取和创造条件相联系，就会变成消极的保守主义，结果一事无成；“积极创造”如果不从现有的条件出发，而是勉强去做，就会变成主观蛮干，结果非但不能造成所需要的条件，反而连现有的一点有利条件也会丧失。所以，既要重视条件，依据条件，从条件出发，又要分析条件，争取条件，积极地创造条件。这两方面缺一不可。这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对待客观条件的唯一正确方针。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7页。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和行动，而且还包括与实际需要、正确思想相适应的人的勇气、毅力、作风和品质。在革命斗争中，人们意志坚强、热情高涨、敢说敢干、奋不顾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就能够加快革命的进程，确保胜利的来临。反之，即使客观条件再好，指导思想再正确，无人去做，或者虽然有人去做，但没有魄力、没有勇气，畏首畏尾，疲疲沓沓，照样也是一事无成。有利条件的运用，不利条件的改变，正确而巧妙的方法的探索，主观能力的提高等等，其中都包含着积极奋斗的精神。因此，忘我工作和英勇奋斗的精神，在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环节上都是需要的。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重大成就，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①，不怕一切反动的、腐朽的东西，不怕一切困难，不怕失败和挫折，不怕负责任，也不怕丢掉自己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我们敢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能够在斗争中勇猛前进的精神支柱。其次要有踏踏实实、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精神。在斗争中准备着去应付最大的困难，过最艰苦的生活，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的干劲，凡事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务虚名，坚韧顽强，奋斗不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精神，在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在关键时刻，对于保持革命方向，扭转不利局面，常常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往往有这种情形，有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2页。

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①最后是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在斗争中，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无保留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拚命工作和战斗，人人为争取胜利的到来做出最大的贡献，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并以此为荣。这是保证正确的路线取得成功的又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战斗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②无私无畏、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等等崇高的精神和行为，在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曾经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正是无数革命志士和先烈发扬了这些精神，才为祖国赢得了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这些精神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应当做到象毛泽东同志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所要求的：“我们要坚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不仅依赖于客观条件，而且还依赖于主观条件。对客观条件的正确认识本身就是正确发扬自觉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但是，主观条件远不止这一点，它还包括掌握和运用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力，如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素养，革命队伍的精神面貌和组织状况，对自己实际力量的估计和运用，行动的积极性和热情等等。可见，所谓主观条件，主要是指同一定任务相联系的人的精神、思想方面的因素。在一定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大力加强主观条件的建设，是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同志在说到抗日战争问题时指出，当我们将战争的客观形势和条件等等做了充分的分析和说明之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页。

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①。加强革命主导力量自身的建设，关系到抗日战争的成败。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等人所参加的一切活动领域。

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是为了造成革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优势。只有形成这样的优势，才会有胜利的现实可能性。认识自己、加强自己从而造成优势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了并总结出我党关于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就是其中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总结。“三大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加强自己而形成的、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的主观条件。与此相联系，我们党还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具体经验。例如，毛泽东同志说过：“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②。学习是认识自己和加强自己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说的学习，首先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③同时也包括学习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等各种知识。只有学好这些，我们才能够用人类智慧的全部成果装备起来，取得改造世界的优势。毛泽东同志还号召我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④。这也是从思想上加强自己的重要途径。“包袱”是由于盲目性而造成的精神负担。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6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

③ 同上书，第196页。

④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在顺利和成绩面前骄傲自满，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悲观丧气，各种各样的迷信（迷信出身、迷信个人、迷信本本或迷信经验等），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等等，都能够束缚人的聪明才智，使正确的自觉能动性难以发扬。毛泽东同志说：“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①提倡思索就是开动思想机器，凡事问一个为什么，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找出事情的真理。这样就不会被盲目性所蒙蔽，就能够保持清醒和自觉。放下包袱，就能轻装上阵，就能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还号召我们：“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②。保持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就是坚持发扬自觉能动性在根本立场上、方向上的正确性，保持党在斗争实践中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没有这种纯洁性，自觉能动性就得不到正确发挥，党的战斗性就会大大削弱。一个革命者正确地认识了自己，加强了自己，积极性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同志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③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①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1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4—495页。

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它所规定的十二条准则，对于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准则推动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恢复，激发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我们要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就不能不注意创造与此相关的各种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要想使自觉能动性得到正确的发挥，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并使它们结合起来。改善主客观条件并使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必须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达到。自觉能动性只有在使主客观条件实际地发挥作用的时候，才算是真正地发挥了。所谓主观努力就是要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以取得主动地位，掌握事物发展的前途。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人民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调动积极因素首先应当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 坚定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懂得从本质上发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党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两大法宝。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就如高屋建瓴，具有势不可挡的威力。在革命和战争中，动员起了群众，革命就有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有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9页。

洋大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依靠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能够做出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迅速地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革命的目标而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是人类自觉能动性最活跃、最富有成效的表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空前光荣而艰巨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要求把自觉的能动性发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四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人们的自觉能动性，特别是先进的人们（阶级、政党和个人）的自觉能动性，对于人类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人们不断地发展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总是为了改善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改善自己的社会环境。发扬自觉能动性本身并不是目的，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才是目的。

什么是自由？从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以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不受约束；有人以为自由就是自己的一切要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也有人以为自由只是一个虚构的字眼，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自由，等等。在哲学史上，自由也是一个引人注目、其说不一的范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第一个运用辩证法说明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然而由于唯心主义立场的局限，他把自由仅仅看成精神领域的东西，而不

^① 《论十大关系》，第28页。

理解人在实践中对必然的支配。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他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①。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又做出进一步的概括：“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②由此可见，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主观的东西；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

自觉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是一对矛盾。“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③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决定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和愿意，事物总是要按照它的规律发展变化的。这就是客观必然性。人的自觉能动性只有同这种客观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相符合，才能够正确并得到成功的发挥。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必然性，并按照这种必然性的要求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改造客观事物的活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时人们就获得了自由。客观必然性制约着人的自觉能动性，但人的自觉能动性又能够认识、顺应和驾驭客观必然性，控制事物发展的进程。人类在客观必然性面前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客观必然性与自觉能动性没有统一起来。这时，人不了解必然性而受必然性的支配，处在不自觉的、盲目的、被动的境地。这种境地叫做“必然王国”。另一种是自觉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达到了统一。这时，人认识了必然性并能掌握这种必然性去积极地影响事物的发展，处在自觉的、主动的境地。这种境地叫做“自由王国”。“只有在认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②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7页。

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①自由不是脱离了必然的主观任意的行为;恰恰相反,只有在承认必然、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自由。自由也不是单凭人的一时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就能加以衡量的;恰恰相反,只有人的需要本身在符合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得到满足,才能够说明人获得了自由。自由更不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恰恰相反,只要人们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就一定能够达到。

从必然到自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在这个飞跃中,人从客观必然性的奴隶变成了掌握客观必然性因而也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从盲目地参加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被动者,变成了自觉地改造世界的主动者。实现这一飞跃的基础和动力是人们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实践。在实践中,人们逐步地认识客观规律,使物质变精神;在实践中,人们运用规律为自己创造条件,争得自由,使精神变物质。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②。自由是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中追求着的目标。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着的辩证发展。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自由的本质,才能够正确地追求它并得到它。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③从原始社会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7页。

② 《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月5日),转引自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③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到现在，人类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自然界和社会中一点一点地争取自由。从使用天然工具到使用人工制造的工具和机器，从完全依赖大自然赏赐的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生活到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衣食住行的丰富产品，从原始的蒙昧和简单意识到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文明，从不得不走向阶级的分裂和对抗到自觉地为消灭阶级而斗争并创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些进步和自由的取得，经历了数千以至数万年的漫长过程。人们为此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迈进的一步。到了今天，人类的进步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人类已经有了较大的自由。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现在尚未被认识和支配的必然性，要比已经认识和支配的多得无法计算，人类已经取得的自由还是微不足道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永恒发展着的。“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①就每一个局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项工作来讲也是如此。每一个事物的客观内容都是无限丰富的，它的发展和转化都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总有未被我们把握的必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从不会到会，从不大自由到比较地自由。“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从必然向自由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我们发扬自觉能动性也是没有止境的。

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在今天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即整个地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压迫

①②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和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是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飞跃都更加伟大也更加艰巨的飞跃。赢得了这个飞跃的成功，人类将进到一个空前自由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飞跃，需要全世界人民充分发扬自觉能动性，共同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支配必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理所当然地要发挥主导作用和先锋作用。

第五章 论实践

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把实践的观点作为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深刻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同党的事业和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实践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关于认识论思想的基石，也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为什么实践的观点会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呢？

首先，实践的观点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需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它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并在客观实际中受到检验、得到证明的总结论，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人们行动的指

南，而不是供人照抄照搬的教条。把它运用于指导我国革命时，就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实现二者的结合。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以及实现二者的结合，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对中国进行革命的变革中才有可能；离开了革命实践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谈。毛泽东同志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好了才去从事革命斗争的，而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实现这种结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把实践作为实现这种结合的基础，并把自己的整个思想莫立在这个基石之上。

其次，实践的观点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无论是改造旧中国还是建设新中国，都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我们知道，革命（包括建设）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正确地反映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把这种正确的认识正确地运用于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生动地体现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改造与被改造的双重关系。而不论哪一方面关系的问题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正确地解决。只有积极从事革命斗争才能够认识和掌握革命的规律，并运用于实际行动之中。离开革命的实践，认识和运用革命的规律都是不可能的；所谓革命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和异常深刻的程度上进行革命实践的结果。革命斗争的这种需要必然反映到毛泽东哲学思想里，而作为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只能以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基石。

最后，实践的观点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是由于同党内错误思想，特别是同教条主义斗争的需要。

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党的幼年时期，曾经犯过主观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曾经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几乎陷入绝境。这两种错误思想究其认识根源都在于对待实践的错误态度。经验主义者虽然辛辛苦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看来好象很重视实践；但是他们不懂得科学的社会实践的意义，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把自身的一时的实践经验绝对化，实质上仍然是误解了科学的实践。教条主义者靠摘取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来吓唬人，从根本上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看轻了实践的意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党同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特别是它的实践观点，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写下了光辉的哲学论著。为了醒目，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还特别把专门批判他们看轻实践的那本著作题名为《实践论》。正是在总结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的经验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实践作为自己科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怎样理解实践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呢？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实践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革命地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理论的中心课题和根本任务。它根据实践的需要提出问题，它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诉诸实践。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依据，实践的观点是贯穿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根红线。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革命实践抽象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强调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强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我们知道，在党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一种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态度。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字句当成灵丹妙药照抄照搬；而应当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向马克思主义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并以其为出发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揭示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找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也完全是为了指导革命斗争，使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党的思想路线，变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革命实践的需要，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归宿。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如何使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中国具体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围绕着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并且概括出了实事求是这一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思想。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主观和客观具体历史的统一，或实事求是问题的解决，都是建立在实践观点之上的，都是诉诸实践的。在它看来，主观和客观既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才可能做到正确的反映，达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斗争中，才有可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探索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实事求是。

不仅如此，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厦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实践观点这块基石之上的。实践观点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部分，把它们联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的认识论是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这个“唯物”在毛泽东哲学思

想那里又是以实践作基础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的辩证法强调对于矛盾不但要研究它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强调不能把辩证法看成死板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同实践观点联成一体的，它认为生产斗争实践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把实践的观点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统一起来，认为人民群众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把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直接联系起来，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正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最后，实践观点是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毛泽东哲学思想植根于中国这块具有优秀哲学传统的土壤之中，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日益结合而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个发展过程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对于这一实践的经验进行哲学的概括总结的结果。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前进和曲折，成功和失败，都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哲学思想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决定了并推动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离开了这个深厚的实践基础，也就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能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产生、形成和

发展，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提出问题，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积累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所当然地把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纳入它的体系，作为它的基石。

二 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活动

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先提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各派哲学对实践概念就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都是不科学的或反科学的。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曾经用实践批判过唯心主义，甚至有时还给实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他把实践理解为饮食起居之类的日常生活，甚至歪曲成一种卑污的小商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唯心主义者虽然也使用实践的概念，但他们却把实践归结为纯粹精神的活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实践概念作了科学的规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理解为社会实践，认为实践是改变世界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①。列宁指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发挥。他从人类特有的自觉能动性的角度对实践进行了考察。他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8页。

② 参看《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310页。

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这里的“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讲的是人们的认识，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知”；“做或行”就是人们的实践，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概念明确、简要而又具有中国形式的表述。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② 它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认识，表现了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而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则更强烈地表现了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实践的能动性，不仅在于通过实践能动地正确地认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范围之外，离开实践来观察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因此，他们把认识理解成对客观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而唯心主义者则片面地夸大并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这种能动性，以抽象的意识的能动性代替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并把它说成是可以决定物质世界的东西。因此，他们都不可能把握实践的科学本质。毛泽东同志关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的表述，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同志认为，实践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哲学范畴，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

^{①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畴。它包括人们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活动，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毛泽东同志在概括实践的形式时一方面强调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同时又明确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①，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他在《实践论》中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在谈到社会实践时都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加以列举。

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生产劳动是人类有意识有计划地支配自然界的行爲。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仅仅能够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生产劳动改变自然界，使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后的和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动员大生产时曾经讲过：“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么？……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②这是对生产劳动的意义生动而通俗的说明。

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活动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满足人们吃、穿、用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人类为了生活，就要进行生产，首先要认识自然，使用工具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形成一定的生产力。人们不能离开社会孤立地进行生产。每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811—812页。

一个人都必须“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①。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而人类社会也随着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者劳动斗争的历史。人类的社会活动，除了物质生产活动之外，还有社会政治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生产活动决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任何活动都无从谈起。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活动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活动。各种社会里的社会成员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着生产活动。这种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人们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然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阶级斗争又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内所出现的特殊现象，生产斗争实践则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阶级斗争本身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展开，最终又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消灭。归根到底，阶级斗争是为了解决生产斗争的问题而进行的，是从属于生产斗争的。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

科学实验实践产生并服务于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恩格斯讲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科学实验，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②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③。随着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独立的科学实验日益发展起来，并且愈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是一样。随着人们对社会规律的探索 and 认识，人们自觉地掌握社会发展的能力日益提高，科学实验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生活。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明确地规定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意义是很深远的。

总之，人类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同时，其他的社会活动对于生产活动也有巨大的影响。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524页。

③ 参见《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论哪一种实践活动,都是社会的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①、群众的实践。实践和群众在本质上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它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把握着统一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过程。实践是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从活动及其后果方面讲群众,而群众则是从主体方面讲实践。没有群众的“实践”不是真正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群众”不是真正的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②这一结论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本观点的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也就不可能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人的实践,离开实践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三 认识的基础

列宁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③。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于列宁的这一原则性的论断做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并遵循这一原则建立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着重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方面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即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根本问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但是，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却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错误的、幼稚的想法。他们以为只要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套在中国头上，便会取得革命的成功。因此，他们既不去深入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去艰苦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其发展规律；既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需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懂得革命的理论来自革命的实践，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所出现过的那种教条主义的想法和做法。教条主义者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在于轻视实践，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够指导革命实践并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创立这一理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什么“先哲”，也不是因为这一理论是无需证明的先验的公理；唯一地是因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来自实践并得到实践证实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在实践中对于它的日益广泛深入的运用而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理论。一句话，教条主义者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特别是它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经验主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与教条主义不同，但认识根源却是一致的。他们之所以相信教条主义者的那一套，也在于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由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此可见，为了彻底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必须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说清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即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论述。

首先，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从实践是认识来源上说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说：“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①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就是从认识的产生方面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的反映。人们通过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接触了客观外界之后，客观事物的现象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经过人脑这个加工厂的加工整理，从而形成了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能动的反映，获得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践。人们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接触事物的现象；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暴露事物的本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认识路程”，“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的。”^①因此，“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②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的认识，人的一切认识、知识、才能，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人的认识，包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主要地来自生产活动。生产斗争的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本来源。人们在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一方面逐渐地了解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性质、自然界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们经过生产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人和人的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本质等等。由于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其他形式，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③其他实践形式，特别是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些基本的实践形式也是认识的重要来源。

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道理，对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关系的理解也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把向书本学习和向他人的经验学习绝对化，当成了“源”，从而割断了它们同直接经验的关系，甚至代替了直接经验。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错误，明确地指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就一个人来说，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一个人的知识，多数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然而，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它们又都是发源于实践，是从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5页。

③ 同上书，第260页。

实践中取得的。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他人那里则为直接经验的东西。反之，在我为直接经验者，在他人那里则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即使是间接经验，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对它加以检验和发展，才能真正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战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过去战争的经验，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不得？”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① 不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不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间接经验的态度，是违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 既要重视通过自己参加实践获得的直接经验，又要重视向书本学习，向他人的经验学习；既反对“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的狭隘经验论，又反对轻视实践经验，一切从本本、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针对教条主义者脱离具体实践的错误，特别强调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从而获得关于革命的规律性的认识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③。又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④ 他多次反复强调，任何英雄豪杰的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第4页。

③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④ 《反对本本主义》，第9页。

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作完成品的作用。他号召全党同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宣扬的“天才论”划清界限，用知识来自后天实践的观点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其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从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还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又说：“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①指出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从认识的发展方面进一步强调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适应生产实践的需要，并在生产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同样是在改造社会的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毛泽东同志除了论述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为认识提出新课题，推动认识向横广和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着重指出了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创造“认识工具”对推动认识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也就逐渐深化了。

社会实践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272页。

展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所从事的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它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此，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

再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他又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也就是进一步从认识的结果方面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把认识或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其能否得到预想的成功，强调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认识的真理性。一般说来，在实践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是总结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王明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等人，都自认为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更自我标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一段时间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以为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按照他们的路线去做却到处碰壁，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与此相反，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革命实践的时候，中国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表明：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最高、最终的标准。

当然，实践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①就是说，实践对于认识的检验往往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检验多次，需要对于实践的结果进行认真的分析。不应当把某一次实践的结果，特别是最初的结果，当成绝对可靠不可变更的结果；而应当进行多次反复的实践。在作判断时要看实践的全过程，看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民群众的实践的总和，看实践的最终结果。

最后，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认识从实践中来，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③指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也就是进一步从认识的归宿方面强调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只有掌握群众，变成群众的行动，才能实现自己，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特别强调，“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6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3页。

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①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

毛泽东哲学思想抓住实践这个在认识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活动这一基本的观点出发，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做这样集中、系统、全面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不仅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以实践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发展得更加严整。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 尊重实践 深入实践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对社会实践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且对社会实践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十分强调实践的革命意义，教导我们要尊重实践，深入实践。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社会实践。在我党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它们各自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地开展这三项实践活动，对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它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还要向自然界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开战，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生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同在一切社会中的地位一样，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提供物质基础的实践。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时的生产斗争更加显示出其特别重要的意义。离开生产斗争，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会因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而难以进行。

实际上，我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重视生产斗争实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积极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以支持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生活资料方面的困难，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立即领导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一九五六年在调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正确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领导我们

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充分的科学研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严重地扩大，加上后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八大”以及此后一个时期提出的正确路线都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工作重心长期没有真正地转移过来，也就是说，党还没有把领导生产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并且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从而使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生产斗争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一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对于改造社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生产斗争紧密相关，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力。在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里，由于阶级状况的变动，阶级斗争实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主要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伟大胜利，是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然而，我们党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却在一个长时期里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纠正这一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

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对我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估计,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次会议指出了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批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由此看来,对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的估计和正确恰当的处理。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专政的一个关键。”^①现在,我国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有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

^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33—34页。

利进行。

科学实验对于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比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显得重要。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有人类的生产活动，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科学实验活动，是与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的大生产要求并推动科学实验的发展；反过来，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现代的生产力又可以获得迅速的发展。事实证明，科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并不完全来自生产实践，而往往是通过长期的科学实验得到的。科学实验作为一项独立的实践活动，应当走到生产实践的前面，从而为生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人类的科学实验活动，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验活动，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实验活动。毛泽东同志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① 社会科学的实验活动是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活动。社会科学实验的成果，对于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改造，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具有开创性的事业，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尤其必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觉性空前提高，在社会领域里进行科学实验也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优越的条件。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蹲点”、“解剖麻雀”、“典型调查”、“一切经过试验”等工作方法，都是具有科学实验性质的实践活动，对于提高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不仅对于改造客

① 《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观世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主观世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改造。人们在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活动中不断地加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了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把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社会主义时期，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仍然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途径。无论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还是改造认识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知识水平，都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习，而且还要通过工作和生活实践，通过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 and 科学实验的实践，通过接近人民群众学习。否则，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脱离了客观实际，也就谈不上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思想就跟不上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形势，就不能了解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无法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做出新的概括。这样下去，势必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或者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在新条件下已不再适用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或者由于思想僵化、脱离现实生活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把外国的经验绝对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下去，势必会出现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或者高高在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想当然”，瞎指挥。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同客观实际的一致，必须深入实践，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实践活动中去。

能否深入实践，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其关键在于从思想上要尊重实践。是否尊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一个原则问题。尊重实践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就是从根本上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轻视实践就是轻视唯物论，轻视辩证法，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论认为，客观实际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是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和尊重的；否则，必将一事无成。坚持这一点，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唯物论，背离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论。然而，社会实践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是客观实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实际出发、尊重实际本身，就包含着从社会实践状况出发、尊重实践的意思。因此，尊重不尊重实践，就世界观的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尊重不尊重唯物论的大问题。

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是变革。它否认任何绝对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总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这种精神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实践就其本质上讲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对于客观现实的一种变革。承认不承认实践的这种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一个根本区别。所谓尊重实践，从根本上讲，就是承认实践的这种革命意义，肯定它对于客观现实的变革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这也就是承认了辩证法的变革精神。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力军。在它看来，所谓实践，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因此，尊重不尊重实践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尊重不尊重人民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尊重不尊重历史唯物论的问题。

把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精神统一地贯彻于认识论，用以观察人们的认识问题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认识

以实践为基础，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无论从认识的产生或发展上看还是从认识的结果和归宿上看，实践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因此，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集中地表现在是否把实践放在第一的地位上。

总之，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最权威的东西，尊重实践就是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尊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尊重实践的问题，明确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就是尊重唯物论，辩证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第六章 论人民群众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群众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全党，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它也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之中，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正如不理解实践观点、矛盾观点，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不理解群众观点，同样也不可能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

一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统一起来，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人民群众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①。毛泽东同志以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不同内容为例科学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④。从毛泽东同志的这几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一切促进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也不管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具体内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页。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总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总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这里应当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那些以脑力劳动谋生而不剥削他人的知识分子也属于劳动群众的行列。他明确指出：“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①在旧社会，一切不剥削他人的脑力劳动者尚且属于劳动群众的范围，那么，在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广大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明确地肯定这一点，无论对于消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还是对于克服人们长期存在的偏见，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这是三十七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作用所作的科学论断。在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时候，他又一次强调了“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同时，他还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种伟大作用做了全面的论证。

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③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这两种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知道，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

①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0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③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6页。

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狭义的动物界分化出来组成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生产活动；人类要生存下去，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采取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生产劳动，共同解决吃、穿、用等各种生活资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发展了，“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那么，是谁创造了物质生活资料呢？是劳动人民。正因为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以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社会的精神财富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吗？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问题曾明确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②很显然，如果没有劳动人民通过物质生产为人们从事精神文化活动创造物质生活前提，提供进行精神文化活动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手段，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创造精神财富，社会的精神生活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切知识，一切文化，一切精神财富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指出“知识来源于群众”，而且反复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③。一切科学文化，归根结底都是在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许多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同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直接由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

其次，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对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的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明确指出，奴隶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在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逼上梁山》之后给他们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里说的不仅是戏剧问题，而且还讲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讲到，社会发展的大局归根到底是由劳动者决定的，特别是由无产阶级这个劳动者中的先进部分决定的。

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我们知道，社会历史是按照它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总是量变和质变、和平进化和根本变革这两种状态的相互转化的过程。由和平进化到根本变革这种前进的大方向，就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个总趋势谁也不能更改。究竟是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呢？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它既是促进社会发展量变过程的最终的和最深刻的根源，

①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质变过程的最终的和最深刻的根源。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因素；而劳动人民则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改革生产技术，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跟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是同一个过程。

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归根结底决定着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为什么一切进步阶级的革命目标终究能够实现，而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注定要破产？进步阶级的革命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反动阶级的反动行径之所以注定要失败，是因为它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毛泽东同志经常把“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结合在一起说明某种必然性，把人心向背看成事情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问题时说，人心的向背是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①，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以弱胜强，就在于敌人方面“人心不顺”，而我们方面则是“人心归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变革是社会和平进化的必然要求；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我们知道，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生产关系集中地表现为阶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级关系，主要是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使原来的生产关系同它不再适应，就要求变革过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自动地让位于新的生产关系。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国家政权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生产力，完成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实现我国民主革命的根本力量的时候指出：“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①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没有奴隶的暴动，奴隶制就不会被消灭；没有农民的革命战争，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就不会被推翻；没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会被埋葬。

总之，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正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的亿万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

二 相信群众 尊重群众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经常遇到而且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直接关系到革命斗争的成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我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一整套处理这一问题的经验，并把它概括成为关于群众观点的系统理论。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尊重群众。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全面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强调必须老老实实地尊重群众。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讲的尊重群众都包含着一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要尊重群众的利益。尊重群众，就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同志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要求我们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看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而且强调要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看作衡量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可见，尊重群众，首要的和根本的就是要尊重群众的利益。不尊重群众的利益，所谓尊重群众只是一句空话。

其次，要尊重群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我们应当自觉地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② 《论党的群众路线》，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页。

走到群众中间去，满腔热情地向群众学习，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把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综合起来，成为系统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使群众得到好处。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尊重群众的意见。经验主义者不善于集中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教条主义者则置群众的意见和群众的经验于不顾，这两种人都谈不上尊重群众的意见，也谈不上尊重群众。

最后，要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最富于创造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并且反复教育全党要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他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①，“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我们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才能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才能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尊重不尊重群众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首先，是否尊重群众是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立场两种立场的根本对立。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湖南的农民运动时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具体的分析。他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

^①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7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①毛泽东同志这里谈的是对待农民和农民运动的三种态度。这种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不同态度，根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

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并把广大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而斗争。当群众运动出现某些偏差时，他们既不惊慌失措，也不埋怨斥责，而是同群众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帮助群众提高觉悟，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引导群众继续前进。在这方面，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八七〇年九月，当马克思看到法国工人阶级在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领导下，将要进行不合时宜的革命起义的时候，他及时严肃地提出警告：“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②。但是，当这次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已经进行，马克思一点也没有训斥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而是以极大的革命热情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3页。

② 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7页。

关注着巴黎公社起义所发生的一切，以运动的顾问和参加者的姿态讴歌社员们的伟大创举。马克思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①同马克思一样，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中，一贯尊重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普列汉诺夫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责难这次革命的群众运动，说什么“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列宁愤怒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错误态度，他说：“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②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贯教导全党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边，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热情歌颂和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首创精神，同一切害怕、讥笑、谩骂、否定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恶劣态度作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指出的：“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③

同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家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贬低或者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时候，他们为了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不得不利用（同时也害怕）无产阶级和人

① 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8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5页。

民群众。但是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了他们所能许可的范围，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群众运动，甚至采取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这种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时尖锐地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①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根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其次，是否尊重群众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毛泽东同志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针对着林彪、陈伯达宣扬的“天才论”，尖锐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在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两种世界观对立的高度提出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群众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同一序列的范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就表现为群众第一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这两种说法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尊重群众就是尊重实践，尊重历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在认识论上否认实践第一，在社会历史观上必然否定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5页。

群众第一。所以，否定群众必然要否定实践，否定历史，否定唯物论和辩证法。由此可见，是否尊重群众又深刻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同志不仅全面地论证了尊重群众以及如何尊重群众的问题，而且还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尊重群众。

相信群众是尊重群众的基础。要尊重群众就必须真正地相信群众。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同志把相信群众当作做成任何事情的基本前提，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相信群众都包含着一些什么思想内容呢？

首先，要相信群众是有力量的。四十八年前，毛泽东同志面对着拥有几百万军队在全国实行黑暗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明确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正因为人民群众是有力量的，所以，只要我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谁就有力量；谁脱离人民群众，谁就没有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推翻三座大山，就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有人民群众这个“上帝”的参加；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可以逞强于一时，但终究不能不归于失败，就在于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其次，要相信群众是有智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①毛泽东同志认为全国各地人民中间有着成千上万个诸葛亮，让我们去向他们学习，可见他对人民群众智慧的推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他经常提醒大家：蹲在北京不得了，北京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相信群众是有智慧和承认实践出真知是一回事。人民群众之所以有智慧，就因为他们直接实践者。毛泽东同志从来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①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7页。

②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成功第一台拖拉机所写的按语》，转引自1968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观点。

最后，要相信群众是有觉悟、懂道理、要革命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湖南农民自己动手丢开菩萨的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① 人民群众的实践地位决定了他们迟早会觉悟到自己的利益，会打碎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解放自己的大道上迅跑。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②，批评了那些没有感觉到或很少感觉到这种积极性因而同群众所想格格不入的领导，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③，相信并发挥这种积极性。

当然，人民群众是一个极广泛的概念，它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讲到相信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说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始终是站在我们事业一边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最终克服困难走向胜利。

密切地联系群众是尊重群众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页。

②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87页。

③ 《〈所谓落后乡并非一切都落后〉的按语》，同上书，第57页。

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①在他的倡导和培育下，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成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还说：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联系群众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他历来都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联系群众是智慧的源泉。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贯号召全党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而且身体力行，真心实意地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②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联系群众又是力量的源泉。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搞好党群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因此，他总是谆谆告诫全党要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去接近群众。

依靠群众是尊重群众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③。这个论

①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7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8页。

断告诉我们：只要依靠人民，革命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只有依靠人民，革命事业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革命是不要群众参加而取得了胜利的。“恩赐的观点”是不对的，“救世主”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救世主或者上帝的话，毛泽东同志说过，“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①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放手地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就是不相信群众，就是对群众的不尊重。

要尊重群众还必须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只有关心群众才能真正地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要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密切地注意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情绪实际上就是群众的心声。群众的呼声实际上就是实践的呼声。毛泽东同志指出：“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②可见，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情绪，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时刻关心的重要问题。二要切切实实地为群众谋利益，认真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一切群众所需要并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

^① 《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0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①反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②可见，群众的生产和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时刻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处处想着群众，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够超越任何障碍，战胜任何困难，无敌于天下。

三 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组织起来进行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充分地显示和发挥出来。我们党要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要相信群众，而且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同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125页。

② 《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7页。

志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①要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首先就必须从思想上动员群众，向群众进行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力量，认识组织起来为自己利益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②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强迫他们去从事那怕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不对的，那是命令主义；如果借口人民不觉悟而放弃工作，随波逐流，也是不对的，那是尾巴主义。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是自发地可以提高的，而是要经过宣传教育。一方面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一方面又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是对立的统一。这两个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要完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就要求有做群众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这就是人民群众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过程中领袖人物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时候，他在坚持群众创造领袖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同人民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的一致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的关系，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这里讲的群众和领导者、

①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7页。

群众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

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领袖是群众的领导，群众需要领袖。列宁说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造就和推举出自己的领袖，组成一个领导核心和领导集团，是它在政治上成熟和兴旺发达的集中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必定胜利的重要保证。

领袖所起的领导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领导的作用。所谓政治领导是指在政治上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为人民群众指明革命发展各个阶段的斗争方向，提出斗争任务，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是思想领导的作用。所谓思想领导是指创立并且发展群众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理论，启发教育并且提高群众的觉悟。没有革命的理论武装群众，没有群众觉悟的提高，群众斗争只能停留在自发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这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后是组织领导的作用。所谓组织领导是指把群众团结起来，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为着共同的目标而斗争。群众在领袖的组织领导下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领袖的组织领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领导是人民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群众团结胜利的旗帜；另一方面表现在领袖是群众斗争的指挥者。领袖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

①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活动中，能够尽可能地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少花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成功。由于领袖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这三个方面，所以无产阶级领袖往往都是一身兼备政治家、理论家和组织家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

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群众是领袖的基础，领袖要依靠群众。这是群众和领袖的关系的又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领袖产生的基础来看，领袖从来不是天生的、命定的，而是适应社会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需要出现的，是在群众斗争中造就的。我们通常说的时势呼唤英雄、时势造就英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时势”是指一定时代各种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其中也包括了群众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无产阶级领袖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时势中锻炼成长，并为无产阶级群众所推选出来的。真正的领袖从来都不是自封的。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所谓“当然领袖”。他总是反复强调，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如果离开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来谈领袖的产生，那就必然要陷入历史唯心论。

从领袖的政治基础来看，领袖是群众利益的集中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都是靠政治斗争取得的，又是靠政治斗争维持、巩固和发展的。无产阶级同样如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集中地表现在无产阶级政治上。无产阶级领袖只有在政治上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从领袖的思想基础来看，领袖的正确思想和卓越才能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它只能在不断总结人民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

发展。它是从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出发并集中了群众正确意见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①这里说的革命的政治家和群众的政治家，讲的就是领袖和群众，革命的政治家如果不集中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意见，加以提炼，并回到群众中去实践和检验，就不可能形成革命政治家的正确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也就不可能成为领袖。这是毛泽东同志四十年以前说的。到了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强调中共中央只是一个加工厂，原材料都只能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从地方那里拿来。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从领袖历史作用的基础来看，领袖的正确思想只有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实践，才能变为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巨大物质力量。可见，领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力量还在于人民群众。领袖的历史作用，也只有依靠并且从属于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并且作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体现出来。任何领袖人物，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那就必然一事无成。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领袖是群众的领袖，群众需要领袖。因此，我们应当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肯定无产阶级领袖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的伟大历史作用；我们应当坚决拥护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勤恳工作的领袖，反对那种否定或者贬低无产阶级领袖及其作用的自发论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群众是领袖的基础，领袖必须依靠群众。因此，我们应当恰当地估计领袖的作用，而不要夸大这种作用。无产阶级领袖在长期、复杂和艰苦的斗争中为民族、为阶级、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因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决不是单纯的个人威信，而是党和阶级的威信的集中表现。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尊敬和爱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①。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不是孤立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外的一种独立的作用，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总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决不允许借口维护领袖的威信把领袖神化，鼓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根本特征就是神化个人，贬低群众。它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赤裸裸的历史唯心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都一再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鼓吹个人崇拜，势必会造成奴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思想僵化，降低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挫伤或者窒息党员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削弱党的战斗力。

鉴于个人崇拜在我们国家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力地纠正了由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

^①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40页。

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对于发生在我们党内和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与此同时，党还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扬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所形成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并从制度上做出必要的规定，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重演。所有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反对个人崇拜同爱戴领袖是统一的，两者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个人崇拜是蒙昧主义的表现，是一种迷信。它不但不是热爱领袖，反倒是损害了领袖的形象。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得好：“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不否认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我们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是我们党在处理领袖与群众关系上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方针。

正确地处理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也就解决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如果进一步能够坚持群众路线，运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那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就是可以完成的了。

四 群众路线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既要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又不能放弃对于群众的领导责任，既要首先肯定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要充分估计领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作用。要把二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统一起来，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呢？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党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对它作了一个科学的概括。他说，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群众路线又作了高度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

①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23页。

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根据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它。

首先，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为了实现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矛盾状况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而提出的斗争纲领。党的政治路线随着矛盾的推移、任务的转变，在内容上也会有所调整；但是有一个根本点却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群众路线。党制定政治路线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党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根本利益，每一言论，每一行动都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贯穿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党的政治路线总是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体现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精神。党的组织路线是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在组织工作方面所实行的路线。它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从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所谓组织工作也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路线也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路线。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先当学生”的过程；在集中指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去实行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后当先生”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都是以群众民主、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总之，无论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还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都体现着群众观点，贯穿着群众路线。所以，毛泽

东同志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路线。这句话简要而深刻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其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认识路线。毛泽东同志说过：“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同党的认识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党在实际工作中所实行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认识路线。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呢？

第一，党的群众路线和认识路线是建立在同一块基石之上的，群众第一和实践第一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是尊重群众；党的认识路线的基本精神是尊重实践。实际上，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着的群众，可见，群众第一和实践第一，尊重群众和尊重实践，都是一回事。

第二，群众路线的实际过程和认识发展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②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就是指群众在革命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他所说的“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指的对感性材料经过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所谓“先当群众的学生”等等，都是指的这一过程。同样，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则是指的“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所谓指导运动，掌握政策，所谓“后做群众的先生”等等，都是指的这一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进到了更高一级的程度。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一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在制定过程中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多次反复，在付诸实践以后，仍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地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不断地以群众的新经验来丰富和发展。这样，就使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常保持一致，从而也就使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有了可靠的保证。

最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一切实际工作，都是群众工作，强调正确地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对于做好群众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么，什么是我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规定为基本的领导方法，而且规定了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领导骨干同群众相结合，二是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任何工作中，“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可见，只有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才能使领导不脱离群众，使群众不失去领导，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完成既定的任务。所谓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指的是各级领导者内部必须实行“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这就“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③这样做既有利于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利于层层负责、分兵把口、发挥领导集体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

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同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 同上书，第853页。

③ 同上书，第856页。

时，还必须实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要求任何一个领导者对待自己所负责的任何一项实际工作，既要做到对全局的一般布置，又要亲自深入实际，抓住一点或几个点进行典型调查，总结经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正是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这一认识规律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运用。个别指导和一般号召这两种形式的不断循环往复，就使领导和群众的认识不断地丰富、深化，从而保证了党的领导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把群众路线化为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解决了必须依靠群众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怎样依靠群众的问题。这是对我党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每个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进行实际工作时所必须采取的基本的方法。

根据我们实际工作的经验，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必须认真地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者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做什么事情都总以为自己高明，瞎指挥，强迫群众去干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②同命令主义相反，尾巴主义者不懂得引导群众，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迁就落后群众，对群众中错误的东西不批评，不教育，当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脱离了大多数群众。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①由此可见，命令主义、尾巴主义之所以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毛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都是脱离群众的。

科学地概括和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个基本的方面。能否坚持群众路线，是衡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和党风的重要标志，是说明这个党能否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重大问题。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六十多年来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都充分证明，只要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前进；反之，如果违反了群众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甚至无产阶级政党还会有变质的危险。因此，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能否坚持群众路线，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第七章 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中国国情并以这种认识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认识和实践辩证地相互作用、向前推移的过程。认识的发展受到实践状况以及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制约，而实践的发展又受到认识状况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是自发的运动，而是高度自觉的、在统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认识正确与否以及这种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都十分重视对于认识发展的规律的研究。毛泽东等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关于认识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精辟论述，武装了全党，推动了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中国的改造。

列宁在谈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说过：“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①他还分析了具体的认识发展的途径，指出：“从生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毛泽东同志全面系统地发挥了列宁提出的这些思想。他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基本的特征，把它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结合我国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认识路线的经验，具体地分析了这个能动的革命的过程。其中，关于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飞跃，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以及关于实践和认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等等论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贡献。

一 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 到理性认识

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给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的损害。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理论对于实践经验的依赖关系，把理论说成脱离实践经验而主观自生的东西，片面夸大理论而贬低实践经验的作用。经验主义者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固守着自己片面的经验，否认学习理论的必要性。这两者在思想方法上都犯了片面性的毛病，都不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为了使有书本知识的人能够向实践经验方面发展，使有实践经验的人能够在理论上提高一步，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教训全面分析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唯物辩证的关系，论述了在实践中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为了从哲学上分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说明经验和理论之间的正确关系，毛泽东同志首先分析了人们认识形成的过程。

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最初只是接触到事物的现象方面，接触到事物的片面，接触到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以及本质的联系并不直接呈现出来，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事物的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的联系。客观事物的现象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引起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在人们的脑子里造成了许多印象，以及这些印象之间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样形成的认识是感性认识，形成感性认识的阶段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固然是客观外界的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毕竟是片面的、表面的和不完全的，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头脑中发生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已经不是对于事物的现象、片面和外部联系的反映，而是对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把握。循此继进，由概念构成判断，由判断进行推理，就可以产生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这是认识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同志认为，同感性认识相比，理性认识是一个更重要的认识阶段，因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①。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

这是人们实际上所走着认识形成的路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对这一实际路程的反映。否认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阶段，就是离开了认识的唯物论，就只能把人们的认识说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头脑中先天固有的，从而堕入唯心主义。假若否认认识由感性阶段能动地向理性阶段发展的过程，就离开了认识的辩证法，堕入形而上学，这样就完不成认识的真正任务，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人们认识形成的这一过程，不仅对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阶级、政党来说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结合革命斗争实际，例如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人们对于战争以及对于工作的认识等，对这一问题分析得十分清楚明白。毛泽东同志还以他自己对农村的认识为例说明认识的发展经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他说，他在二十年代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参加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虽然“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虽然认识到农民运动“好得很”，是必然的，但“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了井冈山之后，作了寻乌调查（一九三〇年五月），“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并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在兴国调查（一九三〇年十月）之后，才弄清楚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才“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①。这里，对农村各阶级的一些情况的“异常肤浅”、“一点不深刻”的了解，是感性认识阶段；待到“弄清楚”农村各阶级，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相互关系，掌握了其发

① 参见《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3页。

展规律，认识才上升到理性阶段，完成了认识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党对领导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过程时，也曾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①可见，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经过一个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过程。现今，我们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也必须坚持这一唯物辩证的观点，勇于实践，勇于革新，不断地推进认识的深化，真正掌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完成认识的任务，进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其次，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他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但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一个质的飞跃。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不同，不象感性认识那样是属于事物之现象的、片面的和外部联系的东西，而是到达了事物的本质的、全体的和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够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征，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8页。

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这两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作为认识的辩证联系的环节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经验和理论、感性知识和书本知识的关系问题。针对着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说明。他强调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①要直接地认识某种事物，就要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事物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那种事物的现象，而且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但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因而实际一个人的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②。实际上，一个人的理论知识并不一定都是以自己的感性知识即直接经验为基础的。只要这些理论知识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就是可靠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知识的总量大得惊人。我们无疑更应该重视接受间接经验，重视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毛泽东同志依据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具体阐明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经常搞不清楚的关于“完全的知识”的问题。他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7页。

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①同时，他还指出：“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②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③

同实际生活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应，在哲学上有所谓“唯理论”和“经验论”两派，这两个派别都犯有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概括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也做了总结性的分析，从而，既深化了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批判，也

①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4、776页。

③ 同上书，第776—777页。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就是认识论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割裂了这个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应当看到，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唯理论”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认识靠得住，而感性知识则靠不住，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有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唯心主义的唯理论。那种认为认识是“天赋观念”的唯心主义唯理论就更是错上加错了，我们这里暂且不去管它。实际上，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因为它来源于感性认识，否则理性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主观自生而靠不住的东西了。毛泽东同志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①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经验论”认为认识应当停留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靠不住，也是十分错误的。历史上有唯物的经验论，也有唯心的经验论。那种认为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唯心的经验论，就更是错上加错了，我们这里也暂且不去管它。“经验论”者不了解，尽管感觉材料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仅是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同志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在认识过程中基于实践的、经过科学地改造过的认识，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

总之，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首先要阐明的。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两个相反的极端上或者否认认识论中的唯物论，或者否认认识论中的辩证法。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不了解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中执其一端便视为全体。这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不符合认识过程之历史的或辩证的本性的。

最后，毛泽东同志不仅告诉我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飞跃，而且还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飞跃。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实现这一飞跃有两个基本的环节。

第一，要掌握大量的、可靠的感性材料。思想、意见、计划、办法等等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积累大量感性材料，才能据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作为思想的原料或半成品，难免有些零散和粗糙，这是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正常的。但是，为了能够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需要感性材料尽可能全面可靠。这是对感性材料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要求。为了使感性材料尽可能全面些，达到足够的数量和具备足够的方面，就必须进行周到的必要的调查。为了使感性材料尽可能可靠些，务求真实、准确，就必须亲自作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同志提倡开调查会，要有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就是把上述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既保证了感性材料的全面性，又保证了感性材料的可靠性。这个搜集感性材料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这一环节的基础上才可能向下一个环节过渡。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推理来。”^①

第二，要开动机器，用科学的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②脑筋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感性材料作为思想的原料或半成品，要经过头脑的加工才能制成成品，即达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就是在周到的和必要的调查基础之上对于各种调查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是周密调查之后的深入研究。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分析法运用于认识论，把人脑加工感性材料（即思索）的一般方式概括为著名的十六字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③。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说对感性材料要有分析和取舍，去掉那些不重要的、不可靠的材料，保留那些重要的、可靠的材料；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是指把各种感性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②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③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材料联系起来，透过感性材料的表面，达到对事物的联系和本质的了解。感性材料是丰富而又芜杂的，只有通过头脑的思索，才能把它改造制作成精炼的、可靠的、系统的和本质的认识。这是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经过的第二个环节。

在上述两个基本环节中，前一个环节是感性材料的准备，后一个环节是感性材料的加工。这两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这两个环节，如同原料和加工厂，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制成思想的产品。由前一个环节到后一个环节，从而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由于感性材料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向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这一飞跃是在认识的内在矛盾推动下实现的。认识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还必然地推动认识导向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

二 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

在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之后，人的认识运动是不是完结了呢？不是。经过实践而得到的理性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这就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②。

关于从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问题，是我党历史上反对主观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页。

主义的斗争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教条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然而他们从不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以便在这种运用中指导实践，发展理论。针对着这种错误，毛泽东同志强调了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实现这一飞跃的途径。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必须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用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理论的重要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着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认识世界的目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认识的能动作用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第一次飞跃达到理性认识，有了正确的理论，如果仅仅是坐而论道，空谈一阵，不让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发挥它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同志把这种人讽刺为“古董鉴赏家”。这些鉴赏家们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就是这种鉴赏家。毛泽东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②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由第一次飞跃得到的理性认识，即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现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在应用理论于实践的过程中检验理论。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 我们知道，所谓检验认识，就是把前一阶段所得到的理性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够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获得成功，就表明认识的正确，遭到失败就表明认识的错误。一个认识是否真理，不以主观上的夸张或感觉如何来定，而以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来定。离开实践，不从理论飞跃到实践，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永远也不可能解决的。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争论，就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做出结论的。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表明，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这些学说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一个科学理论在得到科学实验的实践检验之前，只能称之为科学假说，其真理性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创立这一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这一学说为尔后革命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是普遍真理，在于它所揭示的一般原理适用于任何人的实践，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所普遍证实。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所获得的理性认识经过实践的检验，暴露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页。

出它的不正确或不完全，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补充，因此，必须实现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以便发展认识。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使其真理性更完全。许多理论是错误的，不具有真理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使之具有真理性。所以，通过实践而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过程。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是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军事计划的制定过程时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这里虽然讲的是军事计划的建立和执行，但其中所揭示的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理性认识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对于认识运动中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应当作全面的、完整的理解。这一飞跃是认识和实践统一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其出发点是理性认识，落脚点是实践。在这一飞跃之前，上述出发点和落脚点处于一种静态的分离状态。但这种状态不是永久的，正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打破了这种静态的分离状态，而代之以理性认识同实践的动态的结合。这时的理性认识已不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飞跃）出来超脱于实践之外的理性认识，而是处于实践之中经受实践检验并将有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所发展变化的理性认识。这时的实践也已不是未受这种理性认识作用之前的自在状态的实践，而是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之下并反过来验证这种理性认识的实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改变了飞跃前二者的分离，造成了使二者相互一致而又相互作用的新的格局。因此，只有在理性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联系之中才能理解二者之间由此达彼的飞跃。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对于实践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从认识论意义上看，这一飞跃对于认识运动本身的作用更为深刻，因为只有在这一飞跃中理性认识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不要把这个飞跃仅仅看成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应当同时把它看作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必要的、意义重大的阶段。就是说，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并不是摆脱理性认识而落入单纯实践的突变，而是在同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中使理性认识经受检验、向前发展的飞跃。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再次论述认识过程的时候，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是认识的飞跃。他说，在实践中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①这就明确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的含义：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不仅仅在于理性认识到达实践的转折，全面地说，这个飞跃在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所发生的变化，即证明其真理性，纠正其错误，补充其不足，向前发展。这是认识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根基和推动力量乃在于实践。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页。

三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应用、检验和发展了理性认识。到此，认识的运动是不是就算完成了呢？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这可以说是完成了，又可以说还没有完成。毛泽东同志说：“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①“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

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①完成和未完成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一定的认识阶段来说是完成了，而相对于更长的认识过程来说又没有完成。这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或者说是认识运动的有阶段性和不断推移的辩证统一。

说认识的运动完成了，是因为对某一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认识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按照这一认识实践时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认识指导实践获得成功，证实了认识的正确性，标志着人们的这一认识运动的完成。但是，这个完成很少有一次就完成的，有时似乎完成了而实际上并未完成。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①由此可见，认识的运动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的反复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曲折的不断的变动，但是在人们应用认识于实践并得到预想的结果时，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毕竟算是完成了。

同时我们又说认识的运动没有完成，这是因为能动地发展着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它经过一个个阶段无限地向前推移。认识运动的无限性，从根本上讲乃是由它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无限性所决定的。事物的无限性，一方面表现在事物及其属性的无限发展上。客观事物是运动发展的，事物所具有的属性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运动、发展、变化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事物的无限性还表现为具体事物的无限深远性。任何事物都有复杂的结构和层次，由这种结构和层次构成的事物的深远性也是无限的。主观的过程是客观的过程在人脑中的相应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无限性，要求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认识不断地随之推移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

有完结。”^①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之后，对于认识的发展作了一个总括性的论述，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结论，为我们在把握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基础上进而纵览认识运动的全过程提供了一个规律性的描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认识并不就此中止，再实践又引起再认识，而再认识又会导致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又会导致新的认识。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革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要随之不断地向前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好象一条向前或向上无限延续的螺旋曲线，而不是直线或封闭的圆圈。实践和认识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前一次循环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中达到了更高的程度。

通过实践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指导人们改造世界，也是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就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如果不了解人类认识中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那么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相继写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先后讲到认识过程中两个“循环往复”，一个是实践、认识、实践，一个是特殊、一般、特殊。这两个“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同一个认识过程的描述。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感性认识也就是对具体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属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是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是在变革具体的、特殊的事物的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一般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实践和认识的循环，是从实践和认识的相互作用中揭示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特殊和一般的循环，则是以社会实践为背景对认识本身抽象程度曲折前进的变化的说明，揭示了认识从个性到共性，再从共性到个性的螺旋式运动。把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这两个循环统一起来理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解，能够有助于我们全面和深入地把握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

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高度上看认识运动的规律，还可以作另外一种表述。实践是人们探索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人们通过实践反映物质世界，通过实践检验认识是否符合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并通过实践而使认识作用于物质世界。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再由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他还把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推移和转化过程称之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这样一来，就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运动一般规律的学说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紧密联系起来，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亦即物质、精神、物质的循环往复，不仅表现了认识论中的唯物论，而且表现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概括了实践对认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对实践、精神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物质和精神的循环与实践和认识的循环，在认识论上是统一的，是对同一个认识发展规律的表述。如果把这两种表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到，物质、精神、物质与实践、认识、实践融合为一个过程：物质—实践—认识（精神）—实践—物质。由此可以看出认识的主体是怎样通过实践的中介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之后过了二十多年，又将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同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并列来讲，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对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3页。

他的认识论思想又做了新的发展。

关于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同志还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把它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群众是直接从事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的人们，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经过能动的科学研究把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检验、提高领导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也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同一个认识发展过程的不同表述。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概括，既说明了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把认识论和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认识论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是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发展过程。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僵死的，而是具体的历史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正确理解认识运动中认识和实践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整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之后明确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可以说，我们为解决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所作的一切努力，目的就在于实现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我们在实际活动中能否坚持正确的路线，防止和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关键。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坚持认识和实践相统一、反对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过程。

我们知道，认识和实践同主观和客观一样是认识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认识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实践决定认识又受认识的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而且针对着教条主义的要害特别突出地强调了这种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所谓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统一，指的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现实的、一定条件下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超越现实条件的统一。所谓认识和实践的历史的统一，指的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而不是超越历史发展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统一性和历史性，归根到底是由客观世界本身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所决定的，是由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所决定的。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发展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是具体的历史的，变革现实的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通过实践接触和反映现实世界的人们的认识也相应地带上具体的、历史的性质，使得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

由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都是社会的人，因而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也就不象纯粹的自然过程那样具有自发性，而是要通过人们的自觉努力来实现的过程。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能不能自觉地做到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必须认真地加以解决。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曾经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认识落后实践，一种是认识超越实践。前者容易导致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容易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由于人的认识受到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常常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知道客观过程已向前推进了，思想仍然停留在旧的阶段。他们的认识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不能站在实际运动的前头充当向导。“左”翼空谈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或者把幻想当作真理，或者把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到现在来做，脱离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①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第八章 论真理

真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要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现改造中国的真理，并运用这一真理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基于实践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真理的发现、检验和发展都做了系统的论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在不断地获得真理、坚持真理并及时地识别谬误、排除谬误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真理而斗争中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格和气魄，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

真理和谬误都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们产生于统一的认识过程，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

真理是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人们的认识如果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正确地反映了它的发展规律，就

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就称之为真理。谬误则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错误的反映。真理同谬误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特别注意研究真理与谬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在实践中根据这种辩证关系去把握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真理学说的一个重要特色。

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统一。对于人类来说，真理是光明的、有益的，好比是香花；谬误是黑暗的、有害的，好比是毒草。我们需要真理而排斥谬误。然而我们却永远也不可能在生活中只是获得真理而不同任何谬误打交道；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①可以说，没有谬误也就没有真理，没有真理也就没有谬误。

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呢？首先，它的意思是说：在认识过程中，谬误是同真理共生的。这正象田里的禾苗和杂草一样。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做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粮食和杂草是在同一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的东西。它们性质不同但都是植物，土壤中都有它们生长的条件。真理和谬误也是这样。它们的性质不同，但都是认识，都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之中。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认识活动的主客观条件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认识过程所特有的曲折性和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7页。

反复性等等，使各种各样正确的或错误的认识都能够发生。这就决定了真理永远要同谬误共生共存。其次，它的意思是说：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也就无所谓真理和谬误。谬误是真理的反面。正象一切东西都不能只有正面没有反面一样，人的认识也不能只有正面，没有反面。正面和反面是相对的。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①“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就是说，真理总是同谬误相“对”而“立”。客观事物本身并无真理和谬误之分，只有当人们的意识对它们作出反映时才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人们的认识本身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带有“真理”或“谬误”的标志，只有从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一点上加以比较，才能加以区分。真理是相对于谬误而言的，谬误是相对于真理而言的。“有比较才能鉴别。”^②同时，由于客观事物和人的认识都是复杂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着的，人们的某一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和谬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所以，比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经常进行。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而“立”，只有经过各种不同道理的相互比较，才能够确认真理，排除谬误。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追求真理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在把各种不同的道理加以比较之后，是非的界限才明确起来。因而，追求真理总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曲折的复杂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论著中关于旧中国志士仁人们

^{①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8页。

寻求革命真理过程的描述就生动地表明了这一道理。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学习了西方的新学，希望能够用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正是在把西方的新学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反复地比较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是拯救中国的真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才是这种真理。这个长期而艰难的寻求真理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只有同谬误相比较，才能够认识真理、获得真理。回顾人类发现每一个真理的历史过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真理同谬误共生。任何时候，只要有真理就会有谬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从认识过程中一时一地的横断面作静态的考察所得到的结论。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客观世界以及人的认识和实践都不是静止的，真理和谬误的对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从认识的历史发展纵剖面作动态的考察又可以看到：真理和谬误在相互比较、鉴别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斗争着；斗争的结果总是谬误一个一个不断地被排除，而真理则不断地得到确立、丰富和深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①真理只有同谬误作斗争才能发展，并且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揭示的真理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一规律体现了真理及其发展的唯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8—19页。

物辩证的本性，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首先，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真理的发现和发展，都是同排除谬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过程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两个过程。“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这个比较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斗争。人们鉴别真理和谬误的过程，包含着是非标准的斗争、肯定与否定的斗争等等。但是，光有静止的比较还不足以发展真理，还必须进行真理对谬误的积极斗争。“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①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各种不同的反映中，真理是精华，谬误是糟粕。精华和糟粕都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去占领阵地。当精华和糟粕杂处，香花和毒草共生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就得弃其糟粕；要香花生长，就得铲除毒草。所以，获得真理总是排除一系列谬误的结果，排除谬误是巩固和发展真理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路线斗争的经验时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其次，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中真理最终是要胜利的。真理是人类认识运动中积极的东西，它在斗争中会得到发展；谬误是认识运动中消极的东西，它在斗争中将要被克服。这是它们斗争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因为真理在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中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有着不可动摇的根基，而谬误则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8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没有。真理同谬误作斗争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获得胜利的，而要经过多方面的反复的较量。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毒草可以作肥料，为香花补充养分。真理要取得胜利，就得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也就促进了真理的发展。同谬误作斗争是发展真理的一个途径。真理是不怕同谬误进行斗争的，相反地倒是以这种斗争求得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斗争而感到惊慌和烦恼，而应当积极地、充满信心地去为真理而斗争。

最后，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客观世界及其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在实践中对它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随着真理的不断发展，也必然会不断有新的谬误产生。毛泽东同志说过：“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①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是真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形式。这种斗争的完结就意味着真理的完结、人类认识的完结。为了追求和发展真理，我们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同谬误作斗争，而且还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告诉我们：追求真理离不开同谬误的比较和斗争，维护真理、实践真理、发展真理更离不开同谬误的斗争。我们手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些是人类在长期的探索和比较中所获得的科学的革命真理，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7页。

期斗争换来的中国革命的真理。我们要在一切言论和行动中，遵循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要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①同时，这也就要求同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错误作积极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②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断扩大阵地，是真理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使命。

敢唱“对台戏”，不搞“单干户”。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真理、发展真理都应当具有的气魄和胸怀。真理和谬误唱“对台戏”，这是客观的、必然的。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进行下去。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真理都要前进一步。敢唱“对台戏”，就是要主动地经风雨、见世面，同反面的东西交锋。我们敢于这样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8页。

这样做是为了战胜谬误，从而巩固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这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与反面的东西见面，对己能够增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免疫力”，象人体种牛痘一样；对敌则只有如此才能够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否则，谬误是不会自行消亡的。与此相反的态度是禁止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禁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其结果是真理逐渐丧失阵地。

我们党的历史乃至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同国内外反动派、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唱对台戏”的历史。从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还是“痞子”的争论，到抗日战争中持久战同亡国论、速胜论的争论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关门主义、投降主义的争论等等，无不说明，只有敢唱对台戏，才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胜利，才有革命事业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①我们在开展真理与谬误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2页。

的斗争时，也应取这种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一方面，对待真理，要老老实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另一方面，对待谬误，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①所谓正确的斗争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就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一句话，就是“充分说理”的斗争方式。采取这种方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就能够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牢牢地扎根，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真理和谬误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这种区别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确定；真理同谬误的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只有在实践中，认识的真理性能得到检验；也只有在实践中，真理才能战胜谬误并向前发展。

真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即是否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9页。

承认真理客观性的问题。唯心主义主张主观真理论，认为真理是主观的，是不包含任何客观内容的。唯物主义主张客观真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包含着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于真理的不同态度，是由他们的哲学基本前提决定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唯心主义否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

为什么说真理是客观的呢？首先，真理的客观性在于它包含着客观的内容，是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其次，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真理的客观性还在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毛泽东同志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②。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进一步说明了真理的客观性。反过来，真理的客观性只有在它的标准的这种客观性中，才能够真正彻底地得到体现。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但是，社会实践本身又是很复杂的，是由各种各样具体形式的实践构成的。这些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往往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彼此冲突。那么，究竟什么人的、什么样的实践能够检验真理呢？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③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从事实实践活动的主体。所谓社会实践，实质上 and 主要地是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的实践是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带有全局性的、表现本质的实践；只有这个实践才能代表社会实践的性质、水平和规律，才能对思想或理论正确与否做出权威的、可靠的检验。任何人的个别实践，如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同这个实践相违背，都不足以对认识的真理性作出可靠的检验。例如，“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这一真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两种不同的检验。乡村的土豪劣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受到农民运动的沉重打击，他们的体验是“农民运动糟得很”，“应该取缔”。广大农民、工人、革命军部队却受到了农民运动的极大鼓舞和教育。毛泽东同志深入到湖南农民运动中去实地考察，从农会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中看到了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好得很”，必须大力发展。两种根本对立的体验和结论充分说明，只有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检验，才能获得真理。

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不仅是从真理及其标准的一般本质和规律出发的，而且还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之间的特殊关系出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而且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要运用真理改造世界，首先就要把理论变成革命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理论、政策等等是否正确，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因此必须随时加以检验。这种检验，除了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是无法实行的。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

和错误的程度。”^①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的政策，应用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能够从两个方面得到检验。一方面，看它们是否适合群众的需要，是否为大多数群众所乐于接受。如果能够适应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接受，那就说明这个政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政策；否则就说明它还有不正确或不周到之处，甚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看群众按照这样的政策去实践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和胜利。如果能够成功，那就说明这个政策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是科学的和精确的政策；否则就说明它还有不科学、不严密之处，甚至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告诉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检验和发展真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而不是径情直遂，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不能设想，只需通过一两次实践就可以发现完备的真理，只需一两次实践就可以使真理得到一劳永逸的检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② 这就是说，获得真理一方面必须排除谬误，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地克服真理本身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保证。

认识的真理性的真实性必须经受多次实践的反复检验，这是由认识过程的历史特性和实践标准的历史特性两个方面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

①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 这些限制,既表现在认识上,也表现在实践上。表现在认识上,就是每一个具体的认识不仅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有真理性的完全与不完全之分。认识的真理性,开始总是不完全的,就是因为认识中同时还有错误的或不全面、不深刻的成分。这样的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的时候,就能够检验出它的缺陷。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思想从部分正确到全部正确,其真理性从不完全到比较完全,就是认识在多次实践中经受反复检验而逐步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既是确定的,又不是凝固不变的。凡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认识,就具有真理性,就不可能被推翻。然而,实践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某一次具体的实践总有其局限性,不能被某个具体实践证明的并不一定不是真理,只被一时一地实践证明了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对于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每一次都会与前一次有所不同,会有所扩大或深入。因此,多次反复的实践检验,并不是同一样式的活动的简单重复,而是用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辩证发展着的实践去检验认识。只有经过这样多次反复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是真正被实践所证实了的真理。如果不注意这一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

点, 仅仅根据一时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也可能是来自实践的)便轻率地得出结论, 就有可能把真理当成谬误, 把谬误当作真理, 或者把不完全的真理当作完全的真理。

在实践中发现的真理, 经过实践的多次检验, 不仅得到确认, 而且得到发展。真理的发展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真理取得胜利, 扩大了阵地。真理通过排除谬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并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另一种是真理本身内容的发展。真理在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更丰富、更深入、更精确。这是因为, 人们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真理的时候, 就使实践向前发展了, 被认识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也向前发展了。由于实践和实践所改造的客观世界发展了, 客观真理也必然增添新的内容, 具有新的深度和广度。任何真理的发展都同时表现出这两种情况。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真理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旧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疾呼“只有改造中国社会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时候, 他们已经部分地发现了真理。当他们采取实际行动, 千方百计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时候, 实践反复地证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所设计的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在实践中觉醒和成熟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中国革命的真理。它看到只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走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真正使祖国和人民得到解放。“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一深化和发展了的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直到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的真理才比较完备了。我们党和人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真理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反过来也使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新的特点。今天用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毛泽东思想，比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方法，而且它仍要继续发展。

总之，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这个多次反复的过程，既是实践由浅入深地、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地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又是真理从发现到确定、从不完全到比较完全、从一个水平到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

三 真理是主观和客观具体 历史统一的无限过程

真理是一分为二的。它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对立统一。人类的正确认识，是一个不断地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主观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逐步实现的。

真理同谬误一经实践检验就界限分明，因此，真理是明确的。真理符合客观实际，不附带任何主观想像和夸张的成分，因此它又是朴实的。然而，真理的明确朴实，并不意味着它是简单的、一望而知的。毛泽东同志说：“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①我们所说的真理性认识同三岁小孩的正确道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不过是幼稚的、简单的直观，而前者则是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

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基础之上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是丰富而具体的，全面而发展的。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中包含了客观事物的多种因素和多种条件的完整统一，它是丰富的、全面的。任何真理性的认识，总是一定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对一定对象的正确认识。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实际内容，而不是空洞的抽象；它是综合了多次反复实践经验的理论，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印象或想当然的推论。我们知道，客观事物本身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果只抓住了对象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或者把对象的丰富内容归结为几条干巴巴的结论，那么这样的认识就难免有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就很难成为真理。“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①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记住的列宁这一要求，就是掌握真理的具体性和全面性。要做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掌握真理，需要对客观实际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进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分析，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和想当然，也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的“空洞无物的了解”。在抗日战争初期，人们对战争的前途有各种看法。其中有一种是这样推论的：“芦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公式被毛泽东同志称作“空洞无物的了解”，因为虽然“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所谓充实，就是要看到，“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因素”，包括国内各党派和人民的因素、国际正义力量和敌国内部反战力量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①。没有对诸多因素及其作用全面统一的了解，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持久性的具体了解，“中国必胜”这个真理就不是具体的、全面的，而是空洞抽象的。可见，具体性和全面性，正是真理的生命力之所在。

真理是历史的。真理是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发展着的人类认识中的表现，因而不可能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任何真理性的认识，总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这样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而全面的认识，由此它的内容不应该是事物的凝固的现象，而应该是事物的本质和生动的过程；不应该仅仅是事物的现状，而应该是事物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同时，这样的认识又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事物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因此，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而应该随着实践的深入、对象的发展以及条件的变化而前进。根据真理的历史性特点，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上，必须注意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只有在正确地了解事物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关于其本质和规律的正确结论。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生的革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据一般逻辑进行的推论说：它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却是：它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8页。

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正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特点作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突出地表现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①真理的客观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们的主观认识必须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才能够达到真理。“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的认识只有在这种统一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

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都体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统一。主观和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的过程，就是认识不断地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所谓真理的绝对性，说的是真理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不可动摇的正确性。所谓真理的相对性，说的是每一具体真理的正确性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又有其一定的限度和不完全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①由此可见，真理的相对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事物本身发展过程的相对性。任何事物及其过程都只是无限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侧面或阶段，对它们的正确认识都只是对整个宇宙的绝对真理性认识的一个局部、一个阶段。另一方面是人的认识的相对性。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对客观对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事物有无限多的方面和联系，认识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同它绝对无差别的符合。每一个现实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真理的绝对性在于它的客观性，相对性在于它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真理的客观性同具体性历史性是统一的，没有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的事物的客观存在，也没有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的认识过程的客观真理，因此也就没有孤立的绝对真理。“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个论断，从一切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本质上和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我党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以此为借口，反对必要的防御和退却，结果导致了革命受挫。实践证明，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采取进攻和防御、进攻和退却相结合的策略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革命斗争的进攻性的实现。可见，真理的绝对性离不开相对性，它不是孤立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东西。同样，相对真理也不是孤立的、无任何绝对性的东西。每一具体的历史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但它们同时又都包含着客观的内容，都体现着人的认识向绝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对的客观世界的接近，它们都是正确的，不能违背、不可推翻的，所以也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种子。我们所得到的每一个正确的认识中，都包含了绝对真理的成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互相包含，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从静态的关系来看，每一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对立统一。从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的动态发展来看，绝对真理代表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完全的、正确的认识，相对真理代表不完全的、近似的认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还存在着过渡的关系、转化的关系。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经过相对真理才到达于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乃是由无数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为它增加新的种子。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转化，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人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次比一次更丰富、更精确、更全面、更深入。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过程是无限的；不仅相对真理的数量无限，而且每一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接近也是无限的。

“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着重论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重要原理。它对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告诉我们，绝对真理存在于我们每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之中。我们每正确地认识一个事物或过程，就是在部分地获得绝对真理，在向绝对真理前进一步。这个结论直接驳斥了那种否认知识可靠性的相对主义谬论；而相对主义正是实用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认识论基础。其次，它告诉我们，每一认识达到绝对真理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只有通过相对真理才能达到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对真理之中，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这个结论直接驳斥了绝对主义的谬论；而绝对主义正是我们党内教条主义者的一个思想特征。最后，它还告诉我们，真理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绝对真理的获得，是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汇合和转化中实现的。这种汇合和转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终结。人类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既是以往真理的综合体现，又是走向更高真理的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结论，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本身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的一个表现。每一个有志于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自觉地在认识和发展真理的道路上做一名真理的探索者。

四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特别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修正错误，特别是修正那些给人类解放事业带来危害的严重错误，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共产党人在团结全体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时候，不仅要随时同代表谬误和黑暗的反动力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还要随时注意保持自己的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克服那些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错误。“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对自已言行的唯一正确的、郑重的、科学的态度。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光有良好的愿望就可以的。真理和错误都要用科学的精神来对待。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坚持真理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①我们共产党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科学真理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从而在实际活动中实现了真理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真理同人民的利益之间有着内在的、根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是由真理的客观本性以及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和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我们知道，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不偏爱任何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对待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却是不同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同真理相一致，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并且能够坚持真理。一般来说，进步阶级的利益同真理是一致的，他们是热爱真理的；而反动阶级的利益同真理是不一致的，他们是害怕真理的。象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些剥削阶级虽然在其上升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同真理相一致，表现出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畏精神；但由于他们的剥削阶级的局限性，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同一切真理都一致。只有无产阶级这一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才是同一切真理相一致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来是靠了自然科学的真理去征服自然，靠了社会科学的真理去改造社会谋求自己的解放。他们从总体上欢迎一切真理，拥护一切真理。只有真理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战胜了谬误，他们才会有幸福和光明。我们知道，客观真理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任何反映社会生活的知识和理论，如果不能正确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生活的主要承担者——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果，不被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所证实，它就不是具体的历史的真理，就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象“地主养活了农民，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历史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创造的，群众的自由和解放只能由少数人从上面赐给他们”等等剥削阶级的观点，由于它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违背，根本不能成为真理。而“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所以，社会的客观真理必然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的；并且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战胜谬误，向前发展。真理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谬误当然就同人民的利益相冲突了。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应当自觉地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坚持真理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必须符合客观真理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具体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

一个是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必须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般来说，党的领导机关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组织上、政治上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其中包含着在思想上同领导机关一致，服从真理的意思；同时，党的方针政策又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也包含着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意思。所以，一般来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群众负责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二者也会发生矛盾。如果这种矛盾是由于党

的领导机关的方针政策错误所引起的，那么党员和党的领导机关人员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在政治上组织上与党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帮助党的领导机关修正错误。这时的向领导机关负责，就表现为对党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负责。如果矛盾是由于人民群众方面的某些落后因素或错误倾向引起的，那么共产党员就应该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代表着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抛弃那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相反，在上述两种场合下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尾巴主义等等，既不能真正做到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也不能真正做到向人民群众负责。总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再一个是少数人掌握真理与争取大多数人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真理终归是要为人民的大多数、为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大多数成员所拥护和掌握的。否则，真理也就不成其为真理，也不可能战胜谬误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由于种种具体条件的限制，“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②真理在斗争中曲折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由少数人掌握到由多数人掌握，就是用真理去争取大多数人。所谓“争取”大多数，一是要“争”，要坚持正确的观点，批评错误的观点，向大多数人作宣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6页。

传；二是要“取”，不要同大多数人对立，要听取他们的意见，采取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践，相信大多数人一定能够通过实践而觉悟并接受真理。少数人掌握了真理去争取多数人，这是一项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的艰苦工作。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善于用真理争取大多数人的光辉典范。

根据革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为了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性，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党的多数同志的一致意见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符合真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服从多数也就是服从真理。当真理暂时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要争取多数，又要保持全党团结一致而不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在组织上服从多数，通过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将多数人争取过来，使多数人接受真理，正是有效地坚持真理的一个正确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的简单化态度，也要反对“少数人正确就可以不顾大多数”的片面性观点；既反对不讲是非的一团和气，也反对组织上闹分裂的倾向。

坚持真理是同修正错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也会不时地发生各种缺点和错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错误是难免的。但是，错误难免不等于听任错误。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①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修正错误”是同“坚持真理”相提并论的，这是因为错误同真理有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联系。错误同真理的对立，决定了改正错误的必要；错误同真理的统一，决定了改正错误的可能。改正错误之所以必要，一是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人们照它去做就要失败；二是因为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错误是能够向正确转化的。毛泽东同志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①。他还说，错误也有两重性。其一：“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其二：错误“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复杂过程中，常常是经过犯错误才找到正确答案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的伟大斗争中，曾经犯过不少错误，但终于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正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②。

改正错误的根本方法，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在革命队伍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两条是必须注意的。第一，要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区分两类性质的错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是革命队伍中的是非界限，弄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1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①第二，把增强全党和革命队伍在真理基础上的团结和提高战斗力作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是好人犯错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错误务求“惩前毖后”，毫不留情，对同志则旨在“治病救人”，允许犯错误，欢迎改正错误。

保证我们身上的缺点错误能够迅速而彻底地得到纠正的重要途径是发扬民主，依靠党内外广大群众一齐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曾把通过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来克服党的缺点和错误形象地叫做“内外夹攻”。他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②我们党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它必须而且能够充分依靠党内外群众的“内外夹攻”来治好自己身上的毛病。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就是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民主生活，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外充分发扬民主，就是要让人讲话，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之中，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随时倾听广大群众的呼声，

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②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8页。

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就是在认识真理、实践真理和发展真理。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都应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①。有了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就能够不怕任何邪恶势力，不怕在同谬误的斗争中作出牺牲，也不怕别人的误解、讥笑和打击，始终胸怀坦荡、乐观坚定；就能够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怕揭露自己身上任何同真理不相容的毛病，不怕在克服和纠正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时所产生的痛苦。我们应当象陈云同志说的那样，无论对人对自己都是“只讲真理，不讲面子”。当一个人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时候，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有一段饱含革命激情的话，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②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2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1046页。

第九章 论矛盾

矛盾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成功地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胜利；同时，他们又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处理各种矛盾所积累的新鲜经验，创造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特点的关于矛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它的矛盾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彻底性，它把矛盾观点运用到一切领域的一切过程的始终；另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它把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融为一体。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的理论，应当紧紧抓住这两个特点。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时，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根本的法则，从而不但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并且由于处理了丰富多采的矛盾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的系统的理论。关于矛盾的理论在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矛盾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矛盾观点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首先表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重视对于矛盾规律的研究和运用上。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特别重视矛盾规律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和党内斗争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世界东方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进行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是伟大的特殊的一部分。它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又不是十月革命的简单重复。这个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就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中国的情况确如列宁所说，社会的各种矛盾纵横交错，情况极其复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

^①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①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规模之壮阔，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斗争之残酷，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又联合又斗争，革命敌友的迅速变化和重新组合，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曲折，进攻和退却，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公开斗争和地下斗争、和平的斗争和武装的斗争等革命斗争形式的多种多样，作为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广阔的领土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变化多端，在党内斗争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如此等等，都表现出中国社会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过程，特别集中地表现了历史事变的辩证法本性。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认识和掌握如此复杂多样如此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辩证法运动，不断地把这种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所提供的新东西用以丰富我们的主观辩证法，用以丰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列宁所提出的那种特殊而困难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就是因为他肩负起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特殊而又困难的历史任务。拿关于矛盾特殊性的问题来说，这是每一个着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人都会遇到而且必须着重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不研究关于矛盾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具体应用，就不能对于中国社会的矛盾作出中肯的分析，就不能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深刻理解这一问题的意义，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此后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287页。

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都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结果。与此同时，不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尽管具体表现不同，但都是不愿意研究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作具体的分析，“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陈独秀是照抄旧民主革命的一套，王明则是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着力研究和阐发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就是要解决历史已经提出而陈独秀、王明等人又不愿意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要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而避免重演陈独秀、王明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从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有的放矢的。

矛盾观点之所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还表现在它是贯穿于毛泽东同志的一切哲学观点和一切科学著作的一条红线。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自始至终包含着矛盾。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一根本立场出发，坚持用矛盾观点观察一切事物和过程。他对于事物的分析总是从分析矛盾入手，着重揭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他所写的《实践论》这部著作中，对于认识问题的研究就是以分析认识过程中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为线索，以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结论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建立在实践基础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上的认识的矛盾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认识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解决的。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但是只有通过实践，主观才能能动地反映客观，不仅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是不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认识的真正目的在于改造客观，也只有通过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达到改造客观的目的。所以在认识和实践这一对矛盾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具体化、深刻化了。认识过程的其他矛盾，如感性和理性、粗和精、真和伪、此和彼、表和里、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等等，都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某一个方面的表现，而且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的制约。所谓认识的矛盾运动，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循环往复的无穷过程。认识的任务就在于在实践过程中，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求得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无论是从它的总体上还是它的每一个环节上，无论从实践和认识的本身还是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上，都始终坚持矛盾的观点，把矛盾规律当作认识规律加以运用。很明显，不懂得矛盾观点，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哲学的认识论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进一步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抓住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分析了它在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分析了它对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的制约，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的本

质、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关于社会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钥匙。什么是社会？社会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统一体。认识了这两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的本质也就清楚了。社会为什么会发展？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统一和斗争。社会如何发展？社会发展的实在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懂得矛盾观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它所展开的各个方面。

此外，毛泽东同志把矛盾规律运用于战争，全面论证了军事和政治、战争与和平、战略和战术、进攻和防御、内线和外线、前方和后方、持久和速决、计划性和流动性、集中和分散等等的对立统一关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把矛盾规律运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运用于观察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运用于党内生活，提出了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创造了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矛盾观点，不仅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而且体现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之中。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说过：“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

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 同样地，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特别是矛盾的观点，也不可能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在它指导下的我党的实践活动；因为在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切哲学著作以及其他一切科学著作中，在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都贯穿着一个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树立起矛盾观点，用矛盾观点观察一切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掌握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就是要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用矛盾分析法去正确地分析矛盾并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矛盾分析法，而且都是运用这一方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大师。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③。在这极其伟大的成功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把矛盾分析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看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个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不同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应用矛盾分析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现了这一社会的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②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还根据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正是在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矛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都是同对于矛盾分析法的科学运用分不开的。因此，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二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在中国，全面深入地解释和发挥了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同志。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不仅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还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充分展开了唯物辩证法实质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科学地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论证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呢？

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的本来意义和根本内容上看，辩证法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辩证法最初是指论战中揭露论敌思维矛盾的方法，进而成为揭露事物本身矛盾的方法。可以说，辩证法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它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即事物矛盾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的本质，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世界上找不到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的事物，也找不到只有统一没有对立的事物。离开了对立的统一，只能是僵死的形而上学的统一，而不是活生生的辩证的统一；同样，离开了统一的对立，只能是互不相干的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而不是相互贯通的辩证的对立。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②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对于他的上述思想作了新的发挥和新的概括。他反复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就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同志认为，辩证法作为宇宙观，最根本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就是矛盾观，即对立统一观。这就从辩证法的根本内容和本来意义上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其次，从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实质上看，对立统一提供了理解联系和发展的钥匙。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①。然而什么是联系呢？所谓联系，实质上就是矛盾的联系，对立统一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不仅充分肯定了普遍联系，而且特别指明了普遍联系的本质就在于对立的统一。一切联系都是对立统一的表现，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离开了对立统一，既不可能有联系，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联系。

列宁说过，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②，而发展就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③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事物为什么会发展的问题。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还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中量变和质变这两种状态的相互推移，科学地说明了一切发展的实在过程。毛泽东同志还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②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从事物内部两个方面的同一和斗争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科学地说明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联系和发展的实质上全面地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最后，从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上看，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是两种宇宙观的分水岭。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①形而上学为什么要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呢？就是因为它不懂得用矛盾的观点看世界。所谓孤立的观点，就是不知道在对立的统一之中把握事物；所谓静止的观点，就是否认事物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引起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谓片面的观点，就是看不到矛盾的两个侧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反面，这样一个真理。”^②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之所以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它坚持用矛盾的观点看世界。可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一切分歧和对立，都是由于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而引起的，或者说，都可以归结为是否承认对立的统一。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就从两种宇宙观斗争的焦点上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同志从各个方面科学地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活动中以及从事理论创造活动中，毛泽东同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②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志都首先集中抓住这个核心，并进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 矛盾学说的精髓

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人们要认识任何事物，就必须分析该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把握它所体现出来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了深刻地揭露这两种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绝对性、共性。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时主要讲的是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毛泽东同志根据恩格斯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各种科学和各种运动形式中都充满矛盾的思想，从简单的运动形式到复杂的运动形式，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全面地论证了“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②，“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③毛泽东同志针对苏联德波林学派的错误分析了矛盾普遍性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② 同上书，第281页。

③ 同上书，第280页。

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在过程的开始并不存在，只有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出现。在他们看来，最初只有差异而没有矛盾。这种观点势必要导致否定事物发展内部动因的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为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差异就是矛盾”^①。为什么说“差异就是矛盾”呢？因为有差异就有矛盾。任何互相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事物或方面之间，如果存在差异，那也就意味着存在矛盾。实际上，差异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指那些尚未充分暴露、尚未激化的矛盾。不能因为它尚未充分暴露，尚未激化，就否认它是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②当然，这里讲的差异是内在的差异，而不是外在差别。如果把那些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外在差别统统说成是矛盾，也是错误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矛盾的普遍性除了指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以外，还指矛盾性质的普遍性，即同类事物矛盾的性质具有普遍性。同类矛盾的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质，即矛盾的共同性或共性。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由它决定了一切社会形态的共同本质。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辩证法的前提；但是，仅仅懂得矛盾的普遍性还是不够的，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还必须掌握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相对性、个性，是矛盾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或矛盾之间的差别。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从而显示出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根据我们党内教条主义者失败的教训，特别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告诫

①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全党：“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②离开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就不能解决任何矛盾。根据教条主义者在分析中国革命这一矛盾体时失足的教训，他强调指出，对于矛盾的特殊性，应当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方面”^③去加以研究。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④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也不知道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联结，因而既解决不了具体的矛盾，也僵化了关于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教条主义者的教训，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丰富和发展了矛盾学说的精髓。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结的思想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就一事物和它事物的关系来说，特殊的事物总是和一般的事物相互联系的。任何个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②③ 同上书，第292页。

④ 同上书，第293页。

别的、特殊的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都是某一类具有共同性的事物中的一个或一部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个别事物，都分别属于这一类或那一类，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其二，就某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包含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点，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包含了一事物同它事物的共同本质。所谓“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①可见，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以及由于二者的脱离使革命遭到失败可以看出，在理论上弄清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于实际活动是何等重要。从理论上讲，这个道理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把握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理解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任何矛盾都有其普遍性、绝对性、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相对性、个性。因此，研究任何矛盾都必须联系它的共性来把握个性，联系它的个性来把握共性。如果不认识共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根据；如果不联系个性来研究共性，那么这个共性就会变成空洞的、无内容的、僵死的抽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个性，就无从把握一事物区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 同上书，第295页。

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如果不联系共性来研究个性，那么就不能在矛盾的总体上把握它的深刻的本质，无法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决任何矛盾。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不理解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无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辩证法也因其作用无从发挥而失去意义；可见，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既是客观的辩证法，又是主观的辩证法。既然一切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绝对和相对的统一，那么要研究事物的矛盾，正确地认识事物，就要用全力去发现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既不能离开矛盾的特殊性去抽象地看待矛盾的普遍性，也不能离开矛盾的普遍性去孤立地看待矛盾的特殊性；而应当善于在特殊性中把握普遍性，在普遍性指导下研究特殊性。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把这一共性个性的辩证法当作认识论运用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从来都是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矛盾的全局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的。他既善于从世界矛盾的普遍性来观察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又善于从分析中国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世界意义。在革命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是紧紧把握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相互联结以及一般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相互联结，具体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形和特殊性质，从而发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这里的“仍然是”讲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讲的则是矛盾的特殊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不仅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而且也是认识论的精髓。如果割裂了共性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分析矛盾，认识事物。

四 内 因 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恩格斯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以及列宁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思想，从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以及一事物和他事物的关系中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对事物运动的内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分析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得出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结论。所有这些，都为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内因论认为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运动、变化和发展。外因论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者主张外因论，他们夸大外因的作用，但并不理解外因的作用；唯物辩证法主张内因论，但又科学地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5页。

证关系，正确评价了外因的作用。

所谓内因就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①但是每一事物的发展，又是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就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区别只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某一个事物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来说的，而不是对宇宙的总体来说的，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就无所谓外因了。如果要给物质世界的运动寻找一个外因，那就势必要找到上帝那里去了。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毫无例外地都有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因此，唯物辩证法不但要从事物的内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和它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不但要肯定事物发展的内因，而且还要承认事物发展的外因。毛泽东同志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②，这就深刻地说明了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的道理。

既然对于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内因和外因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二者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没有区别呢？或者说，二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毛泽东同志从两种宇宙观对立的高度精辟地概括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③内因既然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性，那么只有内因才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据，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它的存在和作用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实在过程和方向。内

①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277页。

因在事物发展中的这种性质、地位和作用，不仅决定了它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而且提供了外因在事物发展中发生作用的基础。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就决定了它是事物变化的必要的外部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并且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一般地说，对事物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外因只能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某些方面的加强或者削弱，促进或者延缓事物的发展。特殊地说，外因在一定条件也可以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当事物的发展变化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然而没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就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时候，一定外部条件的形成，就对事物的发展变化由可能转化为现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内因和外因分别作为事物变化的根据和条件、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同它们能否起决定性的作用，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问题。前者说的是内因和外因作用的性质，后者说的则是它们在某种场合下作用的大小。不要把二者等同起来。当然，即使在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它仍然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不是根据，仍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而不是第一位原因，仍然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不是超越内因直接起作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范围的不同，内因和外因也可以相互转化。就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个国家本身的内部矛盾性是内因，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外因；然而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各国自身的矛盾性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属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它们作为一个总体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因。由此可见，随着外因向内因的转化，条件也就转化为根据，第二位的原因也就转化为第一位的原因。反过来也是一

样。当然，也不要因为这种转化，就把条件和根据，第二位原因和第一位原因混为一谈。

既然内因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那么事物内部的矛盾为什么能够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呢？列宁说过：“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①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时，深刻地发挥了列宁这个关于一切过程“自己运动”的思想，而且把这种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来认识，详尽地论述了矛盾内部诸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全面深入地展开了列宁关于对立面统一以及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思想。他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②又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③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揭示了它的两种含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④什么是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或“相互排除”。毛泽东同志不仅明确地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科学含义，而且全面论证了二者的相互关系。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3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④ 同上书，第301—302页。

首先，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毛泽东同志说，矛盾就是“相反相成”，就是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①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离开斗争性的同一性。离开斗争性去谈论同一性，就意味着把同一性绝对化，把对立面的统一变成僵死的、机械的自身等同，这会导致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可以想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共居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个专政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就是迫使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一种斗争手段。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采取革命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统一体，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的统一体的有效斗争手段。由此可见，对立双方相互依存总是靠斗争来维持的，各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也是靠斗争来实现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脱离了斗争性就不可能有同一性，也不可能理解同一性。另一方面，没有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命题，既强调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也内在包含了没有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如果矛盾双方没有同一性，也就失去了斗争的“寓所”；没有“寓所”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的斗争是不可思议的。对立双方没有一个由此达彼的桥梁，毫不相干，就无法进行斗争。离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这种斗争也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没有同一性也就不可能有斗争性，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正如脱离斗争性来谈论同一性是错误的一样，脱离同一性来谈论斗争性也是错误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这种相互联结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既要看到对立中看到统一，又要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只看斗争或者只看到统一，都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正是我党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在他们看来，凡是有统一的地方，就不会有斗争；凡是有斗争的地方，就不会有统一。他们的“公式”是：或者统一，或者斗争。机会主义者一旦把他们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公式运用于革命斗争实际，便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我们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十年内战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机会主义者既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只会突出某一个片面，而在其他历史条件下又只会突出另一个片面，因此，他们往往时而右时而“左”。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王明就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极端跳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极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既善于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和斗争，从而反对右的片面性，又善于在对立和斗争中把握统一，从而反对“左”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

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毛泽东同志曾就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强调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都是错误的政策”^①。我们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我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对于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运用；同时，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又是对于我党各个历史时期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哲学概括。

其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③ 同一性是有条件的，说的是任何两个相反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联结起来，才能够相互转化。没有一定的条件，它们就既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斗争性是无条件的，说的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无处不在，贯穿始终。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④ 具体地说，斗争性的无条件和绝对性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斗争性是不受同一性条件的限制的，它总要突破原来的条件，创设新的条件，从而使一过程向它过程转化，这一点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其二，只要有矛盾，就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4页。

②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4页。

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会有斗争，它除了要求“存在着矛盾”这个最一般的条件之外并不要求象同一性所要求的那样的特殊条件，无论是双方共居一个统一体时还是当统一体开始破裂、解体时，矛盾双方无不处于斗争之中，这一点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其三，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点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不仅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论述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斗争形式的相对性。他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为我们正确地开展矛盾的斗争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定了基本原则。

既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矛盾的性质千差万别，斗争的形式就多种多样。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矛盾的性质可以概括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斗争的形式也相应地有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形式。曾经有人以为矛盾就是对抗。毛泽东同志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②所谓对抗性矛盾是指那些在根本因素或根本利益方面相互冲突的矛盾。一般地说，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只有通过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才能解决。在人类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属于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表现为公开对抗的形式。历史上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最后总是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发展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08页。

革命。所谓非对抗性矛盾是指那些在根本因素或根本利益方面相互一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去解决，而是通过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如事物内部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形式，使矛盾得到解决。在自然界，天体的正常运行，生物个体的正常发育和成长，物种的进化等等，在社会生活中，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等等，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应当采取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当然，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矛盾的性质也不可能绝对不变。毛泽东同志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我们在处理矛盾时，必须十分注意矛盾性质的转化及其条件。矛盾性质转化了，处理矛盾的方法，斗争的形式，也就应当随之改变。

既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结合起来。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具有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敢于同一切阶级敌人、同一切艰难险阻、同一切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矛盾斗争的形式是相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具有冷静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通过对于事物的具体分析，审慎地区别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采取恰当的斗争形式正确地加以处理。只有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统一，才能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①

总之，“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弄懂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深刻地理解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之所以成为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就能真正地从根本上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

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上全面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而且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勇敢地提出并坚定地执行了独立自主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在《矛盾论》里他又从一般的意义上强调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上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⑤在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⑥，强调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② 同上书，第307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3页。

④ 《反对本本主义》，第8页。

⑤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 干革命是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

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据在事物内部，但丝毫不否认外因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即使在极力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候，也没有拒绝外来援助的意思；相反地，总是把它们放在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在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同时也指出：“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② 在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强调了争取可能的国际援助以及借鉴别国经验的必要性。同任何矛盾中的双方不是平行并列的一样，在独立自主和争取外援这两个方面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五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

毛泽东同志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③ 他又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④。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8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④ 同上书，第301页。

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的问题。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诸矛盾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我们知道，一般地说，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只包含一种矛盾，而是包含着多种矛盾，越是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包含的矛盾越多。这众多的矛盾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毛泽东同志在具体地研究了这一发展过程时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①毛泽东同志还以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说明了矛盾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我们知道，在前一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对立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垄断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殖民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正是根据资本主义各种矛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盾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个别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结论，以及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和策略。在后一个过程中，虽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没有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所包含的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发展状况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平衡的。其中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如经过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经过土地革命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激化了，如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如由各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小新军阀之间不断进行的战争，以及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地主又重新占有土地等等。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诸矛盾发展状况不平衡性的具体分析，得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等一系列科学的结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由于不懂得当时中国社会诸矛盾状况的不平衡性，对于革命完全绝望，变成了一个取消主义者。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科学分析，反对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同时，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虽然极端痛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和政策，但又不愿意做长期艰苦的工作，不准备长期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企图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在一个早

上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中国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关于事物内部诸矛盾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时“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做分析的哲学概括。

其次，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诸矛盾在矛盾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毛泽东同志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还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②可见，事物发展中各种矛盾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平衡的：有主有次，有领导有从属，有决定有服从。

既然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对其他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任何过程的时候，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否则，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④。研究过程中诸矛盾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准确地抓住革命和建设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才能对客观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才能明确主攻方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② 同上书，第296—297页。

③④ 同上书，第297页。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凡是主要矛盾抓得正确的时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胜利；凡是在抓主要矛盾问题上出现错误的时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产生“左”的或右的偏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和损失。根据矛盾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集中主要力量准确地抓住并着力地解决主要矛盾，不仅是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采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②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是由“矛盾力量的不平衡”^③造成的。当着客观过程出现了新的条件，事物内部矛盾力量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的时候，原来的主要矛盾可能转化为次要矛盾，而原来的次要矛盾则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这一情况是我们从事革命斗争应当十分注意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引导革命取得胜利，不仅要善于抓住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且还要善于根据客观过程的发展和矛盾的推移，预见下一阶段将要出现的主要矛盾，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及时地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动员和组织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新的胜利。

①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根据矛盾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我们应当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但这决不是说可以轻视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主要矛盾固然规定和制约着次要矛盾解决的方向和结局，但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的解决与否和解决的好坏可以加速或延缓主要矛盾的解决。不分主次是错误的，只管主要矛盾不管次要矛盾也是不对的。只有集中主要力量抓紧中心工作，同时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才能既有利于解决主要矛盾，又有利于解决次要矛盾。

最后，矛盾双方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各自在矛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毛泽东同志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①事物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分并不是固定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②可见，正是由于矛盾双方的斗争引起了双方不平衡状态的变化，从而使事物由相对静止状态向显著变动状态推移，促成事物质的飞跃，推动事物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这种推移时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同上书，第298页。

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①这就说明，量变和质变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两种运动状态。当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达到主次移位时，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是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过程，这时事物还保持着自己的质的相对稳定，还处于量变阶段。当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已经达到主次地位开始相互转化时，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就由相对平衡向新的不平衡转化，这时事物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开始丧失，而进入了显著变动状态即质变阶段。

研究矛盾诸方面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各自在矛盾运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分析矛盾双方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确定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同志不仅详尽地分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诸矛盾以及矛盾着的诸方面发展状况及其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而且全面考察了事物矛盾运动的平衡和不平衡以及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为什么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呢？

首先，从两种状态的形式上看，不平衡是矛盾的经常状态，平衡是矛盾的暂时的特殊状态。平衡事实上经常被破坏着。有时候看起来好象是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情形，基本的、经常的状态则是不平衡。在我们的经济计划中积累和消费、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情况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这种情况作过具体的分析，他说：“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①在这里，平衡表现为一定条件下暂时的特殊的状态，不平衡则表现为经常的状态。

其次，从两种状态的条件性来看，不平衡正如矛盾的斗争性一样是无条件的，平衡正如矛盾的同一性一样是有条件的。所谓不平衡是无条件的，其一是说它是不受条件限制的，是突破平衡的；其二是说，它不要求平衡所要求的那些特殊条件，只要求最一般的条件，即有矛盾就有不平衡。平衡则不然。只有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才能造成平衡和维持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时说过：“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②这里讲的“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气力”、“党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7—18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

的策略路线的正确”等都是造成平衡的具体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平衡。

最后,从两种状态在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看,不平衡造成矛盾的推移,使事物变动不居;平衡则造成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稳定,使事物的量变得以充分展开。矛盾发展过程的平衡状态,反映了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相对稳定性。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在相对平衡的条件下,事物内部诸矛盾以及矛盾各方面的力量才能相互作用,使事物量变过程得以充分展开,促进事物整体向前发展。自然界只有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各种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才有可能相应发展。人类社会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和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只有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才能稳步协调地向前发展。相对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明显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必须注意,平衡的这种作用,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性质是不同的。当事物的量变过程正在展开,在它自身的范围内还有广阔发展余地的时候,保持相对平衡有利于促进事物的发展。这种平衡的作用是积极的。反之,当事物发展已经进入质变阶段,需要向新质过渡的时候,如果继续保持原来的平衡就会阻碍事物的发展。这种平衡的作用是消极的。这时,只有打破原来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才有利于事物的进一步发展。矛盾发展过程的不平衡状态造成事物变动不居,矛盾的推移,促成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一般说来,在事物发展的量变过程中,不平衡状态可以加速事物的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促进根本质变的到来。革命过程中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中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平衡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当

事物进入质变阶段时，只有经过不平衡状态，才能促使矛盾双方斗争加剧，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破坏旧的统一体，建立新的统一体，完成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

总之，不平衡性是矛盾的经常的普遍的状态，造成事物的变动不居，矛盾的转移，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平衡是矛盾的暂时的特殊状态，造成事物的相对稳定，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这种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都是由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所引起的，从而使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呈现出平衡和不平衡这两种状态的相互推移。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的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这两种状态；不要把二者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矛盾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有效地促进事物的发展，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研究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在概括我党丰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倾向，反复强调了研究两种倾向及其相互联结，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重大意义。

现实中诸矛盾和矛盾的诸方面由于它们的内在根据展开的程度不同和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性，使矛盾的发展表现为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是指现实中矛盾已经充分展开，并且达到了现阶段足以解决矛盾的程度，可以变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是指现实中矛盾尚未展开，或者矛盾虽已展开但现阶段还不具备解决这一矛盾的足够条件，因而目前还无法实现的那种可能性。随着现实的发展，矛盾的充分展开，力量对比的变化，条件的成熟，抽象的可能性还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可能

性。认识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和联系，十分重要。一方面，要看到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集中力量去办那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不要去办那些在当前只有抽象可能性而无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如果不注意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把抽象的可能性当成现实的可能性，把本是将来才可能办到的事情，勉强地拿到现在来办，那就要犯“左”的错误；反之，如果人们把现实的可能性当作抽象的可能性，放着当前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办到的事情不办，那就要犯右的错误。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两种可能性的联系，在争取变现实的可能性为现实的同时，还要积极创设条件，促使抽象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并进而把它变成现实。忽视抽象的可能性同现实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就会目光短浅，失去远大的奋斗目标。

在矛盾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区别抽象的和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可能性，而且还要看到在现实的可能性中往往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可能性。矛盾双方斗争的过程，同时就是两种可能的趋势争取实现的过程。在矛盾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中，既存在着新的一方战胜旧的一方从而使事物前进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存在着旧的一方暂时压倒新的一方从而使事物停滞、倒退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当然，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就新旧事物斗争的最终结局来说，胜利一定属于新事物，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只有这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根本趋势是通过两种可能性之间反复斗争实现的。在新旧事物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新事物并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新事物在还没有战胜旧事物以前，或者新事物虽然战胜了旧事物但胜利还没有得到彻底巩固以前，总是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为了变可能为现实，我们必

须同时估计到好坏两种可能，而且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应付最坏的可能性上面，争取最好的可能。实际上，从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正是排除坏的可能，争取好的可能并促其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准备两种可能，并且从最坏处着想，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事物发展中的两种可能性，也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倾向。从道理上讲很清楚，应当全面地看到这两种倾向，估计到两种可能。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矛盾状况的极端错综复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不平衡，往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使人不易觉察。因此，毛泽东同志总是在人们把握了那比较明显的倾向的时候，特别提醒注意那可能被掩盖着的倾向。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总是教育全党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但是，正如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一样，“左”的或右的倾向作为错误倾向的两个侧面，也总是有主有次，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党进行革命的斗争中，总是经常提醒我们，要抓住带倾向性的问题，要抓住主要倾向；同时又提醒我们，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时也要注意可能被它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上，总是坚持综合联合和斗争的政策，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当联合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同资产阶级破坏联合的阴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联合破裂，斗争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又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

向。鉴于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全党：“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是我党在革命斗争中反对“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总之，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同时还存在着非主要的倾向。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分析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既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倾向，掌握斗争的重点，又要充分注意非主要倾向；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又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左”的或右的错误，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六 矛盾的转化

矛盾转化的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矛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专门把它提出来加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②，“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③。他又说：“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③ 同上书，第303页。

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全面地阐明了矛盾转化问题在整个矛盾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矛盾转化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突出地说明了矛盾转化问题的实践意义。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矛盾的转化比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有转化才有发展。我们知道，转化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旧质转变为新质的决定环节，是旧统一体的分解新统一体的产生。转化意味着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有转化才有新事物，才有事物的发展。单纯地相互依存是不能说明事物的质变、飞跃和发展的。

其次，矛盾的转化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然而，没有转化就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②。没有转化也就没有发展，一切发展都是通过对立面的转化而实现的。辩证法的革命性表现在它的彻底的发展观点，不迷信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这种观点恰恰是建立在对立面的转化的基础之上的。

最后，矛盾的转化更为突出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③资产阶级则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并不否认它同无产阶级相互依存，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的根本利益，但绝对不会承认他们会由统治地位转化到被统治地位，会由存在转化到灭亡。所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50页。

以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总是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总是用形而上学去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到维持自己统治的目的。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的矛盾转化论者。任何时候，它都不会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的方面。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矛盾的转化是一种普遍现象。毛泽东同志说：“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①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情况，无论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或思维的发展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或现象不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在自然界中，作用和反作用，化合和分解，氧化和还原，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等等，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私有制和公有制，剥削者和劳动者，成功和失败，困难和顺利，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好事和坏事，优点和缺点等等，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思想领域里，真理和谬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等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总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世界就前进了一步。

有些转化，人们是容易发现和理解的，有些则不然。人们经常会由于不理解某些转化现象而怀疑矛盾转化的普遍性。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认为，“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完全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05页。

话中针对着这种否认矛盾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说：“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关于生和死的转化，他说：“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矛盾转化是普遍的，但矛盾转化的具体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研究矛盾转化的普遍性时，要注意矛盾转化形式的特殊性。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是常见的一种转化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此外还有其他的形式。有的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对立双方所代替。电子和正电子相撞转化为光子，质子和反质子相撞转化为光子和正负中性介子，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最终同归于尽，为新的对立双方即农民和地主所代替。有的矛盾双方融合而转化为一种新事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是根本对立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其他条件的逐渐成熟，它们会逐步地融合为一种新型的劳动。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肯定还会发现其它的转化形式。客观事物矛盾的丰富多采，决定了矛盾转化形式的多种多样。把矛盾转化的形式统统归结为一种形式，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转化是“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①，强调矛盾转化的客观性，反对矛盾转化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矛盾转化的客观过程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外部条件的作用，只有经过量变积累到突破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时，才有可能发生转化。没有量变积累到一定必要的程度，就不可能发生转化。在这里，掌握客观事物的度是十分重要的。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了一定程度，旧质向新质转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不改变事物原来的质的规定性事物就不能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促成事物的转化；否则，就会犯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反之，当事物的量变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旧质向新质转化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不能主观地、任意地实行转化；否则，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矛盾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因为对立的双方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互相联结，互相贯通，存在着一条彼此相通的“桥梁”。正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相互联系，才使二者的相互转化成为可能。要把这种转化的可能变成现实，仍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必要条件，转化只是可能而不是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实现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这个转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化”的保证，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由经济的落后状态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只有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使“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把坏事当成反面教材用以教育人民，才能使坏事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50页。

变成好事。我们的任务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转化的具体条件，并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设必要的条件，促使事物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努力克服、消除各种不利条件，警惕和防止事物向不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在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转化，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是前进、发展，表现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另一种是倒退、逆转，表现为新事物转化为主要方面以后旧事物又取得了优势。但是，从长远和全局的观点上看，前进的转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终究要实现的；而后退的转化，因为其丧失了必然性，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因而总是暂时的。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毛泽东同志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①但是，新事物的“新”，并不是固定地属于某一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新事物会逐渐变成旧事物，又会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正是由于这种转化的无限性，才构成了发展的无限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②

矛盾双方转化造成的新旧依次更替所经历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其中甚至包括着暂时的、局部的倒退。这是不难理解的。既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298页。

② 同上书，第299页。

然矛盾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要通过新旧之间的斗争才能实现，那么，新东西或者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利，或者由于经验的不足，在斗争中遇到挫折、失败，都是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代表新事物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力量，总是要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这样曲折的道路，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代表腐朽事物的反动派则总是要经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这样反复挣扎，才会走向灭亡。这就形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迂回曲折甚至暂时的停滞或倒退。然而一时的倒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新事物总是要胜利的。

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运动，也就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我们的事业时经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是这个意思。矛盾总是要转化的，但转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革命者就是转化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第十章 论矛盾(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事物的矛盾法则贯穿于对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的辩证运动和内在规律性，从而一方面胜利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又以这个改造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的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两类社会矛盾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等许多方面。这些思想透彻、明晰而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提供了路线上和政策上的理论依据。

一 社会的基本矛盾

承认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是用进化论观察社会的人们也可以做得到的。问题在于社会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因何在？所有这些长期以来使

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之前一直悬而未决。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基本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提供了解开社会发展变化之谜的锁钥。毛泽东同志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实际反复印证,明确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①对于社会矛盾的分析,是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做了,“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②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矛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性。我们知道,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引起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应当从社会内部去寻找。许多国家在地理和气候条件方面很相近,然而其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同上书,第292页。

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却非常大。同一个国家，在地理和气候条件并未发生多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却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的地理环境当然也是变化着的，但是这种自然的变化同社会的变化相比则显得很缓慢、很微小。地理环境以若干万年为单位显现其变化，社会则在几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即显现其变化。所以，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可能在于社会以外的自然界方面，而只能在于社会的内部矛盾。当然，如同一般事物的发展不能排除外部原因的作用一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时常存在并发生相当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①根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诸种社会矛盾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物质运动系统，其中包含着多种的因素和多样的联系，在发展过程中纵横交错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有多种矛盾在起作用，因此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就需要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推动社会运动的内部矛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和全党一起,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逐步了解到在社会生活中各自起着独特作用并交织起来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反复和深入研究过程中,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把矛盾分析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结合对于世界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得出了关于社会矛盾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认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了其中主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推动社会的前进,推动社会的更替的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必然会引出不同的社会革命,使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自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这里。

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提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概念,并首先用以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说,马克思把事物的矛盾法则应用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①。这个矛盾表现为每个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从毛泽东同志上述论述来看，他坚持了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方法，由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进而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并在新旧社会的对照和比较中明确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范畴本身的构成和内在关系。社会基本矛盾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统一体。这两对矛盾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因为它们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状况及其展开。这两对矛盾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但又不是并列的。其中首要的、更为基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思想，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一般过程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0—11页。

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概念,用以概括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的矛盾结构,使人们更容易从本质上把握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引导全党站在整个社会运动的高度,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推动了中国社会由黑暗向光明的转变。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以及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观察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得出结论说:诚然,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②。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要求生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② 参看《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当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它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革命就是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放生产力。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一切被束缚的生产力。

我们知道，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要求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的作用就在于为经济基础服务。例如民主就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既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体现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曾经分析过旧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他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①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并支撑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反过来，蒋介石反动政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又极力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维持和保护这种严重束缚和摧残社会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生产力的腐朽的经济基础。为了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必须铲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而为了铲除旧的经济基础，又必须首先推翻反动的政治上层建筑。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新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新的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又推动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显示了它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国家政权、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只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性质、水平和发展的趋势），就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并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即使将来消灭了阶级，“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还说，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如果搞得不对头，即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要改变的。上层建筑(其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页。

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在社会的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乃是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动力。生产力作为社会运动的最终根源和基础,既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也是衡量一切处理社会关系的社会政策及其实践是否进步和进步程度如何的最后标准。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实行的一切政策,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思想,正是为我们抓住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方法。

二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承认这一事实,是正确认识阶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观点提到了历史观的高度,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把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看作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反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历史唯心主义，是违背事实的、非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巨大杠杆。毛泽东同志主持并亲自参加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生动地说明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奋起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这里所讲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揭示的普遍真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上述分析的哲学意义不仅在于以中国社会的具体事实印证了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般原理，而且还在于它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那个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一方面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反抗的斗争。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斗争，而是农民阶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即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再一个是:为什么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标志是什么?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就在于它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只有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才称得上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对封建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正在于它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成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把握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地、具体地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命题的确切含义。

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具有对抗的性质,最终总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由此便发生了阶级社会中的革命和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①认识到一切对抗性的矛盾最后都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是极为重要的。“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②。阶级社会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在本性,决定了社会革命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不管反动派怎样宣传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最终必然取得胜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② 同上书,第308—309页。

主义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谱写出革命战争的光辉篇章，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

首先，关于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透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包括消灭外来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都是为了能够“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①。社会革命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政治色彩，往往使人们不容易看清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实际上，改革政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②。要解放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并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以至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这就是说，构成生产力的要素都由于革命的实现而获得了解放。特别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解放，其意义更为重大。劳动者有无限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社会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最终体现在对于社会生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

② 同上书，第1029页。

产力的解放上。忘记了革命的目的，或者对此若明若暗，就会在理论上发生偏差，在实践上出现失误。

其次，关于革命的形式。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阶级斗争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等各种形式，由阶级斗争引起的社会革命同样在上述各个领域内表现出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竭力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来镇压革命以维护旧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而使政治斗争的作用突出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可以归结为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斗争有两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亦即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当对革命阶级的非武装的压制不能奏效时，必然要进行武装的镇压，把战争提到日程上来。革命阶级只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才能实现社会的革命改造。战争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深切感受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②共产党人积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认识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③中国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③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面临着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形势，组织武装斗争成为自己的主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①。当时有人把强调武装斗争指责为“战争万能论”，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回答：“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②当然，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来，武装斗争虽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武装斗争还要同其他形式的斗争相配合而进行；因为“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③。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学会了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有机地、密切地配合起来，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再次，关于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都会使众多的人民和许多阶级卷将进去。在有许多阶级参加的革命中，哪个阶级居于领导地位，这一点决定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保证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最进步、最革命、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阶级手里，是革命顺利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0页。

② 同上书，第512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9页。

段，已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场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是通过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共产党人从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出发，不争个人的领导权，但是一定要争阶级的领导权。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① 忽视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就会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强调，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经验的总结，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的总结。陈独秀把中国革命混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资产阶级是当然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只能作为附从参加革命，不必要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就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了出去，也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给党造成惨重的损失。

同时，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强调革命的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615页。

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①就是说，在革命中掌握着领导权的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同盟军，这就是一切可能参加革命的阶级和阶层。没有革命的同盟军，自己孤军奋战，所谓革命的领导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②，这三项中的两项（即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对革命的同盟军和领导权问题的正确解决，足见其意义之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里所说的农民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同志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③此外，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有这样三方面紧密程度不同的革命同盟军，无产阶级在与同盟军的关系中体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这都是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否认或忽视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拒绝同盟军的支援，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革命同盟军问题的强调，是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经验的总结，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教训的总结。王明等人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主张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把中间势力不是看成可以争取的而是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打击。这种“孤家寡人”的策略给党的革命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②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9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最后，关于革命的道路问题。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①也就是说，革命的普遍规律是一个，而革命的具体道路却可以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阶级斗争引起的国内战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一旦起义和战争爆发，就要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这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走过的，并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获得了成功。中国则与此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经过长期的摸索，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找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被称为“井冈山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历史也将证明，这条道路还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光辉胜利，在世界上发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的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希望从中国革命中吸取经验,摸索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对拉丁美洲党的一些代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所以,各国人民不仅可以根据本国情况选择革命的具体道路,而且只有根据本国情况选择革命的具体道路,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但是,原有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原先处于次要地位的矛盾又突出起来,过渡时期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这些矛盾都是原有矛盾中未完全解决的部分的遗留、继续和发展。接着,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中,根据民主革命胜利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所有这些,决定了党在从中华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里，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直接相关，而且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与这一阶级矛盾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即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切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以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此后的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在什么规模上进行，有什么规律，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新课题。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实践证明，能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学说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才能顺利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起初，人们以为，我们的国家是空前统一的，人民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团结和统一，没有矛盾和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①他还说：“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教训做根据的。苏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强调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不承认还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才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彻底贯彻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从实践上吸取了苏联的教训，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若干年之后，而是在这一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初，就及时提出了正确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取得了主动权。

不承认或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人们，从世界观上讲，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一是不能或不敢正视社会主义的现实，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实际上，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没有世界。这个矛盾普遍性的道理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然而许多人一遇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就把这个道理忘得一干二净。毛泽东同志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特有的理论勇气和辩证法精神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同时，他还列举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说明这一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存在，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复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0页。

杂的矛盾结构。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时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所有制问题上，还有某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寻找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种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

毛泽东同志不仅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主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6—17页。

理，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在旧社会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这种根本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矛盾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结束了剥削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更好地结合起来。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即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同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为少数剥削者服务的旧的上层建筑性质根本不同。因此，相应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新的社会形态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本质上不同于旧社会的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其次，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4—15页。

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而是表现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或者说表现为基本上适合与部分不适合的矛盾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刚刚建立,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是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这种矛盾是基本适合中有部分不适合,同旧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不适合中有部分适合,是正好相反的。最后,矛盾的解决方法不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由于具有对抗性,不可能由旧社会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不具有对抗性,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解决。旧社会的上述矛盾需要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而且只能通过自身的调整、改革和充实的方式来解决。上述各点,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它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尽管还有矛盾,还不够完善,但是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的社会制度,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新旧社会、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不致由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而分不清新旧社会,得出消极的、悲观的结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矛盾的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找出相应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一个运动、发展着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在解决了原有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还有敌我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社会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那么，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这两类矛盾相互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时明确提出来的，但是这一思想的雏形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学说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对于一切包含人民和敌人的社会都是普遍适用的。因此，我们下面专门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四 两类社会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总课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①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指出，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②。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而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则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分清人民和敌人，是正确处理表现在人与人关系上的社会矛盾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明确指出分清敌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

①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页。

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①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只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首要问题。我党历史上由于混淆敌我界限而造成政治上的失误,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的损害,实在是够多的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认敌为友,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认友为敌,实行关门主义、孤家寡人的策略,也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出现过这类情况。这些都从实际方面说明了分清人民和敌人的重要性。

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社会矛盾。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两类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表现在“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②。之所以有这种性质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类社会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产生于敌我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人民内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的质的区别,是我们区别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不同性质的重要尺度。但是,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界限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敌我矛盾无疑是对抗性的矛盾,然而这不等于是说凡具有某种对抗性成分的矛盾就一定是敌我矛盾。了解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页。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恰当地把握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界限。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我们在战争年代经常处理敌我矛盾而缺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引导全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时，把重点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观点深入观察社会生活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于它的内容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都做了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这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中人民的范围的历史变化所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范围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内部的矛盾，以及这些阶级、阶层、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之间的矛盾。例如工农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

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①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又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解工农之间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这种矛盾的非对抗性，才能真正理解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正确看待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②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页。

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实践的结果是,我们妥善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避免了这一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实现了由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少数民族有几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居住在约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广大地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和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毛泽东同志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①对于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教育,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②

共产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它是党外各种社会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既要承认党内矛盾的客观存在,又要认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3页。

② 《论十大关系》,第15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清党内矛盾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无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前提。所以，党一方面必须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对于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煞党内原则的分歧，掩盖党内矛盾，躲避党内斗争，敷衍了事，是根本不对的，是对敌人有利的，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是和我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对一切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采取敌我不分的态度，或者抱着绝对的态度，都机械地过火地去进行党内斗争，主观地去制造党内斗争，也是根本不对的，是和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①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把党内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就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党的事业。

人民内部的矛盾与敌我之间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在一定条件下，敌人可以变成人民，人民可以变成敌人；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变成非对抗性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变成对抗性的。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愿意接受改造的条件下，它又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同党的正确路线之间的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由于王明顽固坚持错误并进而叛党叛国，使矛盾转化成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63—164页。

了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①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情况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人民内部不可能发生长时期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对抗。

在认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怎样在实践中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呢?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两类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解决两类社会矛盾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他说,在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时候应当划清两类不同的界限: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解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个是非问题,但这是和人民内部的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在思想上混淆这两类界限,在行动上就会出现偏差。

其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解决两类社会矛盾所应当采取的基本方法。他说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的作用和适用范围是不同的,不能随便移用。专政的方法只能用于敌人,不能用于人民内部。关于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做过一些具体的说明。他多次反复强调: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8页。

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根据我党多年来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概括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

第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下，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自由是有纪律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但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反而还会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条原则。

第二，“团结——批评——团结”。毛泽东同志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①。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党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时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到抗日时期，我党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在延安整风时，用这个方法处理了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全国解放后，我党又用这个方法处理了同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全国人民“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②。

第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这个方法最初是在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合作化运动中提出的,用以处理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调节其中的矛盾。这个方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所出现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

第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方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应当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即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解决。

第五,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是针对国家人民的全局而言的。它要求局部服从全局,但不是置局部于不顾,又对局部做出适当安排。我国人口众多,这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也是我们的困难之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①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就可以适当地处理由于上述困难所带来的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方法。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相应地,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些具体方法来说,上述方法又只是一些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千万不能把它们看作某种固定的模式。在运用这些一般原则和方法时,还需要与具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围绕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5页。

一个总的目的或目标。在革命时期，为的是“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①，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② 这是一个基本方针。

五 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阶级社会复杂的矛盾现象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③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社会生活中矛盾现象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社会错综纷繁的矛盾，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分析法的许多论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特别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深刻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4页。

③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我们知道，革命是进步的人们参与的历史活动。它不可能不遇到维护旧制度的人们的阻挠和反抗。社会革命的内在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外在表现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激烈斗争。要正确地、有成效地进行革命斗争，首要的问题就是分清敌友；而为了能够真正地分清敌友，就必须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的分析。

科学的阶级分析不是主观的、任意的分析，而是对社会的阶级状况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种分析只能来源于对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周密细致的调查。社会调查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调查。毛泽东同志说：“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②我们作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胜衰荣辱的情况。通过这种深入的调查，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的阶级分析，从而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并据以定出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离开实际的阶级状况的调查，就不能有科学的阶级分析，就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③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的社会调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第6页。

③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查，从而使他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早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个阶级分析的结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验证，并逐渐得到全党的承认，成为制定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依据。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的阶级分析对于我们的革命斗争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阶级的逐层分析上。阶级作为社会的特定的人群共同体，不仅在各个阶级之间各各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也有复杂的各具特点的成分。因此，全面的、深入的阶级分析除了要求对社会不同阶级的特点加以区别之外，还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内部作细致的解剖。不然的话，我们对阶级的了解就会停留于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之上，达不到对阶级的多种规定性的综合的、具体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把对社会的人作阶级分析的一般方法引申到对阶级本身的分析，对构成阶级的阶层作进一步的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物质世界是有结构、有层次的，社会生活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也不例外。人们要认识某一层次，仅仅靠对这个层次的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深入到对下一个层次的分析，才能回过头来真正理解这个层次。正象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在自然领域中不了解分子就不能真正认识物体，不了解原子就不能真正认识分子一样，在阶级社会中不了解阶级就不能真正认识人，而不了解阶层也不能真正认识阶级。把阶层分析当作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内容，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意义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深入分析，是对阶级作逐层具体分析典范。这种阶层分析，原则上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地主阶级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把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时候也把它区分为有余钱剩米的，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以及生活下降的三种情况。他在分析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時候，也按经济状况找出上、中、下三个细别，这就是半自耕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的贫农和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的贫农。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对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使我们对社会各阶级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例如，依据对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我们党历来对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实行联合中产阶级，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行公私合营，赎买政策，用和平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依据对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我们党也实行了有所区别的政策。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

也应有所区别。”^①这种建立在对阶级的具体分析基础上的政策，为保障革命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各阶级作细致的分析，满足于对阶级的一般的、抽象的了解，用简单的原则去剪裁复杂的社会现象，只能做出唯心的阶级估量，引出错误的策略。他们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采取“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反革命阵营一边。其后果是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生过，由于影响范围和时间不同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革命事业，只是在纠正了这些错误之后革命才又顺利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和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政治分析。阶级斗争可以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但是阶级的划分则取决于经济关系；政治和思想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在分析阶级时，必须首先着眼于对人们经济地位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其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经济政治分析方法。例如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这三个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的不同表现同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细微差别密切相关。第一部分是有点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胆子小，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对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革命取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

怀疑的态度。所以，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他们想发财，但现实情况总不能如愿。他们感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觉得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无法维持生活。这种经济地位使他们对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等不满以至愤恨。对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不肯贸然参加，持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以后的生活简直不堪设想。他们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希望能改变社会现实，从而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这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将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使得经济分析的重心明确而不致于漫无边际，使得政治分析的根据充分而不致于主观臆想。当然，这里所说的经济政治分析方法，是全面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的方法，而不是划分阶级成份的方法。阶级只能从经济状况来划分，而不能以政治思想表现作依据。一九三三年毛泽东同志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讲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时，就未列入政治思想表现，而完全是以经济状况为根据的。

第二，数量性质分析。阶级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规定性。在分析阶级时要把握其质和量的统一，把对阶级的性质分析同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性质分析同数量分析相比，数量分析是基本的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实际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①在分析阶级时，必须掌握决定阶级性质的数量界限。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就得了解地主、富农、中农、贫

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农各占多少人口，各有多少土地。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都要找出一个数量界限。在土地改革中，党中央决定采取比一九三三年的规定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不算剥削阶级；只有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是解放前连续三年有这样多剥削收入者，才算富农。对于阶级界限的这种数量规定，是对特定质的阶级的量的关系作科学分析的结果。只有通过科学的数量分析，才能进一步达到对阶级性质的正确认识。

第三，层次构成分析。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阶级作逐层分析，把阶层分析看作阶级分析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阶级现象的深入分析不仅表现在纵的、层次分析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横的方面，即同层次的各个部分的分析，后者可以称之为构成分析。例如，资产阶级中有大资产阶级这一层次，而大资产阶级这个层次中又有附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区别。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都有复杂的构成，经济地位相近但谋生方式不同。无产阶级有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区别，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又由长工、月工、零工等构成。这里所说的层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指阶级、阶层以至社会集团的递进关系，人们有时也把各阶级地位的高低看作是一种层次。对社会阶级的层次分析和构成分析的统一，形成对社会阶级结构的系统分析。

第四，静态动态分析。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静止和绝对的运动之统一体。社会的阶级现象也是如此。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这种静态动态分析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静中把握动。在千变万化的阶级现象中，本质的东

西、规律性的东西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能够从动中把握静；但是本质、规律并不单独存在，要全面、具体认识阶级，还必须从静中把握动。二是从阶级状况的变化中分析阶级。阶级状况是变化、发展着的，所以阶级分析也要随着客观的阶级状况的运动而不断进行。每次阶级分析相对于特定历史阶段而言是静态分析，一次次静态分析的总和又蕴含着对阶级状况的动态分析。三是把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结合起来。阶级同其他事物一样，它的运动也采取相对的静止状态和显著的变动状态这样两种状态。因此，就需要有相应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去分别把握这两种状态，并在这两种分析的有机联系中去了解阶级的运动。

第五，综合——阶级估量。阶级分析不仅仅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①。实际上，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这里所要讲的综合当然包括这种小的综合，即对某个阶级、对阶级状况的某一方面的综合，这可以称为部分的综合或部分的阶级估量。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应当是全面的、总体的综合，亦即全面的、总的阶级估量。这种全面的、总体的综合建立在各方面的分析和部分的综合的基础上，而又有进一步的概括和提高。只有这样对社会阶级状况所作的综合才能提供对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总的阶级估量是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全面而又深入的认识。

我们对社会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是有着确定的目的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

① 《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① 阶级分析最终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肩负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随时掌握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关键。坚持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带有根本性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阶级分析法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社会现象的分析，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7页。

第十一章 论军事哲学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阐明了军事问题中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以及关于历次重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既是指导人民战争的军事科学著作，又是深刻生动的哲学著作。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极为杰出的贡献”，“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此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也都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关于军事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关于军事问题中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的系统论述，以及他们研究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构成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战争和政治

毛泽东军事哲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从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考察战争与政治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了一系列有关战争问题的科学结论。

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他又说:“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②“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③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社会历史根源,概括了战争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及其规律。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远地存在下去。在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因而也就没有战争。战争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形式,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历史阶段上,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③ 同上书,第443页。

的，当然它也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战争既然同人类社会中一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相联系，那么，战争和政治就是不可分割的。列宁说过：“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①又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②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全面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③他还以我国抗日战争同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④。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分析了坚持抗战和政治进步的关系，阐明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他指出：“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⑤历史经验一再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②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④ 同上书，第447页。

⑤ 同上书，第424页。

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能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时说：“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①“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②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政治决定战争，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战争；另一方面，战争又反作用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战争总是一定阶级政治的继续。这是战争的一般性。因此，那种把战争同政治割裂开来，否认战争的政治性质的战争绝对主义倾向是错误的。

然而“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又告诉我们，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而是一定阶级用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战争不是解决所有政治矛盾的一般手段，而是解决对抗性政治矛盾的特殊手段。战争也不是解决所有的对抗性政治矛盾的手段，而是解决那些用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对抗性政治矛盾的一种最严酷、最激烈的暴力手段。毛泽东同志认为，基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1页。

② 同上书，第980页。

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这就是战争的特殊性。否认战争的特殊性，把战争完全等同于一般政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战争和政治相互关系的精辟的概括。

依据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依据战争的阶级实质和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明确地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②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③只有那些为了争取人民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战争才是进步的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④。在历史上，十八世纪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僧侣和封建贵族的战争，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俄国十月革命所进行的国内战争，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国人民的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④ 《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第85页。

朝战争等等，都是这种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凡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侵略、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非正义战争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战争史告诉我们，一切正义战争不管多么艰难曲折，最后一定要胜利；一切非正义战争终归要失败。这是战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科学分析，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依据。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①对于一切非正义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反对的方法是：“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②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和歌颂正义的革命的战争。他说：“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③他赞誉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④。

毛泽东军事哲学对于战争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必然要涉及到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战争与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同上书，第444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④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和平是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宁在批判和平主义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的联系，不理解“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策的继续”^①。毛泽东同志坚持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他就指出：“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②。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苏联《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是互相排斥的，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也就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作为不流血的政治，也就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在一定条件下，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基本观点，是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国内和平和国内战争关系的理论根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世界和平和世界战争关系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站在争取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高度，明确提出“我们是

①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4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战争消灭论者”^①，从而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②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③。不久，他就进一步提出了“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的论点。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既是为了赢得战争，又是为了消灭战争。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消灭一切战争的崇高的目的呢？毛泽东同志指出，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④。他还说：“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⑤。之所以必须如此，就在于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把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改造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战争的根源。

二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个根本的思想。这一根本思想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哲学中唯物论和辩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⑤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句话：“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无产阶级战争理论中的具体贯彻和运用。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这是说，革命战争是为人民群众谋解放、谋利益的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要求积极参加的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伟大事业。这是化为战争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在革命战争中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说，革命战争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战争，任何人也不能包办代替。这是化为战争方法论的群众路线。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可见，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革命战争群众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革命战争的普遍真理。它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毛泽东同志和我党其他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全部军事著作之中，并且以不同的形式适用于人民革命战争。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兵民是胜利之本。”^③又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④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⑤众所周知，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积极参加广泛支持，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全国解放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次胜利的时候，又一次强调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在使用现代化武器的现代战争中，人民战争还灵不灵？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答：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 同上书，第476页。

④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7页。

⑤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

西降它。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①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

人民战争的最深厚的基础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离开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就没有人民战争。但是，要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一个进行这种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还是不行的。这个组织形式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时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②因此，他强调指出：“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③人民战争的本性和它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目的，要求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而只有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达到人民战争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能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呢？毛泽东军事哲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人民战争的本性和它所要达到的崇高的目的，根据军事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政治建

① 见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③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5页。

军的根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建军思想的核心。这个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点。

首先，坚持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贯彻政治建军原则的根本保证。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为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就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他们，肃清一切旧式军队和小生产落后思想的影响。早在红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同志就非常重视政治建军，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八路军中开展反对新军阀主义的斗争时进一步说明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②。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他在强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人民战争最自觉的领导者，号召全党研究军事理论，研究战略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③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政治建军的原则，不仅一般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委制，支部建在连上等有效措施。他说：“党的组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3页。

② 参见《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页。

③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这种制度进一步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指出：“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②。

其次，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贯彻政治建军原则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③我军成长壮大的战斗历程一再表明：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可能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就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所，只要还有一个人，他就能继续战斗下去。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制定并且贯彻执行关于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正确政策。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创造并且实行一系列适合人民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它能够按照具体条件的变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65页。

②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1页。

③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8页。

化，既善于进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又善于从事运动战。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建立起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以便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为争取战斗的胜利而斗争。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群众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真正实行军内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自觉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人民军队就能够真正实现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结合，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民兵的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结合，从各个方面配合和支援军队作战，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总之，要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就必须使这支军队牢固地树立起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只有按照这个根本思想来建设军队，才是真正按照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建设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

最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贯彻政治建军原则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日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强调了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进行政治建军的重要，又指明为了执行这种贯注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只有加强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把革命军队武装起来，才能达到政治建军的根本要求和各个方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面的具体要求，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一切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强大威力，才能使这支军队成为真正强大的军队。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全面地论证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论证了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批评了那种把军事和政治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取消或忽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因此，如果不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不重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毛泽东军事哲学看来，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一大特点，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说过：“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①

毛泽东军事哲学不仅强调加强政治工作对于政治建军的重要性，而且根据我军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军民一致的原则，实行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这三项原则是建军中的群众路线，要正确地执行这三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群众

^①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0页。

观点，真正地尊重群众。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①

毛泽东军事哲学在总结我军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整套开展政治工作、进行政治建军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达到这一方针中的三大目的，必须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解放战争中，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得到改善的目的，同时开展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活动，就是用军事民主达到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目的。其中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特别重大。这种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大大地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成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一方面着重强调政治建军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军事训练以及武器技术装备问题。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②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8页。

在一般情况下，士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而我们的士兵却没有这个条件，在红军初创时期常是昨天入伍今天就去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对于军事训练问题的重视。此后，在整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通过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而且强调要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争取军事技术条件的现代化。他认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的经常的训练。为此，他提倡全军实行冬季长途野营训练，学会全副武装泅渡，多搞夜战、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他还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武器”^②。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

毛泽东军事哲学十分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认为这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又坚决地反对唯武器论。唯武器论把武器看成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否认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他在批判这种观点的时候，科学地阐明了人和武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② 《给总政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1955年1月7日）。

③ 《论十大关系》，第6页。

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随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帝国主义及其御用的宣传家、军事家们就说日本投降是美国的这两颗原子弹造成的。这种宣传当时也影响了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尖锐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②他还进一步就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③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中国人民为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而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一直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

三 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 主观能动性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军事哲学特别重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9页。

③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能动性的问题,强调努力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

战争的正确指导来自对于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了实现对于战争的正确指导,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主观指导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这里所强调的战争的主观指导对于战争的客观规律的依赖关系,是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唯物论,是研究战争指导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战争规律是战争这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联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制作用。人们只能遵循战争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决不可能违反它而不遭受失败。

承认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强调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于战争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战争的规律有什么特点呢?在实行战争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呢?

首先,毛泽东军事哲学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的时候,必须注重分析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必须研究和把握一般事物的规律和特殊的战争的规律及其相互联结,必须研究和把握一般战争的规律和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及其相互联结,必须研究和把握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及其相互联结,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且在总结十年内战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把这一科学结论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概括,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166页。

上升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关系的普遍原理，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它的对立统一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研究战争规律时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②。什么是一般战争规律呢？所谓一般战争规律是指那些反映一切战争共同本质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和任何性质的战争之中，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穿于一切战争的始终。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应当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时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③只有认识战争的一般规律，一切从事战争的人们才有可能掌握指导战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才有可能在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下，去揭示特殊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什么是特殊的战争规律呢？所谓特殊的战争规律是指那些反映基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而产生的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它是战争的一般规律所不能全部包括和完全代替的。这种特殊性在革命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

①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③ 同上书，第165页。

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①唯物辩证法认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一般和特殊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一般的東西，在另一种条件下则转化为特殊的東西，反之亦然。因此，革命战争相对于一般的战争及其规律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规律；但对于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来说，它又变成了一般的规律。因此，要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仅仅了解一般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也还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②“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③。

毛泽东同志根据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结，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④“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

①②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④ 同上书，第175页。

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①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分析，正是从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相互联结上，把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统一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正确地解决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问题，有力地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其次，毛泽东军事哲学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的时候，必须看到战争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是发展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在时间空间中按照它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发展着。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是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②又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③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特定的环境中和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是一般战争的特殊发展，又是一般革命战争的特殊发展。这种特殊发展决定了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和外国的一般的战争和一般的革命战争，而有它自身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规律。因此，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决不能简单地搬用历史上和外国已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结论。不仅以往剥削阶级的军事家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③ 同上书，第157—158页。

所总结的一般战争经验不能呆板地搬用，就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机械地搬用。只有根据战争的时间、地点、条件的发展变化，如实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解决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① 不同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本身也是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也是各有其特点，不能一律看待的。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总是“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②，具体地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敌我双方的特点，从而引出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战争规律，预见战争的实在过程和发展趋势，确定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按战略阶段可分为四个时期：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北伐战争是在我们党同国民党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根据这个时期敌我双方的情况和特点，当时所采取的是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从土地革命战争算起，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其战争和战争规律也是发展的。毛泽东同志从分析土地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出发，引出了这个时期战争发展的总趋势是：中国红军可能发展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可能战胜敌人但又不能很快战胜敌人，而且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根据这些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同志规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概括了“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战争形式。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战争。毛泽东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四个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从而引出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总趋势，预见了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以及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正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规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持久战三个发展阶段上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揭示了抗日战争中内线和外线作战，无后方作战和有后方作战以及敌我之间多层次的包围和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所有这些都表明，不仅抗日战争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不能一样看待，而且它本身也是发展的，它的三个战略发展阶段也是不能等同看待的。解放战争开始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存在。但是，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不顺，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毛泽东同志正是从当时敌我双方的这一特点中，引出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①这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并且由此规定了十大军事原则和以运动战为主逐步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方针。

战争的情况复杂，流动多变，兼之敌我双方总是相互保密，甚至制造假象，相互欺诈，使战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实性，增加了人们认识战争规律的困难。不少军事思想家和指挥家认为，战争不可捉摸，无规律可循。这是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9页。

论。毛泽东军事哲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战争，不仅科学地论证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辩证发展，而且全面分析了战争中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绝对流动性和相对固定性、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阐明了战争规律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可以认识的，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同各种不可知论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

应当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实性。这是战争的一个特点。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争也有其确实性。不确实性总是同确实性相联系而存在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没有绝对的确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① 战争中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是对立的统一。对于战争双方来说，每一方对自己的情况都是比较确实的，只是对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不管战争情况怎样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只要是敌之一方确实是在进行战争活动，就总会有所表现，只要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侦察手段，收集尽可能详细的情况，经过指挥员科学的分析综合，从而知其大略，知其要点，使自己的主观指导大体上符合客观实际，则是完全可能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侦察手段和反侦察手段的日益完善，必将使战争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战争永远也不可能只有不确实性而无确实性。高明的军事家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显示其卓越的才能的。

应当承认，战争具有流动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是迅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①，“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②。战争中，敌我双方都是准备或者正在相互厮杀的活生生的人们，双方只有随机应变才能争取主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条件下，战争的流动性更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流动性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争还有相对的固定性。战争的绝对流动性和相对固定性也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的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③为什么战争还有相对的固定性呢？原来，战争的流动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数的流动，另一种是质的流动。在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战略方针、战役方针和战术方针都是流动的，其中战役方针比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范围要短一些，战术方针则更短，然而这些流动性都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之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就是说，是数的流动，而不是质的流动。正是由于某一方针的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不流动的，这就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战争的相对的固定性，为人们认识战争和战争规律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同志说，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否认了这一点，其结果就必然使战争无从着手。否认战争的流动性，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否认战争的相对固定性，则是战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

应当承认，战争具有偶然性。由于战争本身是敌我双方力求掌握主动权和优势的激烈争夺，任何一方都竭尽全力剥夺对方驾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3页。

②③ 同上书，第464页。

取战争的能力，使之失去行动自由，陷于被动挨打。反之，任何一方的偶然失误和错觉也往往被对方利用。因此，战争比起其他事物来说带有更大的偶然性。然而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争中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偶然性和必然性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的。没有离开偶然性的纯粹的必然性，也没有离开必然性的纯粹的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凡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总是受必然性的支配。因此，决不能以战争具有更大的偶然性而否定战争中的必然性。战争也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由于战争中充满着偶然性，战争的指导者不但要善于通过偶然把握必然，而且要善于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及其作用，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尽可能地避免或者减弱不利的偶然因素的有害影响，以利于推进战争，夺取胜利。

总之，尽管战争具有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等特点，但这只是战争及其规律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战争规律的有无问题。这只能给认识战争和战争规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决不意味着战争和战争规律是不可认识的。由于战争中的不确实性同确实性、绝对的流动性同相对的固定性、偶然性同必然性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的，因此，战争及其规律，总是可以认识的。也正因为战争具有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就为从事战争的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宽广的活动场所，得以显示其能力和水平，从而也就使得战争中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特别丰富和生动。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主观能动性一般问题的论述，我们在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页。

《论自觉的能动性》一章中已经讲过，这里专门谈谈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在战争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军事哲学认为，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特别明显和强烈。它包括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以及运用战争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过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评论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名言时说过一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①

认识战争规律和运用战争规律，这决不是那些“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②。只有在深入战争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才有可能办到。就认识战争规律来说，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③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的基础，概括了从对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5页。

③ 同上书，第163—164页。

于战争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而且指明了实现这一能动的飞跃的科学方法和根本途径。

要认识战争规律，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必须对于敌我双方各种情况作系统周密的调查或侦察。不搞调查或侦察，就不可能做到知彼知己；即使搞了调查研究，如果态度和方法不对头，也不能真正了解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地调查研究，才能从战争双方客观情况中引出规律，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要注意反对那种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军事家。这种人没有调查研究，只能是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全无在战争中取胜的可能。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战争的认识过程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而且是并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由理性认识再回到战争实践中去。他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分析可以看出，由战争实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认识，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否则，即使有了关于战争的正确认识，制定了很好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的作战计划，但并不实行，那么，这种认识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况且，人们关于战争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所制定的计划是否正确可行，还需要在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在战争过程中，客观形势发展很快，经常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因此，人们原来对于战争的认识以及据此制定的作战计划，“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①。可见，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过程既是实践过程也是认识过程的继续，是认识过程中一次更加重要的能动的飞跃。实现这一次飞跃，更加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在实行战争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尤为强烈，作用尤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战争就是两军以军力财力等物质基础做地盘所进行的主观能动性的竞赛。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战争的胜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③ 同上书，第454—455页。

为了进一步说明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几个最充分、最集中、最生动地表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主动性问题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问题，是相对于军队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而言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旦失去这种自由，就有被打败、被消灭的危险。因此，战争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那么，怎样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呢？毛泽东同志说：“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①又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②这一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主动和被动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说明了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贯穿着彻底的唯物论，又阐明了主观能动性在促成主动或被动由可能变成现实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贯穿着彻底的辩证法。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在战略上不得不处于被动的地位。然而毛泽东同志却领导我们脱离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其基本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③。抗日战争初期，日本的优势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②③} 同上书，第459、457页。

和我们的劣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日本战略主动和我们的战略被动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们在军事上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把敌人抛入劣势和被动。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上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使敌我双方的战略地位各自向反面转化，最后形成我之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之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有意识地造成敌人的错觉，攻其不意的重要方法。他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①任何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在战争中一点儿错误不犯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故意使敌人造成错觉和不意，乘敌人之隙，攻其不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反而能够对敌进行不意的攻击，从敌人手中夺得主动，把优势的敌人打败。我们在战争中有优越的群众条件，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全体军民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法迷惑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战争的确实性给予自己，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把他们指挥员的思想搅乱，变成疯子，以便乘敌不备，攻其不意，从敌人手中夺取优势和主动。兵书上讲“兵不厌诈”。“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②

战争的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② 同上书，第460页。

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只有善于灵活地使用兵力，才能使自己的军队行动自由。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怎样才能做到灵活地使用兵力呢？毛泽东同志说，“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①。毛泽东同志把“灵活地使用兵力”和“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这两种要求，概括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②，深刻地阐明了指挥员明察情况，用心思索，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捕捉战机、机动灵活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做到灵活地使用兵力，作为一个指挥员，第一，要以极大的努力克服战争情况的纷乱和不确实性，从中找出条理和确实性来，从而做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部署和适时地改变部署。这种正确地决定部署或改变部署的能力，是实现指挥灵活性的根本条件。第二，要及时掌握战争情况的变化，抓住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关节，做到得其时，得其地，得其部队情况，实现灵活指挥。只有在正确地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因部队情况制宜，不误战机地指挥部队行动，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指挥的机动灵活性。第三，在实战过程中，要正确地使用战术并且灵活地变换战术。兵力何时集中和分散，如何组织分进和合击，如何实行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等；又如何地根据战争态势的发展变化，将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变为突击，突击变为钳制，以及包围迂回之互换等等，这些都需要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战争进程的客观情况，当机立断，正确处理。由此可见，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乃是聪明的指挥员善于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理方法的才能，有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

② 同上书，第462页。

了这种“运用之妙”，我们就能夺得主动权，转变敌我之间的优劣形势，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计划性是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战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具体实施。毛泽东同志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①因此，战争的指导者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制定尽可能严密的计划，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没有这个准备，什么主动性、灵活性等等，都是不能实现的。战争是绝对流动性和相对固定性的统一。因此，承认并且坚持这些科学结论，不仅要求人们依照战略、战役和战术的范围和情况制定计划，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需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及时地补充、修改和改变计划。无论是根据战争情况制定战争计划，还是依战争情况的发展而及时地改变计划，都有赖于战争指挥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②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于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科学分析，把毛泽东军事哲学关于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的论述更加具体化、深刻化了。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② 同上书，第463页。

四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由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创造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完整科学理论，是毛泽东军事哲学中极为光辉灿烂的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理论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军事哲学认为，人民战争以及它所要达到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是制定战略战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人民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人民战争经常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①。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都一点儿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例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都是以人民战争为根本出发点，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as 根本的指导原则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同人民战争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基本的军事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懂得这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及其发展。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的失败。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九五七年当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经历时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战术的根本原则或指导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思想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针对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提出的“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原则指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①他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是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

‘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可以说是这一法则的发展和新概括。

为什么在整体上、在战略上可以而且一定要藐视敌人呢？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我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所从事的人民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必然要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赢得最后的胜利。敌人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所从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人民意志，是没有前途的，必然要由大变小由强变弱，最终要被人民打败。这都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因此，藐视敌人是有充分根据的。这是我党战略决策的基础。为什么在战术上又一定要重视敌人呢？一方面，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特别是在初期，人民军队由于数量少、装备差、供给困难、缺乏军事训练等等原因，总是处于劣势；而敌人军队数量多，装备好，供给充足，又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暂时都处于优势。弱小的人民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在战术安排上，在处理每一次具体的战役战斗中，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集中全力作战。另一方面，只有在思想上十分重视敌人，认真地对付敌人，才能确保实行战争时取得胜利。

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在这里，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不被表面上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所吓倒，才能建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这是在战术上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做到善于斗争，善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

于胜利的根本前提。如果我们不敢在整体上藐视敌人，那么，战术上的善于斗争和善于胜利，也只能成为逃避斗争的一种遁词。同时，也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从每一个具体的现实斗争出发，实事求是地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特点，创造有效的作战方法，积极组织力量，争取每一战役战斗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削弱敌人的优势，才能使战略上藐视敌人有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只是提出革命战争的战略目标，不在每一个具体战斗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从而一步一步地争取胜利，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战略上藐视敌人也就成了一句“伟大的”空话。

总之，领导人民战争并且要夺取这个战争的最后胜利，首先就要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结合起来。只要能够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能够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善于斗争，力求每一战役战斗的胜利，那么，即使人民军队开始暂时处于劣势，也一定会取得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照顾战争的全局

确定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须懂得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①就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就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懂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什么是战争的全局和局部？毛泽东同志说：“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②这一概括，不仅

^{①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说明了战争的全局，而且也内在地包含了战争的局部的涵义。所谓战争的全局，从时间上看，它包括了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从空间上看，它包括了它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所谓战争的局部，则是指那些隶属于战争全局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和某一阶段的东西。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全局不是局部，局部也不是全局，二者具有确定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它们又相互联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在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全局决定局部，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一切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都必须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只有懂得全局，从总体上把握了带全局性的战略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及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自觉地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使战役战术为战略服务，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①因此，“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②所谓照顾战争的全局，主要就是要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③正是因为全局重要，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局部是隶属于全局的东西，在实践上要求局部服从全局。

在处理战争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时，强调局部服从全局，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③ 同上书，第205页。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看到局部对全局的反作用，还必须重视局部。这是因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①。如果脱离每一个局部来谈全局，那么就无异于把全局架空，从根本上否定了全局。任何一个合格的指挥员要真正掌握全局的东西，必须以他对构成全局的各个局部特别是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了解为基础，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局部对全局的关系。在局部对全局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注重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的局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二个战役这样的局部。他说：“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②战争史上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战役”，都是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这些都证明了关照全局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注意局部特别是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重要性。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59—160页。

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 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在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过：“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①这里谈的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在转入战略反攻之前的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全体军民的自觉能动性，逐步转变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态势，准备战略反攻并最后夺取胜利而制定的最基本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又一杰出范例。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劣势到优势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过程，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战略方针的真理性。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

什么是战略防御战之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呢？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经常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两种基本手段。其他的作战形式或战斗手段，都是进攻和防御的具体化和实际贯彻，都是以进攻和防御为内容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①这就是说，战争作为一种事物就是进攻和防御的对立统一，战争作为一种运动就是进攻和防御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进攻和防御存在着确定的差别，明显的对立，进攻的形式是主动的，防御的形式是被动的。然而，它们之间又具有统一性。进攻和防御相互依存，进攻以防御为前提，没有防御就无所谓进攻；防御也以进攻为前提，没有进攻，也就无所谓防御。进攻和防御还相互渗透，进攻之中有防御，防御之中也有进攻。只讲进攻而不讲防御的单纯进攻，或只讲防御而不讲进攻的单纯防御，最终都不免失败。但是，进攻和防御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毛泽东同志认为，进攻是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防御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一种辅助手段。在战争的实际过程中，有时以防御为主，进攻为辅，进攻是为了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有时又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防御是为了保障另一方向的进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②进攻和防御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一个大的战争过程中，还是在某一战役、战斗中都可以看到。

毛泽东同志不仅科学地论述了进攻和防御的一般辩证法，而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且把它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为我军制定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的战略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关于战略退却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直到我们有力组织反攻之前，我们在总体上都处于被动的、防御的地位，在战略上是防御战；但是，在某一局部，我们却可以相对地集中优势兵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主动进攻，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进攻战。如果没有这个局部的、战役和战斗的主动进攻战，总体上的战略的防御战是无法坚持的。毛泽东同志把这种防御战中的进攻战叫做积极防御。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①

什么是战略持久战之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呢？

战略持久战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战略防御战之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这个中心，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原则，说的是关于战略防御战和战役战斗进攻战的时间概念。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並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②

为什么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呢？因为中国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强大，而革命的力量弱小。毛泽东同志说：只要“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② 同上书，第217页。

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战役战斗上又必须实行速决战呢？毛泽东同志说：“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②国内革命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也如此。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则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到战场作战时，就应采取速决战。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则可以争取时间加强抗日力量，同时又可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持久战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的科学分析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从敌强我弱这一客观事实出发，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总的发展趋势出发，引出了战略的持久战，同时把战略的持久战化为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这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他又从战场上我们能够造成对局部敌人的绝对优势这一客观事实出发，从迅速地解决战斗各个击破敌人这种现实可能性出发，引出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同时以战役战斗速决战的每一胜利，作为巩固和达到战略持久战目的的有效手段，这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218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什么是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呢？

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战略防御战之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这个中心，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原则，说的是战略防御战和战役战斗进攻战的空间概念。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谈到“犬牙交错的战争”时，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辩证法。他指出，中日战争我是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但是，我军主力在内线，游击队则在外线，形成夹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以自己为内线，而又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许多夹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了，但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是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的，这又形成了后退和前进交错的奇特形态。从整个战争来看，敌处战略的外线作战，我处战略的内线作战，这就造成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敌之一路或几路置于我之包围中；从敌后游击根据地来看，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包围之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则许多敌人又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即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国家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如此等等。同战争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样，战争的内线和外线也是相互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般说来，处于优势的军队，其战略方针总是采取战略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它的外线作战的原则往往是“分进合击”；处于劣势的军队，其战略方针总是采取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它的内线作战的原则往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

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从敌强我弱这个根本特点出发，根据内线和外线的辩证法，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高度地统一起来，提出了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相结合的战略原则，二者相反相成，组成了战争过程中活生生的辩证法的运动。

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从形式上看是被动的。如果我们在战争的内容上，即组成战争全体的战役战斗上，也采取消极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那么，我们就会完全陷于被动局面，既不能大量歼灭与消耗敌人，又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势必在战役的长期消耗中为敌人所击败。土地革命战争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想争取在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被动的形式中贯注积极主动的内容。而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是执行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的最好的作战方针。只有执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才能更好地争取主动；只有执行持久中的速决，才能迅速地歼灭敌人，使其战役上无法持久待援，战略上无法速决抽身；只有执行防御中的进攻，以有效手段不断地大量歼灭敌人，补充和发展自己，才能使我从许多局部的优势中逐渐发展为全局的优势，使敌从许多局部劣势中逐渐变成为全局劣势。可见，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组成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是由局部到全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中的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是利用质量互变规律，从局部着手促进战争全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转化的正确有效的方法。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同志为实行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的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所提出的根本战法。他在谈到怎样才能战争中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时候指出：“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①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通过集中兵力，才有可能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化为我对敌的许多小“围剿”；把敌对我进行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化为我对敌进行战役战斗上的各个击破；把敌对我之战略上的优势和强者地位化为我对敌之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和强者地位。他强调指出：“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这一着。”^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充分而恰当地说明了集中兵力对于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③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④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如果我们在战略上没有“以一当十”和“以少胜多”的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8页。

③ 同上书，第209页。

④ 同上书，第211页。

气概，那么我们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而不能有所作为，更谈不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上不懂得集中兵力，不会运用“以十当一”和“以多胜少”的作战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取得具体战役战斗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因而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以少胜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也就谈不到去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①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上“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思想，是他提出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根本原则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关于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争取战略防御胜利的科学概括和生动表述。

集中兵力重要，但是怎样才能集中兵力呢？毛泽东同志认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①这里所说的战略头脑，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它的反面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其实践表现则是军事上的平均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两个拳头打人”等军事平均主义的错误原则，从而导致反“围剿”的失败，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深刻地体现了他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③的思想，是反对军事平均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不仅阐明了集中兵力的重要和如何集中兵力的问题，而且阐明了集中兵力和打歼灭战的关系。众所周知，主张打歼灭战，反对打击溃战，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说：“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208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①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反复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②接着又说：“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③由此可以看出，集中优势兵力和打歼灭战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集中优势兵力是打歼灭战的客观要求，是实施外线速决进攻战的首要条件；反过来说，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又是集中优势兵力的直接目的。

毛泽东同志强调集中兵力的重要，同时也承认一定条件下分散兵力的必要。他主张把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为游击战争所规定的作战方法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化整为零”，“分兵以发动群众”；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是“化零为整”，“集中以应付敌人。”在何种情况下集中兵力何种情况下分散兵力，是以集中兵力为主还是以分散兵力为主，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是，从革命战争的全过程来看，集中兵力则是主要的。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②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1页。

③ 同上书，第1142页。

第十二章 论道德哲学

毛泽东道德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伦理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等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于道德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作了科学的论述，形成了具有严整体系的毛泽东道德哲学思想，其中对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教育以及道德修养等问题的系统论述，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毛泽东道德哲学中，人生观和道德理想问题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们知道，人生观是关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对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不管他自觉与否，总是按照一定的人生观在思想和行动。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同，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不

同，态度不同，人生观也就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人生观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观。道德理想和人生观有密切的联系。道德理想研究做人的标准，说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观决定道德理想，道德理想体现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理想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个人生观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道德理想的意义。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指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并进而强调“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合此理想”。这里所说的“理想”，就是指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最理想的人格典范。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这种理想同社会利益联系起来，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牺牲个人利益以利社会”的革命人生原则和人格标准。在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科学论述。一九四四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一九四五年在讲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他又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4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8页。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一九五七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可以看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道德现象，总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道德理想或理想人格，也是在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关系中形成，并通过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道德理想或理想人格，主要是通过阶级关系，即通过阶级内部以及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当一个人正确地认识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并自觉地为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尽义务时，他才是一个具有正确的理想人格的人。他对这种利益认识得越深刻，为实现这种利益的努力越坚定，他的人格就越高尚，越鲜明。毛泽东同志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的道德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内涵，从而也就把道德理想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为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这样一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不是一个抽象理想，而是一个具体的、随处可以体现的做人标准了。

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吴玉章同志崇高的道德品质时，提出了关于道德品质或理想人格的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

① 《为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2—13页。

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把能否一贯为人民服务，坚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当作衡量一个人的人格是否高尚的标准，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样的道德理想。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革命者道德理想的化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的精辟概括，也是毛泽东道德哲学的核心和灵魂。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中地表达了毛泽东道德哲学的中心观点。毛泽东道德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学说，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共产主义道德是指从无产阶级的完整利益引申出来的、适应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以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集体主义为其根本原则的一种新型的社会道德体系。无产阶级的完整利益，从最终的意义来说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其他任何阶级的阶级利益所无法比拟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同样也是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道德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刘少奇同志讲得好：“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

① 《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载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

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①因此,能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便成为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其他一切道德的分水岭,也是是否实践毛泽东道德哲学思想的试金石。

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道德哲学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诸如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问题,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道德规范问题,用共产主义理想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以及逐步提高道德境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问题等等,都是围绕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展开的,都贯注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共产主义道德所提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都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联系,都是它在某一方面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道德哲学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里曾经提出“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思想^②。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阶级对抗十分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他们特别强调“道德始终是阶级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3—134页。

② 参看《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的道德”，指出无产阶级的道德要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指出：“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所以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列宁一方面重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强调“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另一方面又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指明共产主义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②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对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做出了新的科学概括。这一概括准确地表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阶级性，全面地表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民性，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的历史趋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归根到底就是为人民谋利益，那么，能不能说毛泽东道德哲学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呢？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做过回答。他说：“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

① 参看《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3、352、355页。

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道德哲学包括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但又不能归结为功利主义。毛泽东道德哲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功利主义，它有自己的、远比功利主义更能表现自己的本质的范畴。

二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 and 道德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关系决定道德呢，还是道德决定经济关系？如果是经济关系决定道德，那么道德对经济关系有没有反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如何认识道德的根源、本质、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从而也就引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和一切唯心主义的、旧唯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方面，是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方面，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标准、方向和方法。毛泽东同志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地肯定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又对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他着重论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去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①以后，他又多次讲过，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个“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也就是忠于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是斯大林于一九三四年提出来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②在这里，斯大林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着重说明了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如何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如何在解决集体利益中求得个人利益的满足等问题；而对于它们之间矛盾的一面则未加分析，对于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的内涵没有详细揭示。“集体主义”概念在毛泽东道德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对它的内涵曾经进行过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8页。

②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54—355页。

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①可以看出，集体主义作为一个道德原则，它的基本精神不在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时能够服从集体利益，而在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时也能够丝毫不勉强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的内涵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是不可能成为集体主义者的。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在毛泽东道德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其道德规范体系中基本的道德原则。所谓道德原则就是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的准则。它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要求的基本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它集中地反映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属性。因而，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它总是居于首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确定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应当从共产主义道德所反映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科学地回答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本阶级的和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同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原则划清界限。毛泽东道德哲学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9、130—131页。

认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首先必须体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一个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他自己。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的表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只有反映这一根本利益，把它作为衡量善恶的基础，才能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事业服务，才能成为最科学的、最先进的道德。其次，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必须正确解决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一方面，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基础的。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就不可能获得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整体利益中包含着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整体利益也不能脱离个人利益。集体是由个人构成的，没有个人也就没有集体。离开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所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也就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归根结底总是要保障劳动者个人的利益的。既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然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就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坚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充分注意满足正当的个人利益。因此，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从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根本要求出发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其他规范、范畴和道德关系的具体要求，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则派生出来的，都是它的补充和展开，都是它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道德哲学关于“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的论述，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划清了它同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哲学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哲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哲学，从剥削阶级的利益或狭

隘的小私有者的利益出发，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坚持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同“集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道德原则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要坚持和发扬集体主义原则，就必须批判个人主义原则。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经常提醒全党注意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在批评某些人所奉行的“个人第一主义”时指出：“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①刘少奇同志对某些党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讲到待遇、享受和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他总企图要超过别人，和待遇最高的人比较，‘孜孜以求之’，并且以此夸耀于人。但是，讲到工作，他就要和不如他的人比较。有吃苦的事，他设法避开。在危难的时候，他企图逃走。勤务员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但是，一切‘倒霉’的事情，总想是没有他。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相信这样的话：‘人不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9页。

为已，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如果有，那也是蠢才和傻瓜’。他甚至用一大套剥削阶级的话，来为他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辩护。”^①个人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为谋取和扩展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这种思想同党的事业是格格不入的，不批判这种思想，集体主义就不能抬头，革命事业就不能发展。

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并不是否认个人利益。相反地，它主张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把社会整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逐步满足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②。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一次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关心群众的个人利益列入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并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③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

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8—139页。

②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页。

个人三个方面”的原则。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①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针对国外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攻击我国“忽视个人利益”的观点，专门分析了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是充分地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的，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能抛开个人的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能离开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充分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正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的基础。”^②很清楚，毛泽东道德哲学从来也没有否定过个人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正确地对待个人利益，要把党在处理个人利益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同党所提倡的对待个人利益所应有的道德区别开来。

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政策。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就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

① 《论十大关系》，第8页。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第68页。

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发生矛盾，个人利益就应当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都应当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

三 尊重社会公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之际创刊的《新华月报》的扉页上，登载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同期《新华月报》还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①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毛泽东同志把“五爱”作为“国民公德”即“社会公德”加以提倡，并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规定尊重社会公德，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社会公德呢？人类的道德生活是极其复杂而多样的，反映这种社会现象的道德规范体系也就必然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交叉的规范结构。从纵的方面看，它包括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这里，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道德原则是统帅，决定着道德规范体系的性质和方

^① 《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10页。

向；道德规范是主体，表现了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道德范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补充和展开，充实着整个规范体系的内涵。从横的方面看，人们的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与此相适应，用以指导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也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公共生活规则。此外，道德还可以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所谓私德，一般是指在个人私生活中的行为以及个人的品德表现、生活习惯、作风等。所谓社会公德，是指关系到集体、组织、阶级、民族、国家以至整个社会的行为；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公德理解为基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关系而形成的某些最简单的道德规范。这是不准确的。这类最简单的道德规范应该按列宁的概括，把它称作“公共生活规则”^①。一般说来，公共生活规则，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一阶级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例如讲卫生、有礼貌、维护公共秩序等。马克思曾把这些人类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称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②，认为它赋有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防止威胁公共生活的各种捣乱行为的使命。很明显，公共生活规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主要内容并不包括在这些公共生活规则中，而是体现在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由一系列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组成的道德规范体系之中。它们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社会公德就是指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并由该社会占统治地位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1页。

②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5页。

的思想舆论加以支持的基本道德规范。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公德，是对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要求科学概括。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时期评价和判断我国公民道德行为的标准，而且就其基本精神和所包含的深刻含义来说，也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产生、形成和完善，同整个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完善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作为更加自觉、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既不是个别的行为本身，也不是日常的自发的行为惯例，而是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和概括。毛泽东同志在概括和提炼道德规范的过程中，首先注意解决了与此相关的基本理论。其一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基础问题。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既不能是主观随意的，也不能简单摹仿和移用别的时代和阶级的，而必须从客观实际的需要中引申出来。作为概括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因素主要包括：共产主义事业的完整利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生活经验等等。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就集中地反映了上述诸因素的根本内容，同时也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概括和提炼奠定了科学基础。

其二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标准问题。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道德规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665页。

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更应该既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的特点，又走在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前面，引导人们向更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前进。马克思说过：“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①同样，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着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面貌。人们的道德行为，并不是个人随意采取的行动，而是受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的。因此，从人们亿万次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引申出来，并表现于个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也就必然具有客观的内容。然而，道德规范作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一种评价善恶的标准，体现着一定社会和阶级对人们行为的共同要求。它高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一经形成便积极地按照一定社会和阶级的要求，指导着人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为。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新型的社会关系的概括，又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是多方面的，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准确而又全面地概括它，无疑地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五爱”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重大课题。同以往的道德哲学比较，毛泽东道德哲学对于道德规范的阐述，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些内容和特点，我们先简单说一下“五爱”的道德内涵。

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爱祖国”是人们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深爱之情在道德方面表现得极为强烈，其社会意识形态就是爱国主义。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人们对祖国的这种神圣感情是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联系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的，这种情况还将在人类历史上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总是要在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各种不同的斗争。所以，对祖国的态度如何，历来就成为衡量人们道德水平最基本的标准之一。人们用它评价个人的行为和社会道德状况，调整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从青年时期起就献身于中国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的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把自己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于人民的奴隶生活和祖国山河破碎的巨大悲愤，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那么在新中国，爱国主义就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我们祖国的国土、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热爱在我们国土上用劳动和战斗创造了伟大历史并继续创造着更伟大历史的人民。

“爱人民”是毛泽东道德哲学明确提出的一个具有特色的道德规范。把爱人民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

①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

依据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在概括社会公德时，要求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付诸实现，提倡“爱人民”的道德规范，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按照这个标准，爱人民，就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努力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爱人民，就要尊重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刘少奇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强调“民主精神”是爱人民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说：“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②

“爱劳动”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毛泽东同志把“爱劳动”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是以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在旧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获，对劳动采取厌恶、鄙视的态度，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使得人民群众“爱劳动”的品德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再是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社会同时也是为自己劳动，广大社会成员才可能而且也应该自觉地表现出对于劳动的热爱。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改造世界争取自由的武器，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手段。“爱科学”就是热爱社会文明，向往社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② 《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135、137页。

会进步。这一道德规范对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爱科学”作为我国公民所应遵循的行动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还是对广大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爱护公共财物”，它要求人们关心、珍惜和维护社会的公共财产，树立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爱护公共财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光荣传统，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对待社会财富上的具体表现。从表面上看，这一范畴似乎仅仅是人对物的关系，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但透过这种表面关系不难看出，它直接涉及到国家、社会、民族的整体利益，表现出人与人之间、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不仅具有一般的道德价值，而且突出地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五爱”，不仅有深刻的内涵，而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道德规范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的产物。这是毛泽东道德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具体说来，“五爱”作为道德规范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面性。“五爱”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中五个最重要的方面的道德关系，即个人同祖国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以及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劳动手段（科学）、劳动成果（公共财物）的关系。“五爱”的提出，使得广大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有了可供遵循的行动准则，同时也便于结合具体的道德生活引申出其他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在这以前，任何思想家或伦理学家都没有作出过这样全面的概括。

第二，完整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五爱”，作为道德规范是

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这五个方面中每一个方面都同其他方面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爱祖国”本身就包含着爱祖国的人民、爱祖国人民所从事的劳动以及这个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科学)和物质财富(公共财物)。每一个规范对于人们的行为的要求都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

第三,科学性。在众多的、内容十分丰富的道德规范中突出“五爱”,是有其科学依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由此出发,毛泽东道德哲学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并以这种道德理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五爱”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道德规范体系就其基础、指导思想、内容以及体系构成而论,都是科学的。

第四,民族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五爱”,既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的普遍真理,又反映了我国的具体实际,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五爱”鲜明,朴实,言简意赅,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的提出,对中国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一九八二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关于“五爱”的国民公德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向全国人民提出“爱社会主义”的要求。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原来“五爱”中的“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也把爱护公共财物作为爱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进去了。经过修改的“五爱”,是毛泽东道德哲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反映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道德方面对公民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 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革命的胜利和深入发展，必然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道德面貌焕然一新，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奏出凯歌。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迅速成长。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自发地出现的，而是长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结果。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道德虽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特别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遗产，但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体系来说，它同历史上任何道德体系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道德在本质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并且是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与此不同。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并且是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它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不能依靠历史的道德传统的感染自发地形成；相反地，它必须同旧的道德传统和习俗彻底决裂。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我们知道，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为了使人们履行某种道德义务，应当对人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道德教育是共产主义道德得以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道德教育具有这种意义，所以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特别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并以此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针。六十年代初，毛

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早在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论证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根据。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分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时，曾经透辟地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关系。他写道：“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这个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意见，对于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政治状况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关系，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应该把对人们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同现实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加以区别；另一方面，又应该扩大和加紧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如果缩小、放松或取消这种教育，就不能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精神条件，也不能从道德方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

毛泽东道德哲学不仅制定了“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的道德教育的方针，而且阐明了道德教育的主体问题，即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①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复强调，要启发，要教育，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要使之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常性的工作。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这是由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决定的。我们知道，人们的道德关系渗透于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思想文化的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人们的道德活动贯穿于社会的一切生活领域和实践领域。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征更加鲜明，作用更加巨大。另一方面，各个社会领域的各种关系和活动，又会反过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人们总是要从自己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所接触的各种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2页。

人物和事件中，加深和提高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认识，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感，确立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逐步养成自觉履行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规范的习惯。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组织和机关，以及广大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主体。只有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都一起行动起来，互相紧密配合，对社会成员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只有广大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既是接受外部道德影响的受教育者，又是对其他人产生道德影响的教育者，才能迅速地卓有成效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

基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这一基本思想，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活动。其中，六十年代开始的学习雷锋的活动成效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雷锋同志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党和人民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杰出代表。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形成。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一代的光辉榜样。邓小平同志在题词中写道：“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全国范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这样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在整个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道德哲学不仅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主体，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教育所应采取的方

法。道德教育应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强制的、压服的办法和行政命令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问题，要坚持疏导的方法。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引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讲究实效。要深入到群众中去，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耐心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所起的作用，历来十分重视共产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并把它作为整个社会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心。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思想，就包括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作风有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政治思想是作风的基础，作风是政治思想在人们实际行动中的表现，于是又有政治作风和思想作风。如果从总体上看，作风是一种习惯势力。优良作风具有积极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好比一个革命的熔炉，能把新的成员迅速地冶炼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使它的成员永葆优秀品质。一个党，一支部队，一个社会，有了优良作风，就可以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为榜样，互相监督，形成舆论，造成风尚。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好思想、好品质、好行为发扬起来，使坏思想、坏品质、坏行为受到抵制。不难看出，作风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或者说，作风也是一种道德。要搞好革命，搞好建设，就要有一个好的党风，好的军风，好的民风，归根到底是要有好的党风。实际上，共产主

义道德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而且最集中地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党风表现出来。在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党的优良作风中，已经包含着毛泽东道德哲学中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而整顿党的作风，也就包含着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并通过党风影响全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历史中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史中，正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①这里，毛泽东同志清楚地说明了党风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作用。通过整顿党风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毛泽东道德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党风，加强党内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他就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②决议还具体分析了党内存在着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及其来源和纠正的方法，并且强调了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党内教育问题”的意义：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0页。

②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3页。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①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讲到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的、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对于共产党员提出的各项要求，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风问题对于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的道德建设的意义也日益增大。这一方面由于我们党成了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风就成为新中国道德现象的集中代表。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我们的同志背上居功骄傲的包袱，沾染上剥削阶级的作风，从而背离共产主义道德的轨道。为此，必须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63页。

中全会的报告中及时地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①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提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②就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上，“遵守共产主义道德”被作为党员的义务写进党章。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特别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③

在毛泽东道德哲学中，党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教育者和领导者，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党的各级领导成员，必须首先成为具有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人。党的高级干部的一言一行，对于广大群众道德风尚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137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③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9页。

党的高级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成为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模范，就可以具体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共产主义道德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道德，应该怎样按照共产主义道德的精神来工作、斗争和生活，以及这样的道德行为具有何等重大的社会意义。共产党员在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还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他们的高尚行为中进一步认识党和信赖党。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道德教育的一项战略措施。

毛泽东同志关于以整顿党的作风为中心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思想，在当前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还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二大”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整顿党的作风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被纳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部署之中。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阐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时号召：“我们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②党风的根本好转，必定会促进社会道德面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①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64页。

②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27页。

五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毛泽东道德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不断地提高广大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道德境界，造就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实现这一目标，从道德实践的角度看，有两条相互作用的基本途径。一条是道德教育，即为了使人们履行某种道德义务，而对人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这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道德得以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从而能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再一条是道德修养，即道德品质、道德意识方面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毛泽东道德哲学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毛泽东同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①。这里所谈的改造，其中就包含着道德方面的自我修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道德修养问题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②。周恩来同志也很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他曾经指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是讲个人修养的最好规范。拿现代的话讲，忠于人，就是忠于团体，忠于阶级，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直到忠于人类。信于友，就是信于同类，信于同志。传习，就是勤于所学，勤于研究。一个人的反省功夫，能时时这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28页。

②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页。

样，而且做错了就改，不足的就加，那这个人的修养一定成功。”“反过来说，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末，这个人或这个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①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道德修养呢？根据毛泽东等同志的论述，大体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修养方法。一方面，要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的指导。朱德同志一九五三年七月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青年，才能使青年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使得青年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②另一方面，要密切结合革命实践和道德实践，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

其次，要把道德修养的重点放在贯彻共产主义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正确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道德修养是多方面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但是修养必须有重点，必须着重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① 《〈团结〉的旨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75、76页。

② 《青年的最主要任务是学习》，《朱德选集》，第311页。

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最后，要有“严以律己”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他专门订了七条“修养要则”，其中包括“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纠正自己的短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等等。周恩来同志的一生都贯彻了“严以律己”的精神，从而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

道德境界是一种复杂的道德意识现象。由于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其道德境界也不同。所谓道德境界，就是人们从一定的道德观念出发，在个人同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关系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觉悟水平、思想感情和精神情操。人的道德境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有稳定的一面，又有发展变化的趋向。毛泽东道德哲学主张以共产主义道德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使其逐步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

自私自利的境界，就是个人主义的境界，归根到底，从属于剥削阶级的道德体系。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早期，就把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作为从思想上建党、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关于个人主义”一节，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834页。

^②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8页。

具体地分析了个人主义倾向在红军党内的六种表现，即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和离队思想，并指出：“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①。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告诫全党：“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觉悟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浮浅的作风。”

“大公无私”的境界，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刘少奇同志指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么：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②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分子，应该逐步培养自己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白求恩时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② 参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1—133页。

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结合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强调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②他号召我们要大大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③他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

①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②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326—327页。

③ 同上书，第327页。

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①事实已经反复证明，遵照这样的要求去做，必将使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道德境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①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326—327页。

第十三章 论艺术哲学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系统地、精辟地阐明了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毛泽东艺术哲学有自己完整的理论形态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艺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文学艺术与生活关系问题是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艺术哲学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文学艺术与生活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艺术哲学看来，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源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毛泽东同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一基本原理来考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察文化、文艺现象，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现实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即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依赖关系。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是以社会生活为内容、为源泉的。文艺的源泉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针对着有些文艺家以为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文艺的源泉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 and 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③

由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工作者就应当根据实际生活进行创作。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④。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前提条件。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观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②③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察、体验、研究社会生活，是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理论素养。具备这种素养，无疑会提高文艺工作者艺术认识和艺术表现的能力。艺术认识决定艺术表现。没有艺术认识的新的发现，便不可能产生艺术表现的独创性。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艺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肤浅、平庸的文艺家写不出精湛的作品。文艺家的认识能力总是这样那样地规定着他的作品的面貌，决定着他的艺术表现的水平。为了提高文艺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深入生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观察事物的工具，通过艺术体验，洞察生活的底蕴，捕捉有意义的题材加以艺术呈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考察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提出了文艺的真实性原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强调文艺的“真实性”。他们提倡要真实地评述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系；反对“拉斐尔式”，提倡“伦勃朗式”；反对塑造头绕灵光圈，脚踏厚底靴的官场人物，维护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原则；批判欧仁·苏用思辨哲学的抽象原则抹杀文艺真实性的唯心主义创作意图和创作倾向；批判拉萨尔的《济金根》用主观虚构来歪曲历史真实的错误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感到，为了进一步说明文艺反映生活的程度，只强调文艺的真实性就显得不够了，而应当强调“典型性”。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们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和典型的概念相接近的论点。一八八八年，恩格斯明确指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从文艺的真实性上升为文艺的典型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和生活关系认识的发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展。

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时，并没有局限在文艺的真实性上。他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地运用于观察文学艺术，确立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他自觉地把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联系起来，从真实性上升为典型性。他在比较生活美和艺术美时指出，虽然生活美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毕竟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艺高于生活，是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和方法达到的。文艺家们对于生活的认识不是冷漠的摄录或机械的摹拟，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经过艺术的选择和提炼，使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所谓“更高”就高在“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后面的这五个“更”分别从不同角度概括地说明了艺术真实区别于生活真实的特点和优点。由于艺术真实是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和方法对生活真实进行加工和改造的产物，因此它比生活真实“更典型”。它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性提高为概括性和个别性结合程度更高的真实性，升华为典型化程度更高的真实性。

一般地说，艺术真实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艺术真实是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表现本质的真实。它舍弃了那些分散的零碎的现象,使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这个“集中性”和“普遍性”正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文艺创作通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展现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二,艺术真实是有倾向的真实。文艺创作的客体和主体都是有倾向的。从文艺作品描写的对象方面看,除自然现象外,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倾向。在被表现的人物和事件中都有或强或弱、或隐或现的政治思想属性。从创作主体方面看,文艺家是有倾向的,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必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因此,艺术创作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对描写对象和创作主体两方面的倾向加以集中、突出和强调,使艺术真实所具有的倾向“更强烈”。第三,艺术真实是有理想的真实。文艺家是有理想的。生活中的新事新人蕴藏着理想的因素,闪耀着理想的光彩。文艺家通过塑造正面形象,用肯定的方式表现一定的社会理想和艺术理想;又通过塑造反面形象,用否定的方式通过对丑恶事物的讽刺和批判,间接地表达一定的社会理想和艺术理想。因此,文艺创作通过典型化的方法,用肯定或否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把描写对象和创作主体两方面的理想因素加以集中、突出和强调,使艺术真实“更理想”。

总之,文艺以生活为源泉,这是文艺与生活关系中的唯物论;文艺又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这是文艺与生活关系中的辩证法。

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也探讨过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但他们往往把生活美和艺术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由于他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他

否认艺术美源于生活美，而主张艺术美高于生活美。黑格尔的观点辩证而不唯物。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但却从批判黑格尔的美的理念论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艺术非但不高于生活反而低于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过于拘泥生活，唯物而不辩证。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偏颇。有人主张通过文艺创作以求“自我表现”，有人提倡没有或缺乏理想的“写实文学”或“暴露文学”。前者表现出脱离生活的唯心主义倾向，后者表现出拘泥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所得出的文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科学结论，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种种片面性，而且科学地总结了文艺发展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二 人民大众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①以人民大众，首先是以工农兵，作为革命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为革命文艺规定的根本任务。他的这一论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实主义文艺应当以表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经过五十年的战斗历程，已经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新世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界创造者的姿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翁也要求走上文艺舞台。为了使先进的社会力量得到艺术的呈现，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①列宁也明确指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在阐明艺术的新的性质和崇高的社会作用时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却遭到统治阶级的掠夺，处于受屈辱被奴役的境地，不仅在政治上没地位，而且也被排斥在文艺舞台之外，或者成为被丑化被嘲弄的对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所指出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因此“这种历史的颠倒”需要“再颠倒过来”，使劳动群众“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一定时代的文化是和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上的统治者也必然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人。所以，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奴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② 转引自蔡特金著《回忆列宁》，第14—15页。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舞台上的主人分别是这三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的形象。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随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他们也必然要求以新生活主人翁的豪迈姿态登上文艺舞台，打破剥削阶级独霸文艺的一统天下。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一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明确指出：“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①。他强调指出，文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必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②。他号召文学家、艺术家们要满怀热情地去描写“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③。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对象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④这一论述是对于毛泽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

③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④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

东同志关于文艺必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思想在社会主義新时期的具体发挥和新的发展。它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不仅一直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状况，而且也时刻注视着他们在文艺舞台上的地位，肯定由于表现这支新的社会力量给文学艺术带来的革新。恩格斯曾以赞同的口气复述当时德国《文学总汇报》对小说创作新面貌的评价：“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翁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①。他还批评倍克的创作题材和主题只限于“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②。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思想”，和恩格斯提出的“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时代已经使充分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成为现实，给描绘新生活的主人翁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陈云同志在谈评弹艺术时指出：“要反映现实斗争”，要“反映新时代”。“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③只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才能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和革命

① 《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②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

③ 《对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的需要。一切进步的思想家和文艺家都应当认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从而准确地把握新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列宁曾经明确要求,革命者在观察、研究和表现社会生活时,应当首先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①。从生活的全局和发展趋势看,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主体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决定历史发展、推动时代前进的主要动力。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只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才能实现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只有新事物中才蕴含着新思想。文艺家尽管可以通过否定丑的方式来肯定美,但丑事物中并不包含着美。描写旧东西并不能从正面直接表现新思想;而只能透过文艺家的思想情感的折光,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揭露、讽刺和抨击,从反面间接地流露出来,因而是十分有限的。要从正面直接表现新思想,必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只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才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指出前进的方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和广大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因此能够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能够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提高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提高他们的政治远见、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同时,还要看到,只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才能使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人物更加多样化、深刻化,从而也就必然给文艺带来新的面貌,从艺术的内容和性质到艺术的表现方法和技巧等方面都会呈现出新的姿态。

^①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证了以人民大众，首先以工农兵作为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的必要性，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描写和服务的途径和方法：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创作客体和创作主体的关系，特别是解决好作家和群众的关系。从创作的客体方面看，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生活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那么，只有了解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活动，才能谈得上了解现实生活、社会环境、历史面貌和时代发展的趋势，进而把它们表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①。他指出，只有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我们的文艺才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②。从创作的主体方面看，毛泽东同志指出，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③。既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同时又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表现人民群众的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还强调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④为了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⑤，熟悉他们，并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唯有这样，才能产生文学家艺术家的愿望和群众的要求相一致、主观和客观

① 参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7页。

② 同上书，第809页。

③ 同上书，第831页。

④ 同上书，第821页。

⑤ 同上书，第833页。

相统一的文艺作品。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大众的文艺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①他还说：“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②

①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2—183页。

② 同上书，第183—184页。

三 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文艺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必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它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特定社会条件下群众生活的面貌，揭示时代的真理。同时，文艺又有它的倾向性。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的倾向性的成因和结构、社会主义新文艺倾向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认为艺术真实作为对生活真实的反映不仅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而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表现出“更强烈”的倾向性。那么，文艺作品中的倾向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毛泽东同志从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文艺的创作主体两个方面分析了文艺倾向的构成。首先，从文艺的描写对象方面看，除自然现象外，社会生活中的事件、事物和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的倾向。阶级社会中的现象往往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有倾向的存在。真实存在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现象中都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思想属性。倾向存在于事物中，事物中蕴藏着固有的倾向因素。阶级社会中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一方面是“路有冻死骨”。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并且到处都有倾向地存在着。艺术的作用就在于把这些人们看得很平淡的有政治色彩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把其中的倾向强烈化鲜明化，促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此外，社会生活中的事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物或现象还从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某种倾向。其中先进的新生的革命的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光明美好的前途，必然得到肯定；那些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事物必然被历史所淘汰。对于反动的社会势力的政治倾向必须加以批判和痛斥，“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①。其次，从文艺的创作主体方面看，文学家、艺术家也是有倾向的。他们在描写和表现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时，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抒发自己的爱憎，表达自己的好恶和褒贬。在文艺创作中，文学家、艺术家们的思想和倾向总会顽强地渗透出来，使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带有程度不同的倾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泽东同志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②。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鲜明的爱憎态度的文艺家在描写有利于人民的事物时必然表现出同情和赞扬，在刻画有害于人民的丑恶现象时必然疾恶如仇。

文艺的倾向性不是纯主观的。它不仅显示着文艺家主观方面的政治倾向，同时也反映着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属性。正是这种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属性构成了文艺倾向性的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文艺的倾向性应当是创作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属性和创作主体方面的政治观念融铸而成的生动和谐的统一体。文艺的倾向性不是凭空表现出来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主观方面的爱憎态度，应当服从于更深刻更强烈地揭示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属性，而不是削弱它，更不是歪曲它。必须防止或克服自觉不自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327页。

地用文学家、艺术家的主观倾向颠倒和改变对象的客观倾向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拉萨尔在悲剧《济金根》中用作者的思想歪曲历史真实的卑劣行径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拉萨尔正是从自己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出发，把垂死阶级的代表——没落骑士济金根描绘成全民的救主，打扮成铲除封建割据、实现德国统一的民族英雄。由于政治倾向的错误和世界观的局限，反动的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自己写成神圣，光明和黑暗在他们那里是颠倒的。反动的文艺家总是用他们自己的反动政治观点抹杀描写对象自身的进步的政治本质，从而使作品具有反动的政治倾向。

没有倾向的作品是不存在的。以自然景物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不是没有倾向，只不过是表现得比较隐蔽和复杂，需要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反映社会现象的作品尽管表现和流露倾向的方式和程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总归会有某种倾向。不应当被文艺家们某些抽象的声明和作品中某些假象所蒙蔽，而看不出“超阶级艺术”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倾向。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在实际上却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可见，“超阶级”的言论和理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党性的虚伪性的表现，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文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倾向的遮羞布罢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①

无产阶级的文艺跟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不同，它的倾向性同真实性并不处于绝对对立之中，而是统一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呢？

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解决作家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

①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20页。

实现文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统一的关键。他说：“革命的政治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是极其深刻的。既然文艺作品是由作家创造的，既然文艺作品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作为描写和服务的中心对象，那么文艺家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倾向能不能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相符合，便成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是否统一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文艺家实际上都在扮演着“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的角色，“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为了“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必须“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唯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思想 and 倾向变成自己的思想和倾向，进而化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和倾向；既反映了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真实，又表现了真实存在着的群众的肯定和否定的倾向。

其次，为了实现文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文艺家必须认真地改造世界观。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能摆正并处理好文艺家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②。文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② 同上书，第813页。

艺工作者应当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与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善于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四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文艺批评是文艺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批评应该发展”^①。他还进一步指出：“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②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对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文艺创作必然引起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又必然反过来影响文艺创作。文艺创作需要文艺批评的帮助和指导。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还明确指出了文艺批评的目的和方法。我们应该容许各种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既不当禁止文艺的自由竞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825—826页。

争，也不要使这种自由竞争成为自由泛滥。为此，必须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各种文艺作品以正确的评论或批判，目的是为了促进文艺的进步、发展和繁荣。

那么，“艺术科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①“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③“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④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明确地规定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同时又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对于政治和艺术的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毛泽东艺术哲学关于文艺批评的科学理论。

为什么说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呢？只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③④ 同上书，第826页。

要我们注意考察一下阶级社会里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便不难发现，任何一个阶级都是从本阶级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首先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文艺的，都是着重考虑作品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因此可以说，任何阶级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一样，也有自己的功利主义，也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也总是首先从政治上来评价文艺作品，也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同志认为，革命的文艺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政治斗争。文艺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它们被同一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为同一的经济基础服务。然而，上层建筑的各种形式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地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对上层建筑中的其他部分发生重大的影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政治的这种特殊地位。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当然也是被经济基础决定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然而由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要求往往经过政治集中地表现出来，所以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往往表现为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服务。政治不是抽象的，具体地说，是指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即必须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和他倡导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必然为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也只有为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①。他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①的政治。

应当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是在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时代提出来的，这一口号对加强文艺同革命事业的联系，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个口号却被用来作为粗暴地干涉文艺的理论根据，影响了文艺的发展。随着历史条件和政治关系的变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当做出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概括，应当有所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提法，不仅扩大了文艺服务的范围，而且在理论上更加科学和准确。在谈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②从理论上看，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是有缺陷的，它不能完整地科学地表述文艺的功能。从实践上看，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建国以来长期影响着文艺的发展，造成文艺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因此，这个口号不应再提。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脱离政治的文艺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也不是我们建设以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②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20页。

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从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对于政治以及文艺不能脱离政治都不能做狭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邓小平同志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①，可见，政治绝不仅限于阶级斗争。文艺不脱离政治，也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②。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应当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处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反对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或多元论”，主张文艺与政治的统一论；既反对脱离政治去谈论艺术，也不赞成避开艺术去谈论政治。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③一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忽视、排斥乃至否定政治孤立地崇尚艺术的倾向，坚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是首先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文艺问题的。一般地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④“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⑤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但由于其内容反动，尽管带有一定的艺术性，无产阶级也应该在政治上予以排斥，防止这些有毒的作品污染社会，腐蚀群众的灵魂。当然，对于有害的文艺加以必要的限

①②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20页。

③④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26页。

制，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借鉴其中的艺术成就。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的文艺，往往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无产阶级对待这些文艺作品，必须加以鉴别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反对忽视、贬低、排斥艺术孤立地强调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导致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模式化，或图解政策，或演绎概念，或注释标语口号，或寻找一定的材料为既定的主题作证。这当然只能产生低劣的文艺作品。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文艺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总括以上观点，毛泽东同志做出结论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

五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为了使文学家、艺术家们更富有时代特点地反映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生活，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不久，在一九四二年，他又说：“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到一九五八年，他更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②。周恩来同志在讲到这一问题时也强调：社会主义的文艺“既要浪漫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② 转引自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

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他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中说：“既要有理想，又要结合现实。没有理想的文艺作品，干巴巴的，和照像一样。况且照像也还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理想，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化、高化。”

毛泽东同志辩证地综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艺术经验和艺术特征，批判地继承了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历史成果，吸收了前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艺术家们关于创作方法的科学论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变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热心提倡现实主义，但从来也没有忽视浪漫主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①。恩格斯提出了未来艺术的理想，希望无产阶级的文艺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②。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看到了从新的社会土壤中所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和新人物。他认为，为了更富有时代特点地表现新时代，讴歌新生活的主人在开创新事业的劳动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豪迈气概和伟大理想，文艺创作必须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他说：“现代生活完全合理地要求作家、艺术家一方面不要闭眼不看反面现象，另一方面却要强调指出正面的现象，从而把它们‘浪漫主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4页。

②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义化’。……善于站在现实之上，……创造出合乎愿望的很好的东西来”^①，力图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升到现实以上”，并尽可能地创造出“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②。高尔基主张作家“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③，必须置身在“从将来观点看现在”的“观察点”上俯视生活的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趋势。高尔基认为，新的创作方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只有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事实作基础才能创立起来”^④；因为“光荣、荣耀和英勇豪迈”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创造的事实”^⑤，必然促使文艺从内容到方法发生新的变革。为了更恰当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高尔基主张无产阶级所使用的创作方法“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⑥。他认为“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写英雄的现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谈论它的第三种东西。”^⑦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高尔基关于创作方法的意见是一致的，是在总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所做出的科学结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产生有坚实的现实生活的依据。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豪迈的事业和

① 《给费·华·革拉特珂夫》，《文学书简》（下），第50—51页。

② 《我们的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409页。

③ 《论剧本》，《文学论文选》，第254页。

④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第271页。

⑤ 《和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第301页。

⑥ 《给华·伊·阿努钦》，《文学书简》（上），第448页。

⑦ 《论文学及其他》，《文学论文选》，第113页。

开创新生活的英雄业绩，为这种创作方法提供了深厚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的客体和文艺创作的主体这两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文艺创作的客体方面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广大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普遍地得到提高和改善。他们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增强艺术的理想的色调和浪漫主义的气氛提供了生活的底色。新生活中的新事物、新人物、新风尚蕴藏着并昭示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预示着我们光明的未来。生活中的这些理想的因素、成分和萌芽，必然要求在文艺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和表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正是要在冷静地描写现实的基础上，将生活中蕴含着的具有光明前途和无限生命力的因素加以挖掘、强调和突出，着重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从文艺创作的主体方面看，文艺工作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努力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与时代声息相通。文学家、艺术家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他们不是以冷漠的眼光去看待现实，而是带着热情和向往注视着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能够体现人民意愿和理想的新事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是观察世界的伟大工具。艺术家们凭借这架望远镜和显微镜，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扩大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作品，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展示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以激励和鼓舞广大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可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产生和出现，不仅以新时代的生活为基础，而且以新时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条件。这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出现，是新时代的生活内容和文学家、艺术家的主观要

求的交互作用所引起的艺术变革，因此是历史之必然。

认识和处理现实和理想的关系，是把握和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关键。“源于生活”并不是拘泥于现实，而应当力图挖掘出蕴藏于现实中的理想的因素，经过艺术的提炼和概括，加以集中、突出和强调，使之“更典型，更理想”，从而“高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不是超越现实超越历史，它必须具有生活的依据，符合一定时代和历史所能认可的分寸感。“非理想”的现实化和超现实的“理想化”都是违反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的。

周恩来同志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中说得好：“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他既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世界革命理想。这样才能够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有了这样的气魄，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又强调“理想要有科学根据，不是乌托邦。既要有科学根据，又要艺术化”。总之，理想必须有现实生活的依据，而不能是虚妄的幻想。斯大林曾经指出：“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①文艺工作者也是如此。他们不能凭空创造出在生活中连一点因素也不存在的理想。他们只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生活中的希望之光，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未来事物的萌芽加以展开、突出和强调，赋予新人形象以理想的光辉，使之高于

①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4—105页。

生活中的人物，但又不是超越现实超越历史的乌托邦。文艺工作者应当努力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通过塑造富有时代感的新人形象，集中表达亿万人民群众的意愿，展现他们对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预示美好的前途和光明的未来，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不息。

六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不是照镜子式的，而是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改造制作过的。因此，人们由于实践地位、立场、观点、方法、认识能力等等方面的不同，对于同一对象也会形成不同的反映。文艺作品表现现实生活时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是很自然的。如何处理各种风格和流派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文艺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正确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正是处理这种矛盾的正确方针。

为什么要对文学艺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只能“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因此，只有实行“双百方针”才有利于艺术上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6页。

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他说,精神世界中的问题,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人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压制新生的力量和合理的意见,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实行“双百方针”能够使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有人担心实行“双百方针”是不是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①多年来的实践从多方面充分证明了采取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当这一方针遭到践踏时,我国的文艺便死气沉沉。十年动乱期间,“双百方针”有名无实,文苑内百花凋零,一片荒芜破败的景象。凡是这一方针得到认真切实地贯彻和执行时,我国的文艺便得到发展和繁荣。如在“双百方针”发表的初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文艺的百花园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机勃勃。

为了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当把贯彻“双百方针”同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结合起来。文艺是有党性的。文艺的党性和创作的个性是辩证的统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40页。

强调创作的不同的个性、风格和流派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独特的专长，调动一切创作的积极性，以更加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更有效地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列宁不仅指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时还从文艺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的特点着眼，提倡“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做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和“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是调动和发挥文艺创作积极性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才能使文艺对革命事业起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离开“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宗旨，谈“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至少会使文艺的社会意义受到局限，甚至会冲淡乃至取消文艺的社会职能。如果把两者割裂并对立起来，或提倡文艺党性以反对创作个性为条件，或强调创作个性以排斥文艺党性为前提，都势必会使文艺党性和创作个性同样受到损害。强调文艺党性是为了在更高水平上，提高创作个性的自觉性，而不是束缚它、抹杀它；提倡创作个性是为了尊重文艺家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规律和特点从而更有效地加强文艺的党性，而不是削弱它、取消它。必须防止和克服对文艺党性和创作个性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

其次，应当把提倡文艺的风格、流派的多样性同坚持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统一起来。贯彻“双百方针”是为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然而，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寓于文艺的多样性之中，并通过文艺作品的题材、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648页。

人物、风格、形式和创作个性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离开多样性的一致性 is 空洞的，离开一致性的多样性是盲目的。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的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和创作个性方面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应当教育引导文艺工作者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挥笔作战；另一方面还应当热心地提倡文艺的题材、人物、风格、形式和创作个性的多样化，以便开辟各种途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扩大政治方向的一致性所影响的范围，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当然，这个“一致”是指政治方向上的共同目标，而不是指花色品种上的“单一”或“唯一”。这好比一座花园，如果只有一两种花木，那么势必会使整体上的“一致”流于刻板、单调和乏味；而只有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才能显现出一派生机，显示出这座花园丰富的意韵与整体上的协调一致。

再次，应当注意在文艺的描写对象上保证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从创作的全局和发展趋势看，应当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描写和服务的主要对象。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主体”。不着重表现这个人民的“主体”，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至少是不充分的。如果自觉不自觉地离开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这个广大的范围，一味倡导和追求“小圈子”里的“多样化”，再“多”也还是少；忽视乃至排斥表现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前进的力量，有可能导致从“多样化”走向“少样化”。为了确保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在文艺百花园中占据与“主体”相称的地位，必须从整体上对文艺创作的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和疏导。我们需要那些平凡中寓着伟大、朴素中现出光彩

的深厚、隽永的作品，为此就应当去表现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比较重大的题材，从而使创作和作品具有宏大的生活和思想的容量，富有强烈而又鲜明的时代感。

最后，应当注意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在实行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为作家们观察、提炼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掌握马克思主义，能够使文艺工作者跟人民的生活保持血肉联系，使文艺家的思想如清新的泉水，喷涌倾泻，奔流不息。因此，吸引、启发、指导文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生活，表达人民的意愿和心声，端正文艺创作的思想路线，是实现党对文艺的思想领导的重要途径。

发展文艺不仅要正确处理各种文艺流派之间的关系，还要正确处理同文艺遗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明了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他一方面指出，古代和国外的文艺遗产是流而不是源，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家、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仅要重视现实生活这个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也不应忽视文艺遗产这个流。他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①在对待文艺遗产的问题上，复古主义、全面肯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列宁说过：“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②。无产阶级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是对过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的成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①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批判和继承的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在于从文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要求出发，把这一问题同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首先，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继承的基本标准和原则。他指出：无产阶级对过去的文艺作品应当“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②。他还通过形象比喻，把这一道理生动地加以说明：“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③。

其次，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了批判继承的目的。他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④毛泽东同志自觉地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根据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批判继承旧文艺，创建革命的

① 《〈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30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新文艺。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批判和继承必须适应中华民族的特点。中国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色调，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的文艺源远流长。铄耀古今的艺术珍品，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定的生活情调，焕发着中华民族的特色异彩。严格地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没有特点的事物，也没有不烙有民族印记的文艺。民族文艺的发展不应当使民族特点褪色，而应当使民族特色更加浓烈。只有适合民族特点、符合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的作品，才能更有效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同时以昭示中华民族特点的新文艺，独树一帜，屹立于世界文艺之林。因此，毛泽东同志主张对旧文艺的批判继承要服务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要“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为了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中外优秀的或有益的文艺遗产。鲁迅曾经指出批判、继承和革新的两条路子：“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②不论“采用外国的良规”，还是“择取中国的遗产”，都是为了创造。

在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问题上，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既反对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也反对兼收并蓄、全盘肯定。一方面，要尽力借鉴中外优秀的文艺遗产。毛泽东同志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② 《〈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53页。

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所以，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批判和借鉴时防止或克服兼收并蓄、全盘肯定的片面性。对古人和外国人进行“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②。

可见，非古排外的愚昧的虚无主义和拟古媚外的卑下的奴隶主义态度都是我们所不取的。虚无主义、排外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对历史上的文艺遗产的无知。它不了解人类文化的辉煌的成果；看不到现今的文学艺术正是以人类过去的一定的文艺和思想材料为基础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明了当代的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也是由各地域各民族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彼此融会而成的。以往的文化是先辈们辛劳和智慧的经验。我们必须通过鉴别和分析，摈弃那些没有用的和有害的东西，借鉴和吸取那些有价值的成果，以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和新文艺。因此，不应当割断历史，而要给那些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和进步作用的文化和文艺遗产以一定的地位，并注意分析它们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区别其益和害，认清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恰当的取舍，以便“推陈出新”，满足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需要。既不求古人，割断历史，又要突破传统，古为今用；既要吸收文艺遗产中一切进步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和成分，又要抛弃和剔除一切和新的现实相抵触的旧的思想观念和陈规陋习，为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的新文艺服务。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颂古非今和崇洋媚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不能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文艺遗产。复古主义者和崇洋媚外的人不了解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艺遗产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生活在当时当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按照他们当时的需要和意愿创造出来的。古人或剥削阶级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即使是精华的部分之中也是既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因素，又有消极的落后的思想因素。因此，对古人和洋人的精神遗产不加鉴别和分析，兼收并蓄，全盘继承，是一种复古和倒退的行为。拟古崇洋的人们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是不断除旧布新，打开生活的新局面的。文艺遗产再好，也只不过是流，它已失去了时代感，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文艺作为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总要从新的现实生活的源泉中吸取文艺的精英，描绘出新的社会形态的画面，创造出具有新的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作品。这是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唯有这样，才能使新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充分地鲜明地表现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文艺教育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职能。

第十四章 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优良传统，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了思想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一整套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世界观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而且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实现这一任务，改进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思想方法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思想方法问题属于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是密切联系着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们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叫世界观，用这样的看法去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是思想方法。可见，思想方法是关于人们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一般方法的学问和理论。世界

观决定着思想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没有脱离世界观而单独存在的思想方法。人们的世界观又总是通过观察和思考各种具体问题时所持的态度、所采取的方法表现出来的；没有不表现为思想方法的世界观，单纯的世界观也是不存在的。世界观表现为思想方法，思想方法体现着世界观。古今中外的任何哲学，不管它对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实际上都是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也是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统一体，而且是自觉地坚持这个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统一，在强调它的世界观意义的同时，也十分突出地强调它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统一体。列宁明确地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②

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光荣传统，并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阐发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① 《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哲学的思想方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二年进行的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基本的一环。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学风问题时明确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可见，整风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整顿思想方法的运动。

为什么说思想方法问题同整个学风问题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首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直接影响着能否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革命斗争的“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②。它交给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是供研究使用的“方法”，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在于掌握它的方法。所谓掌握方法，就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掌握它的思想方法；就是要拿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1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

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知道，无论革命还是建设，世界上都从来没有统一的现成的“模式”。任何一个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任何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从他面对着的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它的规律，找出处理和解决的办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研究广泛的现实生活和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对各项具体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在对待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待各项具体工作问题上，思想方法是否对路，不仅直接关系到革命能否成功，工作能否做好，而且还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不对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教条主义者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在谈到如何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②；要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坚持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①，改造中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其次，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直接影响着我们党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团结和统一。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面对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它要推翻整个的旧社会，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只有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就要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正确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而在思想方法上的一致又是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持组织上的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是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武装全党，使党能够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从而排除万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反对本本主义》是我们党内第一部专门讲思想方法问题的著作。书中所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以及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所讲的“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都促进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上的统一。经过从思想方法上对教条主义的清算，特别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全党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从而导致了党的七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解放后，为了团结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一次特别强调了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2页。

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一九五八年出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思想方法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在纠正这个时期的错误时，毛泽东同志也是首先抓思想方法这个关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组信件和批语》（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月）以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中都着重讲了端正思想方法的问题，重印《反对本本主义》，组织调查研究等等也都贯穿着这一精神。由此又促进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并促进了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党团结统一，兴旺发达。国家安定团结，蒸蒸日上。这种局面的出现，关键就在于党的思想方法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如果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两个凡是”的错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批判，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会抬头，也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最后，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直接影响着能否找到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件大事。所谓认识世界就是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到唯物辩证法这个唯一的科学思想方法中寻找方法；因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武装自己是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不懂得或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党，不可能对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正确的认识，不可能引导本国的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回顾我党的历史，正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使我党的领导从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进而逐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武装了全党，使我党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科学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它是世界观，同时也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的思想方法。它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作为思想方法，要求人们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问题，反对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它以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为自己的总特点，而摈弃孤立的和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

把唯物辩证法这一世界观化为思想方法，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们说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并不是说世界观直接地、现成地就是思想方法；而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运用于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把唯物辩证法化为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思想方法的过程，也就是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唯物辩证法才能化为思想方法，才能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学习和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问题，他说：“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①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讲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②。相反地，“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③思想方法虽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但它也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才能加以掌握和运用。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最科学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本性上是一致的，它们的结合是必然的。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可能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也是一个用唯物辩证法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克服错误的观点和方法。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反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辩证的思想方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4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5页。

③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法就不能在我们头脑中扎根。

二 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

一个党不但要善于提出既符合共产主义总目标又切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工作任务，而且还要找到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工作方法问题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尖锐地指出，工作方法的问题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注意工作方法。之后，又多次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①

回顾我党的历史，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所取得的胜利，无一不是跟在提出正确任务的同时又正确地解决了工作方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胜利地完成领导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尖锐地提出了工作方法问题，批评了那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表扬了兴国等县的同志们关于同时解决“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的经验，说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称他们为“模范工作者”。这种“第一等的工作”对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反“围剿”的胜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头，革命的任务业已确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全党面前，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关于健全党委

^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指导了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全国解放之后，特别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不要四面出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中，对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法作了阐述，还多次就具体的工作方法作过精辟的总结和说明。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着血肉的联系，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独特而精彩的部分，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工作方法指的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也就是领导方法。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看，它的整个工作方法也可以说就是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思想方法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它决定着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体现着思想方法。在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表里的。

共产党人对世界的改造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要提出改造的任务，而且要提出如何改造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对方法的重要性以及任务和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曾经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作了深刻而通俗的说明。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

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作方法对于完成工作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是完成任务的保证。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是空话，是瞎说。只提出工作任务，不解决工作方法，是革命空谈家的作风。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实际的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科学的工作方法应当是适合任务要求的，适合具体工作对象的，按照具体的环境、群众的具体情况去说服群众的工作方法。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如果“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②，即使是正确的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至少是要打折扣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艺术和领导艺术，要不得一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东西。

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斗争是在正确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正确的认识又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才能进行。因此，我们讲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法。其实质就在于以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为指导，采取符合实际的方法，集中群众的智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去正确地改造世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区分工作方法科学与否的标准。

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种运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种运用具有综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统一的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126页。

②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

整体。它的每个原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都互相补充，互相说明；不能设想那一部分具有绝对独立的意义。因此，在将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时候也必然是一种综合性的运用。尽管在某一场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原理运用得比较集中突出，但绝不可能简单地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法完全归结为某一个原理的单纯的运用。我们知道，群众路线的方法就综合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是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就是群众的事业，当然要依靠发扬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去夺取胜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所讲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是一致的。同时，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辩证运动的秩序，以及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可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群众路线，综合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精神。

其次，这种运用具有具体现实性。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直接套在实际工作中，而是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的联系或转化。这一转化凝结着理论上的创造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里边包括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对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的哲学升华，以及对人民群众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提炼等等。只有经过这些步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现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桥梁。在实际工作中我

们可以看到,任何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但又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有理论有生活的具体的现实的运用。例如,调查研究的方法中就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道理。我们做工作,必须使主观符合客观;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调查研究。调查要做到周密、系统而正确,就必须眼睛向下,深入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融于具体、现实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之中;调查研究又以其具体的现实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这就使哲学超出了理论论述的范围,走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活动,走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同党和群众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可以说,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最后,这种运用具有丰富多样性。现实生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画面,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我党的工作,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不同的方面,工作对象有国际上不同的国家和国内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工作性质也有不同的类型等等。相应地,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带有各种不同的特点。现实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改造的进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会发生变化,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会不断地创造出许多新的更有成效的方法。即使是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会在实践中有所发展。那种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固定地采取某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或者把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机械地套用，都是不对的。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样的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诸如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两分法，解剖麻雀，典型示范，弹钢琴，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抓两头带中间，对比（评比竞赛、参观、展览、算账），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胸中有数，划清两种界限，留有余地，互通情报，出安民告示，多谋善断等等，对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还会创造出更多的适合新情况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方法的使用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在丰富、多样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中，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两分法等等是基本的方法，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的。尽管具体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都贯穿着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正确处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条是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我们提倡的是符合这两条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三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既是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又是一种具体的方法。

作为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指的是把一般的普遍号召和个别的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用的”；“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①。采用了这种方法，工作就有成绩；不采用这种方法，工作就无成绩。这种方法也是工作者和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凡采用此种方法，就会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的任务相互结合起来，把领导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已经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群众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充实。毛泽东同志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②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应当是贯穿整个工作过程始终的方法。路线、方针和政策属于一般的东西。它的制定必须是在深入实践，解剖麻雀，从个性中找到共性之后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具体地分析了河北省三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② 同上书，第852页。

户贫农坚持搞合作社的事例。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搞清楚几个合作社，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把这叫做解剖麻雀。他说，要了解麻雀的机体构造，解剖一只或几只就可以了；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在用一般的东西去号召群众时，领导人员又必须深入下去，对具体情况（个别）进行研究，检验一般号召，并用自己取得的第一手材料对一般号召加以修改、充实。这样做反过来会有利于指导全面工作，有利于一般号召的落实，也有利于制定出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在一定的时间内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盘工作。这都是为了贯彻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好的领导就是善于实行这种方法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一贯努力倡导和推广这种方法。他说：“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任何工作都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②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适用于一切工作，之所以成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它以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和人类认识事物的正常秩序为基础。做到一般和个别相

①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结合，也就解决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也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其他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由矛盾组成的。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矛盾。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解决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工作可做了。矛盾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在宇宙间，普遍性的东西和特殊性的东西是相互联结的，它们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成为特殊性的东西；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变成普遍性的东西。就每一个事物来说，其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也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了普遍性。所谓做工作，就是去解决矛盾。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要把事情办好，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不行的。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必须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发现事物中所包含着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发现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结。只有这样才能对事物作出中肯的分析，作出恰当的处置。科学的方法是辩证的方法；而辩证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就是分析事物矛盾的方法，就是抓住矛盾的普遍性（一般）和特殊性（个别）这个矛盾问题的精髓进行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都是体现了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辩证方法。因此也可以说，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精髓。

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和人类正常的认识秩序，和人们认识发展的规律相适应的。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是个别（特殊）和

一般(普遍)相互联结、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类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开始,首先认识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尔后再进一步做出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达到一般的(普遍的)认识。当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再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对尚未研究过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个别(特殊)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使一般(普遍)不致于成为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人们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特殊本质,才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从个别中把握一般,从特殊中认识普遍。而在认识了普遍,把握了一般之后,还必须继续深入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或者新出现的具体事物。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以及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认识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发展的无限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是两个相互联结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的深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所贯彻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的这个秩序。一般的号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反映着对于同一类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而它的基础是对个别具体事物特殊本质的认识;否则,就不具有“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普遍号召作用,不可能具有指导一般的效力。然而,工作又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不能只限于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使一般号召得以落实,路线、方针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和政策得以贯彻，还需要到具体单位去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新经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一般的号召受到检验，得到丰富发展，并形成新的一般指示；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化为具体的群众的活动。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都是体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人类认识正常秩序的方法。

能否做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衡量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科学与否的一个标准。我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解剖麻雀、典型试验、弹钢琴、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对比等等方法，无一不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表述和体现了一般和个别的结合。例如，调查研究当然是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并不是要求对调查的对象全都一一调查一遍。事实上，这常常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必要的。科学的调查方法，应该是典型调查。这是基础的一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①这就是说，搞好调查工作同样要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要挑选最能表现特点的具体事物，进行深入的具体的调查，从中概括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再在这种共同本质的指导下，去做典型的具体事物的调查。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成堆，应兴应改之事头绪纷繁。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采取了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的方法，而这也正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拿经济工作方面的改革来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以拨乱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反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一般号召的同时，首先抓住农业这个具体事物，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放宽了政策，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业面貌很快地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农业状况的改善，党取得了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对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促进了全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形势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一般”更加丰富了、发展了，也更加具有号召和动员群众的作用。在农村进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采用的同样是普遍号召、典型示范、在实践中探索、逐步统一认识的方法，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使这场规模宏大、意义深刻的改革进行得极为顺利、健康，效果十分明显。在今后的全面改革中，同样也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普遍号召，经过试验，分期分批，循序渐进。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之所以错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违反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懂得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也不懂得人们认识的正常秩序。他们把一般当作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头脑里固有的，不知道它是从对具体事物的特殊性的认识中概括出来的，从而把它当作枯槁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发展的。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①，因此，在革命斗争中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迷信外国的经验，使革命遭到严重损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人，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而使一般的号召停留在嘴上、纸上或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会议上，甚至主观地发表意见，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合实际的空谈，成为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工作做不好，领导无成绩，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能得到贯彻。我们必须坚决抛弃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广泛地深入地提倡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四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问题中的另外一个原则问题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唯一正确的解决应当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切工作中，“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样，既是具体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原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这就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个单位的工作，要完成任务，达到目的，不仅要注意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而且还必须注意使领导核心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要在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以单位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通过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团结和联系广大群众，使少数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上下级之间也有一个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级领导机关向下传达和布置工作任务时，都应当通过有关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实行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更多的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既克服干部不足的缺点，又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另一层意思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思想作了如下的说明：“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②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乃是由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同志把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誉之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战争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② 同上书，第854页。

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这样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反复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只有靠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③。可见，要想取得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的成功，乃至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的领导工作，就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这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出发点和归宿。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从全局、整体而言，它表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某项工作或某个单位来说，它表现为领导者、组织者、骨干和群众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乃是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志。

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关系各异，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也有高有低，所以，“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④。因此，开展工作时，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积极分子作为骨干，去联系广大的群众，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领导骨干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是群众公认的。领导者的责任是要善于发现、选择那些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领导骨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② 《论十大关系》，第1页。

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9页。

④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83页。

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①领导骨干的作用是起带头作用，桥梁作用，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组织、领导作用。这种作用是群众积极性的集中表现，但又不能代替群众的积极性。而群众觉悟的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都不是自发的，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更是如此。它需要有力的领导骨干去组织，以保证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除了组织上的结合之外，主要的表现为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实践的结合。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正确政策的制定必须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情绪，集中群众的智慧。只有这样，在贯彻执行的时候，人民群众才会跟我们，才有可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的过程，都应当体现领导和群众的结合。可见，实现领导和群众结合的正确方式应当是领导先向群众学习，形成正确的政策，然后，让政策和广大群众见面，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掌握党的政策，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个学习和指导的结合，应当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始终。

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之所以错误，主要就在于它脱离群众，割断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了领导和群众的结合，或者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或者超过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犯了命令主义；或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者落后于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忘记了组织、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害了慢性病，犯了尾巴主义。毛泽东同志对这种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所体现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正确的认识、意见、政策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并且要在社会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发展。而社会实践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因此，实际工作中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认识论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任何领导的正确认识、正确领导，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群众的实践活动。群众的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群众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群众的认识、意见，虽然是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但却是最生动的、最丰富的，是基础的东西。如果把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比作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的话，那么它的原料或半成品就是群众的认识和意见。脱离群众、割裂了与群众联系的领导，是断然不会产生正确的认识，实行正确的领导的。在实际工作中，正确的领导，必须是面向基层、深入群众的实践，把从群众那里学得的东西进行加工制作，形成自己的意见，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政策。然而，这时的主观是否反映了客观，政策是否正确，还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因此，还需要再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把政策化为群众的行动，在实行政策的同时也检验政策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吸收群众所创造的新鲜经验，概括总结尚未研究过的和新出现的事物的特点，使认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然后，再

①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把这种丰富发展了的新认识，到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表现的是实际工作过程中领导和群众的正确关系，但同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认识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详细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之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互通情报，出安民告示，多谋善断，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采取的两个基本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方法不是被单独使用的，而是一起被使用于同一过程之中。这两个方法之间虽然有些区别，但也有着内在的联系。领导和群众的结合是以一般和个别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而一般和个别的结合在工作中又表现为领导和群众的结合。“群众——领导——群众”和“个别——一般——个别”是一致的，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它们把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统一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之中了。我党和我国人民群众创造出了许多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它们都是从这两个基本的方法或基本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在今后广阔而复杂的实际斗争中，只要认真贯彻这两个基本的方法和原则，我们就会创造出更为丰富多采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新的内容。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后 记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的一项光荣义务。这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是我们学习的初步体会，很不成熟。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把它献给读者，以表示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纪念。

这本书想尽量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的特点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一方面说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哲学上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又是如何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化为方法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从而帮助读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个尝试也可能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不深而不成功，好在由它所引出的批评意见会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不少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初稿执笔的有：秦锡瑜（概论、第二、三、十四章）、梅岱（第一、六、九、十一章）、李德顺（第四、八章）、郭湛（第七、十章）、汤群英（第五章）、王伟（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是特邀我校语言文学系陆贵山同志撰写的。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主要由杨焕章同志负责。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